

LU CHENG SHI ZHI

2021 | 秋冬卷(总第16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鹿城史志

资料来源“鹿城”集地方志网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温州市鹿城区党史研究室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白鹿光影

白鹿摄影(摄影 张耀进)



新农村新农村



村民收受毛主席像章



进才村全景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史志

LU CHENG SHI ZHI

2021 | 秋冬卷 (总第 16 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温州市鹿城区党史研究室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史志》

2021 | 秋冬卷（总第16期）

主 任 朱如明
副 主 任 王剑峰
委 员 李洪湖 谢一方 戴爱华

主 编 王剑峰
副 主 编 朱凌云
审 校 沈蒲州
责任编辑 戴爱华 孙任翔 王剑峰 朱凌云 褚宏健
编 务 潘茜茜

地 址：温州市鹿城区宽带路18号5楼

邮 编：325000

电 话：0577-55888183

邮 箱：12027800@qq.com

特 稿	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 ——谈领导干部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高京斋	01
往事琐谈	海坛山是家山	金 辉	10
	说评温州刺史张又新	陈出新	21
	姜准梧竹书院及《岐海琐谈》	姜方良	25
	爷爷曾是参龙先生	明 人	29
	天下驿头 程氏一家	苏德来	42
烽火岁月	抗战初期大后方 —— 温州	沙 瑒	50
	九柏园头事件	施菲菲	62
	冯增荣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徐小南	69
瓯越人文	南宋名相周必大与永嘉学人	胡健雄	77
	明代张璁是何许人也？	林绿緞	81
	慷慨任事、清廉持重的首辅张璁	鲁 剑 谢炳礼	97
	八百米古街“五马一蝉街”见证 千年历史	鲁之哲 陈建勇	102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记忆人物	摄影金奖背后的故事 ——记我心中著名艺术摄影家王曙和他的学生周芬	王邦志	113
	永嘉先生徐定超的温州革命亲友圈	徐逸龙	118
	怀念国画大师刘旦宅	黄兴龙	128
	瓯菜老厨师王成山	朱凌云	132
	潘顺发与他的互助组	林正华	139
考据索隐	解密 1600 年前的温州 ——一代大儒孙诒让复原浙南第一部地方志	汤琰琰	141
	元代温州画家林一清生平考述	余 辉	149
	哪个朝代温州开始迈入百万人口大都市	孤舟独钓	156
艺苑漫兴	池塘春草年年绿，山水诗话“第一楼”	章方松	163
	走笔三章	郑锦春	172
	那时的黑白电视机	王徽芳	178
	小岙赋（并序）	褚 坚	182
	清明饼儿	蔡勇孟	184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

——谈领导干部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高京斋

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喜欢读志、善于用志、重视修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读志、用志、修志，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典范。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领导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要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深入思考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一、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体现在读志、用志、修志三个方面。早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福建宁德、福建福州、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时，他就常常身边不离“志”。

1、喜欢读志

习近平同志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勘察古迹，细品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研得很深很透。他对编写《正定古今》的同志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

记载。”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任职厦门市副市长时，通过同学向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洪卜仁借阅地方志，以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风情，并与其进行过深入交流。

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到宁德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让随行的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陈增光找一本福宁府志。陈增光问，“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霞浦，习近平同志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

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履新之初，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

2002年，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浙江各地考察，了解和熟悉省里的情况。白天调研、视察，晚上查阅市志、县志，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把情况掌握得很透。

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个月内，市委办公厅秘书处让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一套上海地方志供他阅读使用。

2、善于用志

1989年7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古田县调研。晚饭后，他让县委书记蔡天初找一本《古田县志》。第二天早上，习近平同志对蔡天初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

历年间的”。这说明习近平同志看志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很细致。他还告诫蔡天初，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

2006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期间，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处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3、重视修志

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加强修志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这项工作。”

2004年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同志来到白沙村考察。在村会计毛兆丰的书房里看到了1991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感兴趣，就拿出来翻阅。习近平同志鼓励村民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村新志写出来。2012年7月，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说：“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整合协调党史、军史、地方志等机构力量对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抗战研究上发挥应有作用。

二、充分认识地方志的价值和作用

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修

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这是对地方志价值作用最精辟的评价和概括。不管是自我修养、为人处世，还是组织管理、治国理政，“做一个明白人”最重要。

1、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财富

中国修志已有数千年历史，官方修志传统流传至今。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地方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舆图，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地志等。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隋炀帝曾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唐建中元年（780），唐朝政府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北宋大观元年（1107），设置“九域图志局”，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每个州、府、县都定期编纂方志，作为国史的辅助和补充。明永乐十年（1412），明朝政府谕令全国各地府、县、卫、所皆必修志，同时颁布《修志凡例》十七则，这是已知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修志凡例。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上元县志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政府设立一统志馆，先后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历时150年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方志编修，新方志事业开始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相继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至目前，全国累计出版两轮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1.1万余部，整理旧志文献3千多种，每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3千多种，建成国家方志馆，形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的文化成果群。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编修地方志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常编常新。悠悠千载的传承积淀，至今保存下来的宋、元以来的旧志书多达8000余种、10多万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还多。至2020年底，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有志有鉴的“两全目标”。地方志既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的基因密码，也是中华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重要载体。

2、地方志是治国理政的必备法宝

“志者，志一方之事也……悉诚为政者之一事也”。地方志独特的官修、政书特点，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并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积淀。地方志旨在“述往事、思来者”以达到“彰往而察来”的功效。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地方志看。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今江苏东海）去做刺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州志是“诚一方之宝鉴，而百代之信史也。”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以及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略的参考。

我们党历来重视编修和应用地方志。1929年，红军解放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42年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对修志工作的责任主体作出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地方志事业最早的制度安排。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并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1960年10月在湖北考察时，毛泽东特别

叮嘱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要修地方志。他说：“领导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毛泽东又批评了一些地方不热心修志的现象，说：“‘官不修志而修衙’，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87年5月，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2015年8月，国办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首次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了全面科学的顶层设计。2016年3月，“加强修史修志”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2017年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加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修，加强地方史编写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201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要求地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2020年12月，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发展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地方志是鉴古知今的地情教科书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作为地情教科书，受到各级

地方官员的重视，不仅是加强个人修养、提升道德水准、提高执政能力的铺路石，而且是了解熟悉地情民风、教化育人、弘扬正气的助推器。《周易》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东汉荀悦说：“昔晋之《乘》，楚之《杻机》，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唐朝刘知几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清朝道光年间有个官吏叫徐宗干，他做官必修志，在任泰安知县、高唐知州、济宁直隶州知州时分别主修了《泰安县志》《高唐州志》《济宁直隶州志》。有人问他是否贪图虚名，他回答说：“知州知此州，知县知此县，不读志何以知？不修志何以知其所不知？避好名之名，而安于无知，吾弗为之矣！”清朝光绪年间，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王永江在清《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

地方志是一个鉴古知今、启迪未来的窗口。古人云：“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明。”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的新的使命。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村史馆考察。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村志馆调研。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考察时，参观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场史馆。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通过方志了解相关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改革发展情况，用于科学决策的。

三、见贤思齐，努力成为“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明白人

清《云中郡志跋》说：“史为古今之朗鉴，志乃薄海之南车”。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是“一方之全史”。读志能坚定信仰，用志能开启智慧，修志能培育道德。何为明白人？明白人一定是信仰坚定、智慧圆满、

道德高尚的人。因此，读志、用志、修志对于领导者而言是一门必修课。

1、通过读志成为方向明确、信仰坚定的人——对党忠诚

读志有助于了解过去，在与先贤对话当中感悟人生，明白做人的道理，从而坚定信仰，锚定目标，明确努力方向。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读志可以帮助自己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南宋理学家朱熹出任江西南康知军时，留下了“下车伊始，他务未遑，先问志书”的佳话。清《合肥县志》记载了包拯“不持一砚归”的事例。北宋康定元年（1040），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他到任后到处张贴布告，命令工匠和作坊每年只向州衙交纳进贡的端砚，端州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如数收取，不许额外多加一砚。三年后卸任端州知府时“岁满不持一砚归”，清廉之名更是誉满朝野。我国历代方志中保存了大量乡贤资料。明朝朱栴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建乡贤祠。清朝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读志令人效法古代先贤、坚定信念、涵养道德、培育高尚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2、通过用志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成为知止知变、智慧具足的人——勇于担当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就是用智慧去把握规律、指导现实工作。通过借鉴历史智慧，更好地服务当下，体现出应有的担当。毛泽东同志总结为两个方面的工作：把方向、用干部。而把方向就是第一个看到桅杆顶的人，即先知先觉。如何能做到先知呢？就要从前人、从历史、从志书中去得到启迪，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借鉴。明末顾炎武征引千余部地方志撰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为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清《保宁府志序》说：“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1961年夏，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曾览读过由方志学家吴宗慈于1930年主编的《庐山志》。他对庐山党委宣传部部长厚万仁说：“你们这些庐山的父母官，就是要多看看历史书籍。这部《庐

山志》就是一部好书。只有了解当地的历史，指导、借鉴当今的工作，才能为人民办好事啊！”又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观今鉴古嘛！”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李拔说：‘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志书既是记事，记事的目的是资治。冯梦龙也讲，‘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古人精辟地点出了志书的资治功用。”

3、通过修志，成为律己利他、道德高尚的人——纯洁干净

大道之德——以无我为心，以天下百姓心为心。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树立了典范。

修志是记录历史、传承精神的文化活动，是总结前人与鞭策自己相统一的过程。修志可以见贤思齐，坚守做人的操守和从政的道德，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对于领导者而言，修志可以让其牢记初心，不忘本源，去除浮躁，坚守底线。因为后来者会修当下这段历史，会如实记录这一任领导的功过得失，所以修志是领导者自我警示反思、提升能力素养的过程。宋《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朝郑兴裔热心倡修方志，在庐州和扬州任地方官期间，他分别主修了《合肥志》和《广陵志》。他认为编修地方志乃地方官之责任，他说，如一地掌故，“终令沦亡，殊非守土牧民之责！”

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多次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方志文化是饱含着历代先贤用汗水和心血汇聚成的奔流不息的历史文化长河，方志事业得到了历史上贤明当政者的珍爱和重视，方志实践在民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正确的史志观，坚定人民至上的志德，增强方志文化自信，弘扬方志人精神，努力推动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海坛山是家山

金 辉

家山，对于任何人都是圣山，如同青藏高原的喜玛拉雅山，高耸入云，圣洁无比，难以忘却。海坛山便是我的家山，那里印刻着我童年的记忆。

——题记

海坛山与永宁古巷

若说海坛山，得先从永宁巷说起，而说永宁巷又非得从官桥头说起不可。

位于海坛山西麓的天宁寺，山门朝西，面对的是古老而悠长的永宁巷。永宁巷是进入海坛山的官道。古时候，文武百官赴天宁寺礼佛，不论是坐轿子还是骑马的，行走至官桥头，定将文官落轿，武官下马，换成步行至天宁寺。官桥头的桥名便由此而得。据记载，永宁巷历史上还有一座“永宁桥”，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在温州当过两年知州的杨蟠曾作《永宁桥》诗云：“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读其诗如闻当年永宁巷的繁华，但至今尚不明确切位置，惟知夜间曾经的灯火辉煌，萧鼓喧闹。从官桥头到天宁寺路程不远，大约几百米，走几步也算一份虔诚，可亲民秀一番，如同明星走红地毯。

我就出生在官桥头桥边，而外婆家在桥的东南面，也算毗邻。十岁前，我在外婆身边生活过几年，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外婆家算是座二进五间的院子，前后有道坦，不过仅拥有大院的一半，西墙外还有一块菜园，对着官桥头。在菜园里，可看到桥下流淌着从大南门方向悄然而来的河水，并在官桥头转弯，流向正北，一直到水门头，入瓯江而去。河道转弯处，建有河埠头，种菜的外公傍晚时分从自家菜园里出来，站立在河埠头濯足，夕阳映照在他的白发上很是好看。桥头西首有家烟酒小店，打酱油的，买老酒的顾客，进进出出，十分繁忙。老板姓陈，是位宁波人，热情好客，在他看来凡过店门口的都是客。儿时的我常与小伙伴在桥头小店看热闹，夏夜还在桥头纳凉，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风情。高高的桥上有栏杆，花岗岩桥板上刻有防滑的凿痕，典型的江南石桥。站在桥头，悠悠河水从脚下流过，可感受“楼台俯舟楫，水巷小桥多”的诗意。靠近河面的石缝里，偶然还有几只血红大螯蜋在觅食，挥舞着大螯，显得傲气又滑稽。表弟陈鸣尧生性好动，常在临水的自家后门用竹竿钩钓螯蜋，收获颇丰。如今官桥头消失了，是早些年前随同河道一起被夷为平地的。而当年水道悠悠，桨声汨汨的官桥头风光，惟有到绍兴老城区八字桥景区方可看到，仿佛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今年绍兴八字桥景区的旅游，仿佛将我带到了儿时的官桥头。

儿时的官桥头，在去天宁寺路旁的南侧，有一条窄窄的河浜儿，优雅地横拦在住家门口，约一米多宽，自东向西汇入官桥头下的主河道。因此，从外婆家出来，就得走过铺在河浜儿上的石板，脚下还响着欢快的流水声。河浜儿不深，浅可见底，仍有小鱼戏水，且成群结队。水中有的石头长着青苔，绿茵茵的。记得几位比我大的邻居，曾经从海坛山杨府庙，取来祭祀的海船模型，在河浜儿里随波逐流，造型与瓯江里的航船一模一样。那时没见过船模的我，真是开了眼界。“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河浜儿的水是从海坛山流出，流过谢池湖，流到了河浜儿之中，营造了永宁巷水灵秀气，滋润华泽的气质。可惜的是，

在我离开外婆家时，河浹儿填平成路了。

这里的水井，星罗棋布，滋养着附近的居民。被称为二十八宿井之一的永宁坊井、天宁寺古井等，更为名闻遐迩。永宁坊井，又称杨府庙井，六角形石板井栏。井边摩崖上刻有青石雕成的小佛像。经营陈益兴糖坊的主人陈芝声是我的大姨夫，居住在离官桥头不远的泗洲堂附近。他是位人高马大的汉子，性格开朗，幽默风趣，博得口碑。他家制作饴糖所需的山水就是依靠这口井。他几乎天天肩挑水桶，来回行走在海坛山麓至泗洲堂的路上。一旦遇上大旱，他还下井瓜瓢勺水，再集水成桶上井，以保糖坊运作。他非常孝顺，时常为我外婆家挑水。不仅陈家得益于甘冽的永宁巷井水，另有几家淋豆芽的人家，亦以井水养家糊口，维持生计。“担水客”阿存伯更是位传奇人物，他用双肩把这里的井水，一担一担送到邻近的百姓家，以此拉扯大了十一个子女，而且个个成家立业，五子徐瑞培还是我的小学同学。发小徐宗帅也曾居住在北首的洋房里，喝着这里的井水。他的父亲徐勉，还是政府机关的要员，应该是永宁巷里官职最高的官员了。涓涓的海坛山清泉哺育了山麓民众，滋养了这里的千家万户。



当年温州城区的河道

海坛山与嘉福天宁

天宁寺对于永宁巷来说，如同一个剧本的高潮，也是永宁巷的灵魂。天宁寺旧名为“报恩光孝禅寺”，意为顺应天意，保一方安宁，大约是北宋政和间（1111—1118）改的。明初逆川大师受戒于此，后寺毁于火，其后数次重建，历经修葺，香火鼎盛，名扬海内外。温州民间一直有“外有护国、太平，内有嘉福、天宁”的说法。

我很小时便知道天宁寺是温州四大名刹之一，时常随同小伙伴进寺院玩耍。天宁寺的建筑宏大，大雄宝殿里释迦牟尼和形态各异的罗汉造型，营造了庙宇的庄严肃穆，在我们幼小心灵中也种下了对佛陀的敬畏。青石的柱子，高高的台阶，粉黄的墙壁，一派明清建筑风格。寺院里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格外引人注目，高大的树冠，足有三层楼高；树干也很粗大，若无五六人合抱是搂不住的。记得一位小伙伴从树上掉了下来，人也昏死过去。我们吓得双脚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嘉福寺在天宁寺的东面，相距不远，规模也不如天宁寺，但建于唐代，历史久远些。据章纶后人章育生、章小明称，嘉福寺边上曾建有明代著名净臣章纶祠堂，坐北朝南，占地面积一亩九分，拥有二十一间，有专人守护管理。章纶（1413—1483），字大经，号葵心，出生雁荡山麓南阁村。明正统四年（1439），章纶登进士第，获授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年间升任礼部仪制郎中。因“性亢直，不能偕俗”“好直言，不为当事者所喜”，在礼部侍郎位二十年不得升迁。成化十二年（1476），章纶辞官回乡。后人于弘治辛酉（1501）建祠，并塑像。如今祠堂没了，嘉福寺也没了，只剩下嘉福寺巷地名。

从我们懂事时起，天宁寺便是营房，驻扎着解放军，营房里弥漫着浓浓的蒜味。这里的解放军都是南下的官兵，仍喜欢北方的大蒜。那时解放军与地方百姓关系密切，如同鱼水情深，因此进出永宁巷的部队马车，受到居民的爱戴。马蹄声中，淘气的小孩可以跳上马车，与解放军叔叔一起

进入营房，在院子里打作玩耍。对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到营区看电影。

上世纪五十年代，看一场电影对于市民来说是很奢侈的消费，显然与我们小孩子无缘。记得我第一次看电影，并非在五马街口的大众电影院，也非县前头的解放电影院，而是在天宁寺部队营房的操场上。那时我们还没有上学，时常跟随表哥他们到天宁寺营房操场看露天电影。当时的营房没有高高垒起的围墙，我们小孩子进进出出，如入家门，十分随便。每当夜幕降临，大我几岁的荣坤大哥便告诉我：今晚天宁寺有放电影，我们一起去。电影是在露天操场上放映的，操场边上插着两根毛竹杆，白色银幕就挂着竹杆上。放映机摆在操场当中，亮着一只灯光，映衬到银幕上，把操场映照得通明光亮。毕竟是露天电影，若有风吹过，银幕便鼓了起来，银幕上的画面也随之变形。解放军官兵排列整齐地坐在地上，我们小孩子只能坐在银幕的后面观看。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形象总是反的，举起左手，我们看到的是右手。不过，这已经是很好的享受。记得第一次看《鸡毛信》就是在营房操场里看的。今天想起，还有《翠岗红旗》《赵一曼》等老影片。

后来天宁寺部队营房成了解放军 17 医院，管理正规严格多了，还打上了厚实的围墙，但围墙里的电影照旧放映，依旧吸引着我们。每当听到有放电影的消息，官桥头附近的小伙伴互通信息，好像是去共享大餐似的，兴奋无比。几位表兄表弟个子高，力气大，比我强多了。当操场上灯光暗下，喇叭里响起歌曲时，表兄们便搭成人塔翻墙进入。我个子小，又文弱，时常是表兄陈荣洲在下，用力将我托上起，陈荣桂表弟在上，使劲拉我上墙，然后跳入操场，蹑手蹑脚潜到银幕背后……

后来 17 医院改名 118 医院，我们也去上学，再也不可能翻墙去看电影了，但那时的美好印象永驻我心。

海坛山为风水宝地

其实，天宁寺只是海坛山的配套工程，其主体海坛山才是演绎了温州

文化的风情万般，体现了温州古城厚重的文化底蕴。

海坛山，踞于温州古城东北，山上有海神庙，庙前有祭海神坛，故称海坛山。虽然山不高，海拔为32.5米，面积也不大，惟6.57公顷，然而山石傲立瓯江之畔，抵潮汐汹涌，安江中狂澜，犹如安稳的泰山般，保了一方平安。



100多年前温州老城的格局，海坛山历历在目

海坛山为温州古城九山之一，与华盖、积谷、松台等诸山，布列如同北斗星座状。确实是一风水宝地。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置永嘉郡。建城之初，相传堪舆大师郭璞提出跨山筑城，海坛山列为其中，又因濒临瓯江，海坛山成了“斗城之口”。

登临海坛山远眺，滔滔瓯江如练，江面百舸争流，帆影点点。向西望去，江心屿双塔雄峙，东塔上端绿树，如绿云氤氲，堪称“江中蓬莱”。山的正北面也有两座塔，为罗浮龟山、蛇山的双塔。文天祥诗里所写的“罗浮山下雪来未”，据说指的就是这个罗浮山。据传，古时候的瓯江要比现在要宽阔得多，明代永嘉瓯北的马岙、珠岙、罗浮一带还是一片汪洋，为

江水所覆盖。瓯江沿岸居民靠江吃江，以江为生。为了祈福避灾，最大的愿望是“建庙山巅，祠海神以镇之”。从而历史上海坛山上庙宇林立，香火甚盛，令人神往。

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南宋“咸淳间，海坛岭下江沙忽涨，人以为异”，未几，温州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丞相——陈宜中。后来的明万历《温州府志》记载：“童谣云，海坛沙涨，温州出相。宋咸淳间郡人陈宜中、皇明宣德间黄淮、嘉靖间张孚敬大拜，皆如验”而且至今仍有“海坛沙涨，温州出相”的谚语在流传。

其实，海坛山可一分为三，西北为海坛；南麓为慈山；中央为中山。海坛山的西南山麓除天宁寺、嘉福寺外，还有温州二中的校园。那是我的母校，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不仅熟悉，而且还倾注了青春的激情。校园里的参天樟树，绿荫如伞，当年艺文学堂留下的西洋建筑和“三好楼”“五爱楼”等建筑，构建了母校的形象，只是曾为图书馆的西洋建筑被拆而惋惜至今。读书时，因校园毗连海坛山，在我们眼中仍把海坛山看成是校园的一部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班级的同学从操场的后门上山，参加海坛山园林的改建，用我们的双手平整了山坡，清理了旧坟地，园林工人还种植了桃花。每当春天时节，山坡上的桃花盛开，一片粉红，恰似是天上飘落的彩云，为我们的青春添加了几许的浪漫。放学时，我们还成群结队到摆放着高射炮的山坪上玩耍。只见炮筒高傲地翘起，有点威武，但不知是对付谁的。山腰附近还有堡垒，几乎全陷入地下，只露出射击的洞口，也不知是民国时期留下的，还是后来建造的。

伸到江边的海坛山，当年有一条高高的山岭，路旁开设着各种商铺，非常繁华，人们称之为“岭背”。古城朔门与东门以“岭背”为界，岭西为朔门，岭东为东门。“岭背”虽然消失了，但故事还是不少。1945年，胡兰成避难温州，也曾经来到海坛山。他在《今生今世》写道：“十五日到海坛山，看庙戏。山下即瓯江，一埭街密密排排都是海货与竹木米粮杂货的行家栈家，瓯江的水平堤，直要打上店门前来”。他描写的就是海坛

山的“岭背”。



海坛山上的路亭

跨过高高的“岭背”，走过喧嚣的安澜码头，紧挨海坛山的便是高殿。高殿又称大禹王庙，大约是北宋雍熙年间所建，但到了我们读书时，高殿已改为新码道小学，我的几位初中同学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如今这里已经改建成赵尔春广场。1963年12月27日傍晚，海坛山下的上岸街发生火灾，刚从上海调入温州水警区通信站当电话守机兵赵尔春，为抢救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不幸身负重伤，次日凌晨光荣牺牲，年仅23岁。为纪念这位英勇无私的伟大战士，传承他的爱民精神，1984年，温州4万名共青团员自发捐款为赵尔春在海坛山塑像，时任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上将亲笔题写“爱民模范赵尔春”七个大字。为民做过好事的，将永远被人们记住。

海坛山的前世今生

人称“弄巷百晓”陈荣桂，对海坛山的前世今生了如指掌。他说，当

年天宁寺的山门开设在如今温二中校园南大门边，大门边还有一池湖水，称为谢池湖。至于取名谢池，是否为纪念太守谢灵运不得而知，但是作为放生池是肯定的。不过，谢灵运留有《郡东山望溟海》一诗，这里的“东山”指的是海坛山。我想，他可能拾级登临过海坛山。

谢池湖旁边就是五灵殿坦，现改建成温二中“三好楼”。走过“三好楼”，有一座杨府庙的山门，可直达杨府庙。1973年杨府庙旧址建造成国际海员俱乐部，当年杨府庙大门外的那棵大樟树仍旧浓荫如盖，见证了当年的历史。杨府庙侍奉的是杨府君，又称杨府神，民间也称杨府爷，是温州地区主要的信仰神祇之一。杨府殿紧挨着海神庙，且仅一墙之隔，杨府庙可能是在海神庙之后建的，因而常将两庙合二为一，现在看来海神庙为官方，杨府庙则是民间的。根据夏鼐先生1947年1月30日日记，他在返乡回温期间，在海坛山杨府庙发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的海神庙残碑。此碑不仅有关于台风灾害气候的专业性描述，还纠正了《宋史》的错误，非常有价值。但是夏先生所说的“杨府庙”还应是海神庙。



从海坛山远眺，可见江心屿

从杨府庙山门下山，有一石阶山道，直通永宁巷。听家母说，当年杨府殿养有几只黑色山羊，每天早上从杨府殿出发，路过天宁寺，走过官桥头，直至永宁巷口再回到杨府殿。沿途信众得知山羊经过，便把供佛的香烛，挂在羊角上，由山羊带到山上，以表心愿。山羊将高高在上的杨府君与民间联接了起来，仿佛更加缩短了永宁巷与海坛山的距离。

海坛山山麓，不仅有海神庙、杨府庙，天宁寺，五灵庙，还有白鹿庵和悟真道院等。白鹿庵至今还有香火，就在温州二中北大门东首的水门底，是为纪念东晋郭璞的建城功绩而建的。据说，郭璞提议建城时，一白鹿衔花穿城而过，遂将郡城命名为白鹿城。而白鹿庵几经败落，还曾改建成小学，名称为“跃进小学”。听这样的名称便知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那时我们小学生口头语中流行着“跃进小学破学堂”，其实当时多少新办的小学不是如此简陋。可是，这里也曾经培养出一批学生，也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里还有一井，名为白鹿庵井，是古城二十八宿井之一。该井水质可口，井水冬暖夏凉、暴雨不溢、大旱不干，目前仍在使用。

南麓还有慈山，初中老同学郭永友就居住在那里，离他家不远处建有南宋叶适先生的墓冢。有时我们也来到叶适的墓冢前瞻仰。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先生墓冢坐北朝南，周围筑有青石栏杆，馒头式墓冢前立有一方青石墓碑，刻着阴篆碑文，很有气派。其实早些年墓冢场面还要宏大，从山下保生宫一直到半山腰的墓地都有石阶，两旁是石马石将军，还有牌坊。我们年少时，对叶适先生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位南宋的大学问家，祖籍龙泉，后迁瑞安，晚年居郡城松台山下生姜门外水心村，人称他为水心先生。如今人们将永嘉事功学说的集大成者——叶适，视为温州文化的一个亮点，而且不断深入人心。

最近，鹿城区计划将海坛山打造成永嘉学派文化公园，这是很好的设

想。永嘉学派是温州文化传承的基因，如果将海坛山打造成永嘉学派文化公园，那么叶适墓则是这个公园的核心，应该把保生宫旧址附近的神道重新恢复，直达海坛山，成为公园的主入口，使海坛山文化来个再提升。

海坛山在温州人心目中不仅小巧玲珑，美如碧髻，也是非常神圣的，我更视为家山。著名篆刻家张索写过不少的诗，不乏佳作名句，如“半生未识是家山”句，大家都很赞赏，并以此句称他为“张家山”。其实，我与张索亦有同感，对海坛山知之甚少，惟视海坛山为家山。



海坛山下道德广场

说评温州刺史张又新

陈出新

“李白斗酒诗百篇”“隔篱呼取尽余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等脍炙人口充满浪漫情调的诗句，历代骚人墨客与酒结缘者久矣！酒似乎成了文人赋诗的催生剂，无论哀、怒、喜、乐酒都可以“进去”。唐代尤为突出，看看杜甫《饮中八仙歌》就知道了。由于酒文化的历史悠久，殷商时期就有“肉林酒池”之说，酒又能雅俗共“享”，饮酒之后能使人有神魂飘忽之感、壮胆畅怀之效。因而历代借酒言志、以酒抒怀之诗篇不下万千。有的诗人甚至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境地。因而人们就以酒为内容的过程冠以滑稽而美妙的酒文化。

在中国，还有一种历史悠久的饮料，叫茶汤（茶水），产生之年代也难以考证。茶水在唐代已是非常盛行的高档饮料，因为饮此饮料非常讲究，尤其是烹茶过程和质量工艺，所以唐代就有“煎茶博士”，即“茶博士”，把这过程和质量工艺以及饮茶规矩和礼仪也称之于“茶道”。茶道起源于中国，据唐代《封氏闻见记》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在当时，对于饮茶就有了一定的规矩，如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仪式的讲究。于是茶道大行，茶经众说。历代文人骚客亦更以诗文吟咏千篇。

“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苏东坡《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李清照《鹧鸪天·寒

日萧萧上琐窗》)：“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茶”（黄庭坚《送王郎》）……等等不胜列举。可见我国的茶文化由来已久，品茶吟诗自唐代以来已成文人高士之雅兴。

喝茶和品茶是不同的层次，而能懂茶经、懂茶道者又是不同的层次。但能兼通茶经、茶道之至者则鲜矣。在我看来，能通此术且“二者兼优”者，莫过于唐代温州刺史张又新了。

张又新，生卒年均不详。唐代著名诗人，字孔昭，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工部侍郎张荐之子，“幼工文，善于傅会”。唐宪宗元和九年（814）进士第一。历官左右补阙，坐李逢吉，贬为江州刺史，左司郎中等。张长于文辞，《唐诗全集》《唐宋诗词全集》均收录其诗十七首。说来也巧，在张又新的十七首诗中，其中就有十二首诗是他在任温州刺史时所描写的温州人文山水风光的，或寄山水以嗟遭贬之叹。其中著名的诗篇有《三月五日陪大夫泛长沙东湖》《帆游山》《青岙山》《春草池》《孤屿》《谢池》等，诗风清丽，声律动听，华而不媚，简而不俗，比兴感人，立意空灵，妙句横生，富有艺术性。如写《罗浮山》“不知末后沧溟上，减却瀛洲第几峰”之慨；《谢池》的“今来惟有灵池月，犹是婵娟一水间”之叹等。尤其是《三月五日陪大夫泛长沙东湖》中的“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鸟弄桐花日，鱼翻谷雨萍”更为动我人心弦。我从小生活在依山傍水的农村，每当春雨初霁，那田野溪流，湖光山色，点点蜻蜓，鸟雀枝头，翠鸟凝视待渔，溪鱼逆水翻萍。诗情画意，浓浓的田园生活气息，堪为叹止！

张又新既是中、晚唐的诗人，又是一位神奇的茶道品茶专家。尽管茶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尽管在唐代以前饮茶已经比较普遍，且人们习惯在煮茶时加入各种香料，对茶的色、香、味、形并无多大的要求，因而对水品的要求也就不高。从唐代开始，逐渐开创对茶的清饮雅赏之风，对水品的要求也有了较高的要求。或经籍典传，或民间轶事趣闻，起始中唐，迄至晚清，大凡 1200 余年，历代颇有记叙品茶之短长者。在中国文化中，

品水文学是茶道中的奇葩，仅仅在“天下第一水”之争论就历时一千多年，可谓奇哉！其实，缘由的导因皆是由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引起的。

《煎茶水记》撰于唐敬宗宝历（825）前后，全文约九百余字，是我国一部重要的茶道研究著作。前列刘伯刍所品的“七水”（泡茶之水排名录）；次列陆羽所品之“二十水”（天下煮茶之水排座次）。大都是根据陆羽《茶经》的“五煮”，略加发挥，尤重水晶。他既突出渲染了陆羽的品水本领，肯定了他通过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提出煮茶之水高下优劣的开创精神。又力嫌陆羽的“煮茶之水，用山水者上等，用江水者中等，井水者下等”之说。

张又新不满足于前人的茶文记载，又一一游历品评，为后世提供了更多的水质资料。当他来到浙江桐庐著名的严子陵钓台时，深感此地“溪色至清，水味甚冷”，用来煎茶，即便“以陈、黑、坏茶沏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鲜馥也”，并提出了煎茶之水第一非“桐庐江严子滩水”莫属等。于是就引发了我国茶学史上关于宜茶水之水质的首次论争。此间有唐代苏廙的《十六汤品》、陆羽的《茶经》、温庭筠的《采茶录》等分别撰述文章。宋代的欧阳修、宋徽宗赵佶，明代的朱权、张谦德等人都加入争论。就连曹雪芹在《冬夜即时》诗中也主张“却喜侍儿知试茗，取将新雪及时烹”，认定雪水沏茶为最佳。无论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与以后的“争论”者是否“小题大做”，但毕竟打开了人们的茶艺视野，加深了人们对茶艺中水的作用的认识，“引发出了不少关于名茶名水的真知灼见，使人们对饮茶用水的品格有了更高的追求，并拓宽了对茶文化研究的视野范围，这在我国茶学史上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张科《说泉》）。

张又新是历史上的张又新，是相距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张又新。虽然他因附随权相（右仆射）李逢吉，曾被后人“指为（李逢吉）鹰犬”。《旧唐书》载称时号“八关十六子”，后多次受连坐而贬，但这是在特定的历史、特定环境的政治集团的复杂行为。在封建帝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的文化观念里，始终萦绕着“因人废说、因人废艺”等固化观念（这里所说的“因人”

的“人”是指时代观念中的人品)。作为当今世界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现代人，应该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来对待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在广义上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定义到底是什么？是个人有生之年的行为功过？是封建时代文人（即史官等，史官也有观念的局限性的）笔下的完美人物或奸丑嘴脸？不是！是你到底给历史后人作出了什么贡献，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什么业绩，给历史后人留下什么馈赠。张又新也只不过是逢迎趋附朝廷当权者（拍马屁）而已，况且《新唐书》对张又新的最后评价也只是“又新善文辞，再以諂附败”。官场“拍马屁”历代有之，乌为足怪！

谢灵运在温州开创了中国的“山水诗派”，我们不可以因谢氏“少政绩”而“因人废诗”吧？赵孟頫、董其昌、王铎可谓是盖世书法大家，他们给历史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书画艺术遗产，我们切不可“因人”而废其人文、书画艺术；历史的张又新虽有骂名，这是一千多年前的李唐王朝，是当时的政治内部矛盾斗争行为。但他毕竟开创了我国茶文化品水文化历史之先河，并给我们温州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美丽的诗篇，我们可不能因其当时的政治性格行为而“废张”吧！

姜准梧竹书院及《岐海琐谈》

姜方良

鹿城区华盖山西麓，一条南起县前头，北至瓦市殿巷的小巷，巷名叫华盖里，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姜准居住地。姜准在巷内建有梧竹书院，是他从事教书育人，学术研究，藏书、写作和居住的地方。院外梧竹林立，院内海棠鲜妍。姜准《岐海琐谈》卷十一，367条述：“吾馆多莳秋海棠，花甚鲜妍。杪夏基开，延至秋半。《琅嬛记》云：‘昔有妇人思所欢不见，即涕泣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其事甚隐，特表之以佐骚社诗料。旧有诗云：‘春色重新吐艳妆，独留此种占秋芳。稀疏点缀猩红小，堪佐黄花伴酒觞。’斋前方丈地，载花艺竹。诵读余暇，抱瓮浇灌，以养怡相向矣。”明代著名诗人何白《吸古堂集》卷十，对梧竹书院亦有诗赞：“华盖峰前旧书屋，绕屋高梧映深竹。编摩上下数千年，图籍纵横三万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居尚存，遗憾的是梧竹书院毁圮于旧城改造之中。现仅留温州古城



《岐海琐谈》1936年永嘉区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刊本扉页

历代名园示意图，以光绪八年刊行，民国二十四年补版底图。梧竹书院位置显示在东瓯王庙与资福寺之间。我们也曾多次到实地考访，但均无果而返。

姜准，永嘉场沧湖姜氏第九世祖，名尚陶，字平仲，号谢池、艮峰，榜名姜准。据史料与姜氏族谱记载，出生在明万历年初，约为1573年，卒于1648年，享寿75岁。祖父七世祖迁徙鹿城，建小宗祠于郡城东山之麓奉祀。姜准是一位藏书家，精书法，至篆隶尤精，博综群籍，尤悉瓯中掌故。对乡举入仕之途，姜准曾在自序中阐述：“至我朝，乡举始为入仕之途，然人才往往由是而出，则又一代之新制也。夫既试之三场，糊名，易书、公较阅之，亦已密矣，复令再试，不亦烦乎？是固不若今制之为善也。”姜准，平生博览群籍，不为科举所累，亦不愿为官，一心杜门著书，所著书二十七种，有《东瓯人物表》《东嘉书目考》《东嘉科第年表》《东嘉诸科年表》《永嘉教职世表》等书，可惜大部分著作已失传。传世仅《歧海琐谈》一书，全书16卷四大本，12万余字。全书五百余条，记录温州地区的建置胜迹、典章制度、名人逸事、风土物产、诗文书法、对联民谣、幽默讽刺、灾害变异、神仙鬼怪等。其所引多种宋、元古籍如《永嘉谱》之类，即为久佚之书，价值尤高。从中可以了解明代温州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不独为研究温州地方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且，对了解这一时期的江南社会史有很大的帮助。

《歧海琐谈》书中涉及温籍官员王十朋、叶适、陈宜中、卓敬、黄淮、章纶、王瓚、张璠等，在朝廷为官，参与当时高层政治，积极上书言事。书中还列举外籍官员在温为守的政绩表现，褒扬廉洁奉公的何文渊、洪垣、刘述等人，录其《劝民五事》《劝世文》等。何文渊离任调京：“温之官吏军民父老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者万余人，填塞城门。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稚望风拜伏，悲泣于岸侧。在郡六年，无锱铢之取于民。布衣蔬食，处之怡然。故去时别温州父老云：‘作郡焦劳鬓短蓬，承恩又侍大明宫。行囊不载温州物，惟有民情满腹中。’民思之不已，为立生祠，

岁时祭祀。”而对贪官则极尽讽刺，如记东瓯民嘲陆守云：“温州太守陆秋峰，扫尽温州五邑空。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廉贪形成鲜明对比！

《歧海琐谈》书中风土物产方面，介绍了元宵灯会、拦街福、端午龙舟竞渡、抬阁以及结婚坐宴等习俗。记录温州人一年到头，四季八节的风俗习惯。记录了柑橘、龟脚等特产列为贡品。其中记录的神祇，以地方神最具特点，而且多以人转化而来。如民间传说的英雄，历史记载的人物，这些都是我们温州的名流。这些都是我们温州百姓自己塑造的，反映了我们先人扬善憎恶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东瓯王、忠靖王、广济侯王、杨府大神等。在诗文字画条中，他较详细地介绍了有明一代的书画家，如曾任过宪职的侯一元、王铮、王叔果、王叔杲等地方名流；至于书法，不相伯仲的任道逊、姜立纲、谢德环，都以书画入选廷阁；而林应龙、康从理、洪孝先、何白都以江湖翰墨，各擅专长。晚清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代大儒孙诒让，在《温州经籍记》中称，该书对有明一代掌故，收集更详尽，在当时宋元地方文献散佚情况下，得此一编，救亡校异，就一郡言，亦可谓考证之渊博。万历间聘修郡志不赴，时论高之。

有人曾说，当今社会浮躁之风盛行，为官者盼望快出政绩，快步升迁，导致“事故”频发，反复折腾，劳民伤财。而姜准生平，处世淡然，终身不夺，则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东晋诗人陶渊明有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要我们内心多一份宁静，就一定可以专心致志，成就事业。

《沧湖姜氏族谱》世系遗像图中赞姜准曰：“性翁条达，出於自然。於人无竞，自适其天。生平和乐，怡情邱壑。处世淡然，终身不夺。”族谱记载姜准一支玄孙第十二世祖，在清初“迁界”之后，迁徙瑞邑廿六都坳头岭上乡，与桐岭连界的一个山坳里，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后裔大部分世居瑞安桐浦乡坳头村、桐溪乡根溪村；也有迁徙山外村、黄岩新前七里村、台州椒江上垟村与侨居意大利等地。繁衍生息，瓜瓞绵延。至今已

传二十四代，居坳头有五十多户，二百多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坳头村党支部书记姜振麟，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带头将坳头岭上的村民移居到山下建坳头新村，安居乐业。2020年阳春三月，我们和有关部门文史专家领导，以及本地宗亲方增先生，实地考察姜氏后人聚居旧地。该地位于坳头岭至丽岙的半山腰，沿着山路来到这里。村口有几株三百年的古树迎风峭立，诸多即将塌倒的旧房屋，还有荒芜的菜园，宣示着已经有好多年没有主人的光顾了。但是还有一座庄严的太阴宫矗立在这里，正门前旗杆上的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说明每月朔望不时有人过来点香参拜，这是他们的某种精神寄托和信仰所在，人们对上辈的旧居住地，心中带有几分留恋之情。

家族文化是传统“礼”文化的重要内容，家族变迁史应该为地方史的组成部分。族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是中华民族三大文献（国史、方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有关名人资料可补充地方史志文献。今天，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和谐社会建设和美好家园构建的系统性角度，认识和研究家族中先贤，当时年代的历史背景，力求在更高层次开拓地方史普及领域，为新时代建设发展服务。

爷爷曾是参龙先生

明 人

正月灯，二月鸢，三月麦秆做吹箫。

又是一年新春到。对于祖父来说，过了三天春节，他便忙碌开了。正月十五前后，村子里要划龙船（龙灯），他是参龙先生，得温习参龙功课，了解村里今年出现的新情况，如谁家添了新丁，谁家从事新的行当，谁家起了新屋等，这些都是参龙时会参到的内容，得预先备好功课。

正月闹花灯，在温州地区是以划龙船（纸龙）为主角，串起花灯、凳板龙、马蹈、台阁等一系列活动。温州人把龙灯叫作划龙船，又称干龙（称龙舟为水龙）。我家在温州郊区，祖父是地方上的参龙先生，当时本村唯他和二爷（叔公）两人。祖父早年曾说过，他这参龙的技艺，没跟谁学，是年轻时感兴趣，跟随参龙先生边听边学，再靠几本手抄本，死记硬背，然后就勇敢接任出场，并带上了其弟，就是我二爷（叔公），也学会了参龙这门技艺。

参龙是一种配合舞龙灯时进行的传统说唱艺术形式，由灯师以温州话演唱，俗称“参龙”。参龙先生唱词，鼓手配合打锣鼓，为牛皮大鼓和大铜锣。参龙唱词分仪式词、插词和正文三种形式。仪式词根据不同场景有不同词

文，格式基本固定，插词是对景赋词，即兴发挥，正文是唱古戏文，一般较长。参龙曲调热烈明快，唱一句，敲一阵锣鼓。

到了我能记事时，家里已不见参龙的书，可能是文革时“破四旧”被烧毁了，划龙船也作为封建迷信活动，被取缔消失多年。待到粉碎四人帮后，温州才恢复了划龙船的习俗。村头巷尾重现龙灯的舞姿，塘河响起了划龙舟的咚咚声，祖父重新操持起参龙这行当。

本村的龙船是从正月十三开始的。早几天，由头家带队，到沙门村将定制好的纸龙迎回本村，放在龙窝，龙窝一般设在村人有清和嘉福家的间前头。龙灯仪式启动时将龙船抬到三港殿前，开始请圣点仙。祖父作为参龙先生，身披大红绸，鼓手敲起大堂鼓，唱起七言一句的参龙韵文，请三十六路神仙光临本村，观看龙灯。请圣点仙的参龙有一套连词：

东风袅袅泛崇光，
灯师有本奏圣王，
圣王呀，你做忠总要臣陪，
游嬉总着合庙臣，
上圣听奏喜盈盈，
差出值日值时走应勤，
左伴打起龙凤鼓，
右伴撞起紫金钟。

……

请圣完毕，龙船启动，到本村摆有香案的大门台逐个参龙。早年村子里有十三个“前间门”。所谓“前间门”，就是一座大院子。一个“前间门”往往合住几户人家。全村大概有几十户人家，享受参龙礼遇。每到一家，由参龙先生演唱参龙词，词的内容为祈求龙神保佑合境平安，歌颂吉祥祝贺丰收。每个“前间门”摆有香案，香案物品有鸡鱼肉糕点果品，还

有香烟老酒等，各户大同小异。当天晚上，十三个“前间门”要参龙完毕，一般一个“前间门”约参龙半个小时，参龙先生尽量会参出不同版本的词文来，因为有很多村人跟着听。香案的参龙词很多，有《十二生肖香案景》等，其中《大闹花灯香案景》是这样（节选）：

一撇一捺一横中，市字躲在门当中。
人七头上戴花草，丁火同神带兵朋。
大闹花灯龙进厅，上圣带龙出游春。
一来新春来拜客，二来到户保康宁。
先把上圣安落位，后表厅堂景致文。
九龙厅前八仙桌，八仙斗法闹盈盈。

……

前四句是藏头诗，即“大闹花灯”，“闹”字开头，预示龙灯开篇。

有钱人家还请米塑师塑上香案景，即用年糕粉制成各种戏曲故事人物，或者飞禽走兽等，让参龙先生“参”，这就是插词，参龙先生必须根据物品进行随编随唱，有的人家从事某种手工艺，也要唱出该行业的祖师爷及行业特点，均由参龙先生即兴表演，临场发挥，唱后主人给予赏封。如岩冰家祖上做酒，龙船到了他家，祖父就唱道：

月光如水水如天，李白酒斗诗白篇，
武松酒醉打猛虎，太真酒醉冒天仙。

到了种田大户岩元家，祖父就唱“谷印”参龙词：

诗家清景在新春，诸葛孔明计谋通。
木牛流马解粮草，粮官进仓谷印封。

……

按照习俗，正月十四是本村龙船走亲访友。这天，龙船队伍可热闹了。几十人抬着龙船，龙身点着红烛（后用电池珠头灯），摇摇晃晃，后面跟着滚龙、凳板龙，有时还有“马蹈”，即是由村人大多是孩子，骑着高头大马，妆扮成戏曲中的人物，一路浩浩荡荡，往灰炉迎去。沿途观众夹道观看。传说灰炉是亲戚地，不是人的亲戚，是神的亲戚。本村三港殿的华光大帝和灰炉的华光大帝是亲兄弟，灰炉是哥，西堡是弟，所以正月十四，弟先给哥拜神，十五日哥再给弟回拜。途中遇上摆有香案的，龙灯队伍要停下来了，起劲尽舞，热闹一番。参龙先生要唱贺词，奉承赞颂。

正月十五是会神，附近几个地方村子的龙船到本村来，即神仙相会。本村龙船要在村口恭候迎接，参龙先生唱起参龙词。几条龙船在本村三港殿前的道坦上相互舞动，双龙抢珠，游龙戏凤，热闹非凡，往往持续一个晚上。送走客人后，龙船再到村子的每户人家巡游一番，参龙先生要一一参龙称颂。巡游结束，往往已是深夜或凌晨，正月花灯即告结束，参龙先生唱收仙词，欢送这三天来本村观赏的各路神仙回去，龙船在三港殿前的空地上火化。收仙很重要，各路神仙要个个点到，确保平安。祖父高声吟唱收仙词：

黄金万两四字分，上圣传令点香神，
点出一六二六道，三六十八转归宫，
四六神仙二十四，五六三十转归宫，
六六神仙三十六，三十六道转归宫，
前头将军杨元帅，后头八尾周梢公，
猛力神仙点出宫，西湖大斗称英雄，
西湖大斗称第一，银銮殿上赏银红，
有功臣子三盅酒，无功臣子酒三盅。

.....

父亲记得，祖父常唱的收仙词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云淡风轻近午天，总管出令送神仙。
送完神仙三十六，三十六道送归宫。
宫归宫里庙归庙，无宫无庙上天庭。
安落众仙归原位，静心修炼受香灯。

问起祖父参龙一年能有多少收入，父亲说：地方上的参龙是没给报酬的，得靠每个“前间门”人家给的红包，或端午龙舟的迎红包。一年就这么两次，权当额外收入，不多，买个过年货而已，不能养家糊口。祖父参龙，主要还是出于他的兴趣，用现在的说法，也算一种艺术追求吧！

二

四月冷清清，五月塘河里咚咚声。

这句《十二月令》中的谚语，说的是温州四月的农村春播已毕，闲月无事，冷清清，到了五月，突然塘河里传来了龙舟开划的锣鼓声，寂静的河面沸腾了！

祖父又开始忙了。会昌河上，百舸竞渡，龙舟如飞，彩旗招展，人声鼎沸。只见龙舟的十八档36位划手埋头划浆，奋力拼搏。打鼓的，敲锣的，擎旗的，敲舢的，各就各位。祖父作为参龙先生，立定龙舟中间，手驻参龙桨，目视前方，进河唱进河词，过桥唱过桥词，逢上岸边摆有香案相迎的，自然要奉上一套全整的参龙贺词。

龙舟进河前，是先点仙，邀请赞颂有关神仙神助龙舟全程顺利太平。点仙参龙词有：

参 鼓

月中桑柳定阴阳，独角仙牛皮一张。
旷八师傅蒙成鼓，三音六板千古唱。

参 船

天间小雨润如酥，鲁班师父造龙舟，
伦配祖师打箴缆，达青仙师画龙花。

请 龙

春风不度玉门关，拜请神龙出仙山，
耳闻龙舟仙牛鼓，腾云驾雾到凡间。

净 船

绿遍山原白满川，三清教主净龙船。
先净龙头千年吉，后净龙尾保平安。

请太保

玉盏盛来琥珀光，敬请太保下船仓。
太保下船安下位，划船弟子保安康。

.....

点仙过后，是进河，即龙舟下水。进河词的版本也很多，选其如下：

一

花有清香月有阴，锣鼓调停另转音，
一声火炮来迎接，二声火炮请仙神，
三声火炮满地红，葡萄达藤根生金。

二

花有清香月有阴，孝佑圣君点香神，
孝佑神明龙庆贺，龙舟出河保康宁。

三

花有清香月有阴，青竹松柏万年青，
李白火炮接龙舟，人王两点本是金。

四

月落乌啼霜满天，三天门下周禄仙。
今日龙舟也下水，万民欢庆太平年。

五

香烟淼淼透天庭，天地三界众神灵。
天下诸佛安下位，龙舟进河保太平。

这些往事，都是早些年龙舟竞渡时祖父参龙的回忆场景。尔后在长达二三十年里，龙舟在温州消失，年轻一代只从老一辈人的口中传说或书本上得知龙舟，不见实物。待到改革开放后，当温州民间恢复龙舟时，祖父年纪大了，下河（龙舟）参龙的事已难以胜任。村子里的参龙任务就由比祖父小十岁的我二爷接任。他也年近花甲，戴高度近视眼镜，但村里无参龙先生，他是老将出马，重振本村参龙之雄风。

龙舟开划前，参龙先生在在三港殿太保爷前点香后，把仙官爷的香炉，请到龙舟上。仙官爷是童儿身，喜玩龙舟，划龙舟必请仙官爷儿，放在船头，借助仙官爷之神力，确保龙舟一路平安，斗龙取胜。有时某只龙舟竞渡输了，划手会猛敲香炉，怨仙官爷儿不使力。

本村的龙舟是五月初二进河。龙舟进河习俗是：这日天光早，龙舟悄

悄下水，划到村子西头夹底河，划手均不开声，鼓手轻敲边鼓，静静的来回划个三趟，俗称哑巴龙。调三趟后，突然鞭炮齐鸣，锣鼓敲响，划手开声呐喊：哇哎——哇哎——！西堡龙舟正式开划。

本村龙舟进河后，要先划到仙门河任桥石桥报到，据说任桥是龙舟岩基（老家），城郊区（上河乡）的几十支龙舟都要划到那里报到。仙门河回来后，村子龙舟还要划到灰炉，跟正月干龙一样，亲戚地，会神。水乡桥多，龙舟过桥时，参龙先生要唱过桥词：

海水滚滚浪滔滔，鲁班师傅桥造高。
今日龙舟桥下过，千年永久万年牢。

参龙先生每唱一句，划手跟着齐声呐喊“哇哎——”，气势雄壮，甚为动听！

第二天龙舟是自由活动，在附近村庄的河道划动，到亲戚地访亲拜戚。这些亲戚，一般是指女儿所嫁之地，村民称之为“衔吃龙”。路上遇上迎面而来的龙舟，不用号令，双方会心照不宣比上一番，来回划个三趟，不论输赢，举桨道别。

龙舟进河前，外村亲戚早几天已接到请柬，一般会在河边摆上香案，迎接亲戚地的龙舟到来。他们会在香案边上竖一对青竹，上扎红绸，挂上桂圆柑橘等物品，让参龙先生“参”，温州人管这青竹叫“迎红”。当年二爷是参龙先生，他眼睛高度近视，对挂在青竹上的一些罕见小物件，他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这时就靠边上的鼓手告知他是何种礼物，二爷马上临场发挥，参出包含该礼品含义的词文来。针对香案礼品的词文很多，参龙先生得记在脑里，应景唱对。常见参龙词有：

一、香烟

大字顶一本是天，迎红里面有香烟。

香烟本是灵芝草，生在昆仑山顶尖。

二、香糕

海水滚滚浪滔滔，金漆和盘摆香糕。

桂花落地叫多谢，日子香甜日日高。

三、镜

迎红摆宝菱花镜，既照面来又照心。

照面能比西施美，照心不忘孝双亲。

四、算盘

绿林英雄鲍自安，算账连用石算盘。

劫脏济贫行善事，威名远振坐龙潭。

五、火钳

五虎平南扫狼烟，杨府巾帼美名扬。

烧火丫鬟屠龙女，临阵交锋用火钳。

六、琴

俞伯牙弹古瑶琴，琴声悠扬乐理深。

结交朋友种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

七、画

花有清香月有阴，画坛名宿是唐寅。

专长山水美人画，从古流传到如今。

八、竹筒

万紫千红总是春，烧火丫环杨排风。
一条火棍少敌手，雏凤凌空显雄风。

九、杨梅

迎红摆宝是杨梅，茶山丁岙称第一。
大罗山上育名果，全国畅销当宝贝。
茶山杨梅红又圆，男女老少都喜欢。
喜看红梅多结子，欢见绿竹又生孙。

第三、四天，也就是五月初四、初五，是龙舟竞渡的高潮之日。这天，会昌河中心河段上，龙舟汇集，准备斗龙。但见岸边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几十支龙舟色彩各异，有红龙、白龙、黑龙，蓝龙，紫龙、黄龙，各色龙舟争奇斗艳。其中有几支“女子龙”，英姿飒爽，特别吸引人的眼球。

本村是红龙，龙舟的色彩是一成不变的，是地方标志，也是品牌。本村的36名划手，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力大如牛。那些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村子有一只常年运送工业废水的运输队，他们天天摇撸或划桨，把打字蜡纸厂的废水装船，运到西郭大桥头瓯江水闸，排入瓯江。他们天天划船，等于每天锻炼划龙船，个个胳膊粗如杠段，所以竞渡比赛中，本村的龙舟如箭离弦，划得飞快，总是力拔头筹。当然，划龙舟的舵手和锣鼓手也很要紧。舵手要稳、准、快，温州人叫舵手为“敲艄”。稳、准，是不偏离方向，快速前行，快是指调头要快，快个几秒钟，往往决定胜负。当年，村人谢正士是一把“敲艄”好手，后来的朱岩桃、朱崇定、陈建国、朱崇榜都是相对固定的敲艄人员。打鼓人员也相对固定，一槌一落，起到统一号令、鼓动人心之催力，村人朱岩金、吴林法、吴林寿、高仁华、朱崇锡，均有一套自己的打鼓秘籍。

第四天竞渡比赛后，龙舟回村，要举行收仙仪式，由参龙先生把点仙

仪式上请来的各路神仙送回去，收仙词很重要，也要一个不拉，特别是仙官爷儿，他贪玩，最会捣乱，一定要把他招回，若把他忘了，地方会不太平。常见收仙词是：

(版本一)

龙舟调头千年吉，收起神仙五七一，
十八郎君转回程，路头路尾寻鬼神，
总管大令重千斤，乳鸭池塘水浅深，
总管出令收仙神，收起神仙三十六，
三港庙中受仙灯，金丝鲤鱼跳龙门。

收仙后，端午龙舟正式收宫，龙舟上岸，期待来年再度相逢。

对于会昌河的龙舟竞渡，古人留下许多优秀诗篇，尤其是清人，留下作品甚多。

清·郭钟岳《东甌百咏》（温州竹枝词选）：

一

舞阳河畔彩旗展，端午时节战犹酣。
龙舟竞飞离弦箭，万人呐喊声震天。

二

龙舟竞渡闹端阳，五色旌旗水上扬。
争看秋千天外荡，艄婆笑学女儿装。

清·方子颖《温州竹枝词》：

午日江城竞渡时，倚楼画阁望迷离。
半天忽动秋千影，龙女腾空作水嬉。

清·孙扩图《忆江南·温州好》（节选）：

温州好，士女太缤纷。

净履鲜衣来个个，

观灯竞渡一群群，

香气晚氤氲。

三

过了几年，我的二爷也老了，下水上船已不方便，村子里先后冒出了李明池、朱崇林、朱崇华、吴永连等参龙先生，如今吴永连成了西堡参龙的传承人。龙舟活动全国各地都有，但参龙活动，似乎只有温州独有，百度资料显示的均为温州。2009年，“温州参龙”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纵观温州龙舟历史，源远流长，各种史书记载，起码有上千年历史，龙舟竞渡至迟在宋时已很流行。关于宋时温州划龙舟的盛况，叶适的诗称：“一村一船遍一乡，处处旗脚争飞扬。”

温州解放前曾发生过多起龙舟翻沉事件，溺亡几十人。新时期龙舟恢复后，由于摊派打斗沉翻等原因，曾被禁10年，2004年开禁后，加强了安全措施，如要求每个划手都得穿上救生衣等，并成立龙舟协会，加以引导和管理。

对于新时期温州龙舟发展，不能不说一个人，那就是原温州市副市长、现中国龙舟协会副会长王成云。他原家住会昌河边，从小就耳染目睹龙舟竞赛之情景，对龙舟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主政工作时，对于龙舟这项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的文体活动，倾力支持。据村人崇姆说，早些年，每逢端午节划龙舟，时见王成云下龙舟，一马当先，出任鼓手，与民同乐。

他调到全国侨联副主席任上工作后，仍然不忘在国内推动龙舟事业，2019年被选为中国龙舟协会副会长。如今龙舟能够被列入亚运会比赛项目，温州开辟龙舟基地建设比赛场馆，跟王成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王成云，功不可没！善莫大焉！



温州龙舟运动基地综合场馆

天下驿头 程氏一家

苏德来

驿峰何可望罗峰，宰相归来访野翁。
欲向烟霞寻胜迹，却从霄汉觅仙踪。
东园载酒谁同步，西岭题诗我独从。
为相当年王子晋，吹箫宛在碧空中。

《拟半闲公原韵》是驿头村清代的一位名叫程崇政秀才所写，诗中“罗峰”为明代宰相张璁故乡大罗山，诗人通过张璁对驿头山水的喜爱，赞美驿头山水，可谓“清而且圆，直而不散”，诗如珠，景如珠。

驿头，位于瓯江中游的南岸、鹿城区山福镇中部，北纬 28° 8′，东经 120° 27′。东距温州城区 24 千米，南枕峰山（大鹏山）与藤桥镇接壤，西与双潮乡相邻，北隔瓯江与永嘉桥头镇相望。驿头区域总面积约 8.6 平方千米。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民风淳朴，尤其是“二程”文脉绵延不绝，令人激赏。

沿着绵绵瓯江，穿越八卦水陆，从金山岭遥观八百里瓯江，江水奔涌，瓯鹭飞翔，掠起波光闪烁，江风和着山风交响呼应，观者以为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开放，奔腾，起伏，壮阔。

山麓下的村庄，三面环山，江水流经，这里便是驿头村，程氏家族便

是在此繁衍生息。

村中的清澈溪流，穿村落而过，隔分阴阳，祠宅两仪，山形四象。程氏家族把房舍建在太极图上，村人在此耕读传家，千余年来，驿头程家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浸润与陶冶。叱咤国际外交风云的著名政治家让·平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

“驿头”一名，最早见载于明嘉靖末年（1566）由王叔果、王应辰撰修的《永嘉县志·隅厢乡都》一节中，时属“临江乡”廿六都。



光緒十九年《浙江全省輿圖并水陸道里記》
“驿头埭记”手抄件图片

进入驿头村，沿村中溪流穿村而过，溪水潺潺，水鸭戏水，鸡鸣狗吠应和；岸边长廊倒影水波，溪鱼游弋；古树斜依，鸟声啾啾；石桥古朴，与远黛青山相互映衬。驿头村的确是一幅田园山水画。

第一站来到让·平祖居。祖居建于咸丰年间的单进四合院，坐西朝东，由门台、厢房、正屋组成二进合院式建筑，共九间房屋，面积概有 1300 余平米。

1929 年，这间房子的主人程志平心怀梦想离开故乡，只身走出国门，前往法国谋生。1933 年，他又辗转到法国殖民地非洲加蓬共和国，从此扎根。

1936年搬迁到港口以南150公里的丁布埃州首府翁布埃镇，凭借捕鱼和伐木取得财富，成为当地最有本事的人，娶当地酋长女儿为妻，正式在加蓬安家落户。20世纪50年代初，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公司大举裁员，而程志平没有舍弃一个工人，危机过后，西方很多公司招不到人复工，而程志平公司凭借与工人的不离不弃之友谊，一举成为木材行业老大。致富后更是为当地百姓修路、买渡轮、盖医院。他以温州人特有的聪慧，把握机遇，又为人勤劳厚道、谦虚，受州人爱戴，民选为该州议长，一连二任。

他的儿子程让·平，后来相继出任加蓬国财政部长、计划部长、外交部长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主席、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和77国集团副主席、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非洲加蓬国外交与合作部国务部长和加蓬副总理等。

程让·平曾经数度回乡寻根祭祖。他说，“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他是从哪里来，怎么会到这里的。他总是对我们讲述年轻的时候如何离开中国的经历，讲述他的中国温州。我的回归就是带着父亲嘱托认祖归宗。”可见其情深意切，可见程家家风、家教之纯朴。正如张璠所撰祠联所言“诗礼著家声奕世显承俎豆，文章绵世泽千年四续冠裳”。



中加友谊馆

如今，程让·平祖居、中加友谊馆、驿头中非友谊牌坊等第一批村文化景观点已经建成。

据当地的说法，驿头程氏为宋代“二程”之程颐的某一派系。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为宋程朱理学的掌门。



“二程”程颢、程颐

清同治六年《峰头三个门台程氏四房谱牒》大中公实录载：“始祖天一，讳澥，字大中（1161—1255），名号怀洛，原籍河南洛阳县人，宋伊川公任秘阁四世孙也，宝庆二年（1226）真西山先生荐为东甌学正，后遂家焉。”

步入程氏宗祠抬头看到张璪题写匾额二方，“永言孝恩”“敦宗睦族”匾额，方记起修于明嘉靖五年（1526）的《驿头程氏宗谱》有张璪作序，其中关于程氏渊源的记录：“峰山之有程氏，其源最远。自宋伊川公之四孙大中公司铎于甌，其子孙遂家焉。今凡十三世，忠厚相承，诗书继美为永嘉著姓。”



张璪题写的匾额“敦宗睦族”

史料记载：张璪与程智为同窗好友。程智（1474—1538），字惟道，号半闲，系程奕公之第五子。程智学问高深，志业于山林的人生志向，深

受张璠的赞赏，称他是“公负异才，隐居不仕”。两人交往甚密。张氏常驾舟相访，“坐留云亭，登放鹤楼，痛饮联吟。”张璠再次到了驿山，同程智一起，游览了被其誉为西溪第一峰的驿峰，即兴题诗《登驿峰》为证：

再上西溪第一峰，同行唯有吾亲翁。
昔年未见周王驾，今日还传谢客踪。
不是娇情思独步，还知旷世欲相从。
瓯城烟柳诸名胜，尽在凝眸一望中。

读“敦宗睦族”和张璠写的谱牒序，不仅感动于一个500多年前凄美的爱情故事。它的主角——程智之次女和张璠之长子。嘉靖十年（1531），荣任内阁首辅已有三年的张璠，从北京回到温州，为长子逊志与程智之次女主婚。程张联姻，成一时美谈。

然而命运捉弄人。据《光绪·永嘉县志》《古今图书集成》“张逊志妻程氏”记载：程智次女。年二十，适中书舍人张逊志，志行专一。夫卒，恸哭几绝，堕浴尸盘中，衣尽湿。得救且苏，遂不更衣，不食。每一泣泪下，皆血也。得疾，日甚。曰：“吾得归夫椁，有死而已。”力疾扶椁归，至家即卒。他们的爱情故事真是感天动地，荡气回肠。

步出宗祠，沿着溪流而上，过义官桥（又名圣旨桥），见一圣旨碑亭，也称为“圣旨旌表程奕义碑记”，碑刻于成化十年（1483），明宪宗帝遣温州知府项澄为旌表奕公捐粟赈灾之义举而立。碑有护亭，为圣旨亭。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为程奕五子程智所建。



圣旨碑亭

《旌表程奕尚义碑阴记》记载：若峰山程君奕……其积善尚义之声，闻于人者，旧矣。伯兄韬即输粟千斛，而君又复输八百斛。侯嘉其义，闻于上，建门以旌其兄，勒石以旌其弟。

张璠作诗《题峰山万松山房》以对程奕的赞美：

君不见陶元亮抚孤松，盘桓早作归来翁。
君不见杜少陵在青松，草堂千古新风流。
君有万松岂夸诞？一岁予能载百万。
多寡由来未足论，唯适之安人所难。

万松堂为程奕晚年所建，后来由其五子程智所居。今原址犹在。

在驿头有义士程韬、程奕，也有辛亥斗士程登云，他是浙江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



程奕故居旧迹

史料记载：程登云（1867 — 1926），字子卿，号培桢，谱名增淦，登

云为其榜名，永嘉县廿六都四里驿头人，程氏家族第二十四世孙。自幼习武，性格豪爽，能力举巨石，武功卓越，推崇传统的“忠、孝、礼、节、义”，以致在学校、亲族、乡里赢得普遍赞誉，为清光绪年间庠生。因痛恨晚清腐败，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辛亥革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第十分事务所评议员等职，以故居“外新屋”作为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地点。

在廿六都驿头至今还流传着谚语：“驿头人甚能兴，正月初三划龙灯。”每年正月至元宵，驿头人就开始划一种特殊的龙灯，“格榭龙”，因为龙颈上驮一种神龛像橱柜，故名。现在为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带着好奇随友人到非遗传人程海勇的家里，并随之参观格榭龙。格榭龙为传统纸扎枝艺，全长55米，分头尾各一档节，身躯9档节；龙头高2.3米，正面宽1.3米。在夜间，借内置的烛光透出和借光映现图案，煞是好看。

程海勇介绍说：制作格榭龙工艺复杂，有削篾、搓纸、画稿、刻板、拓印、刻纸、扎龙骨、糊纸、描彩、点睛等等工序。特别是刻龙纸花，是制作格榭龙中最重要最费时的工序。龙纸花，俗称凿纸花，通体装饰于龙灯上。每张都要先凿刻印花再手绘人物图案，这些人物既有《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中的英雄好汉，也有孔子、杜甫等文化名人，还有老寿星、八仙等民间传说中的神仙。

驿头格榭龙为古永嘉临江乡的民俗灯彩，始于何时，无法考究。明清两朝已盛，迄今大概有五百年历史。格榭龙以其非常独特的造型，精巧的结构，在中国灯彩艺术独树一帜。

驿头格榭龙于2008年被列入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程海勇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掌握龙灯制作全部技艺的一名年轻人，并成为该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2012年，他制作的格榭龙灯，参加温州市第四届民间文化节并获奖；2017年参加浙江省民间文艺“映山红奖”灯彩大赛，获“华灯杯”优秀奖。

走在驿头村，夕阳西下，一路余晖，望远山景：有山巅上金山禅寺肃

立，有黄尖山诗意，有岙头坪的连绵不绝，有龙角山溪水连绵，有青龙山、白虎山热情拥抱山庄，有明月溪水的缠绵不绝的水声。这一切美景不也正如驿头村留下的历史碑刻及故事。

走进程氏宗祠，见到一碑刻“纪念温州市（1958）郊区首所民办中学山福中学旧址”，一种敬意油然而生，“二程”文脉如同潺潺溪流，奔腾的瓯江水上的闪烁阳光，耀眼、醉人的奔向世界。从这里，还走出了不少大学院长、教授，党政干部和工商界人士，地方新乡绅和名闻西溪的文化人。

如今在新农村建设中，驿头人又开始谋划建设八卦长廊、二程书院、乡村记忆馆等景区文化设施，以及安置房建设、绿化工程等民生工程项目。

难怪守护着“非遗”的传承人程海勇笑得如此心花怒放，因为，驿头村的“驿头格榭龙”在新的时代腾云驾雾，舞出了最美丽的新农村。

责任编辑：朱凌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网”

抗战初期大后方 —— 温州

沙 瑒

温州，因其繁华与富庶，自古以来常有“小杭州”之称。早在北宋时期，温州知州杨蟠就写下“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的诗句。到了近代开埠之后，温州的大门被打开，社会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时人誉为“昔时称为小杭州，近日名曰百有国”。



昔时，华盖山上遥望东门永川路浦边码头，
可见舟楫纵横的场景

到了抗战初期，温州又迎来一次短暂又特殊的发展机遇，出现万商云集、市场兴旺、工业崛起的繁荣局面，被誉为“小上海”，工商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战前。为何温州会在战时成为“小上海”？抗战时期，温州在大后方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哪些特殊作用？

短暂的安定

温州港是一个千年良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温州就出现了原始港口的雏形。唐代，温州港已能通达国内港口城市，还有航线与当时日本、新罗相连。宋元时期，温州相继设立市舶务、市舶司，是全国重要的港口城市。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增辟温州为通商口岸后，大量洋商涌入，形成了“瓯为海国，市半洋商”的局面，温州逐渐向现代化港口城市转型。

民国时期，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温州在浙江省之南，瓯江之口。此港比之宁波，其腹地较广，其周围之地区皆为生产甚富者，如使铁路发展，必管有相当之地方贸易无疑”。可见当时温州港已经备受瞩目。



从邵度先生拍摄的瓯江晨曦中，可以看出当年温州港的繁忙景象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沿海港口城市更是首当其冲。如上海、大连、旅顺、广州、天津以及一些内河港口城市南京、芜湖、武汉等都相继沦陷。

温州由于位置相对偏僻，又尚未修建铁路，内陆交通不发达，一开始没有引起日本侵略者的重视，是屈指可数尚未沦陷的沿海港口城市之一。因此，在全面抗战爆发的一段时间里，日军对温州港封锁不严，温州在抗战初期保持着安定的局面。

正如瓯海关贸易报告中描述，1938年“本年国内商埠，贸易蹇滞或完全停顿者不一而足，温州地方秩序较为宁靖，商业乃见繁荣”，到了1939年更是“温州地方秩序较为宁靖，商业突见繁荣”。

冒险与商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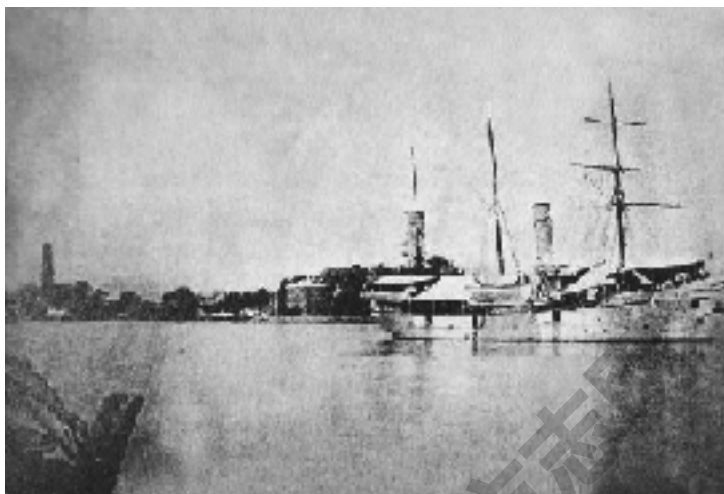
短暂的安定带来了机遇，温州人凭借独有的精明与冒险，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时机。抗战初期，温州工商业在全国一片萧条的情况下，迈上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1937年8月25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我国沿海（开始封锁上海至汕头线，以后扩大到全线），禁止我国船舶行驶。这时的温州港也只有美国美孚火油公司和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船舶继续航行。

在华船停航、海运几乎停顿之后，温州市场的物资极为匮乏。温州商人骨子里的精明与冒险精神此时开始显现，他们敏锐地发现日军的封锁主要针对华籍船舶，不敢公然侵犯其他国家船舶的航行权。为了增加货源供应，温州商人开始联系英国籍的轮船公司，让他们派船载运货物来温州。

1937年10月间，英国陶格拉斯轮船公司的“海阳”轮和乔治公司的“神华”轮，分别自香港和上海载运白糖至温州。这一尝试揭开温州港繁荣的序幕。此后，大批外国轮船公司纷纷派轮前来，至1939年往来温州港的外轮已多达70艘，分属英美德意等9个国家的30家轮船公司，往返于上海、

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通商口岸。



1903年，外国船舶在瓯江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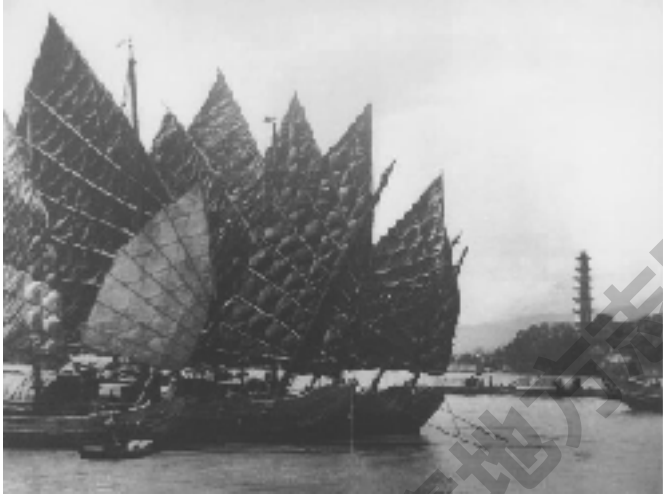
温商的精明还不仅于此。除了外国货轮运输物资之外，温州航商和轮船公司还与外国的船只或者是洋行挂钩，由外国洋行或公司出面经营，船上悬挂外国旗帜并雇佣外国人担任船长，改头换面的轮船便可继续在中国沿海各港口畅通无阻。如温州惠商汽轮局的“三利”改名“鲁德（Rota）”，戴源大船行的“捷盛”改名“民和（Minho）”，华盛汽轮局的“华茂”改名“大茂（Dama）”，由葡萄牙航商出面经营；华泰船务行的“通利”改名“爱大（Ai Da）”，由匈牙利航商出面等等。

由于船舶数量有限，温州航商还向上海、宁波等地租赁船舶，以同样改换名称、国籍等办法加入运输。此外，一些小汽船、木帆船也买通门路，挂起外国旗帜，往来于温州附近港口，进行短距离运输。

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些方法都是比较安全的。

1940年7月以后，由于日军加紧对温州港封锁，国民党政府为开展对敌经济斗争，颁布一系列禁令，对进出口物资实行管理。这使得轮汽船运输日趋衰落，但木帆船的运输仍然十分活跃。船商们利用其小巧灵活等

特点，化整为零进行走私，把内地各省农副物资先运至沈家门或温岭江厦等小港渔村，再由那里转至敌占区；又将敌占区的工业品通过这些渔港一批批地贩回，使温州港的繁荣又持续了一段时期。



瓯江上航行的船舶

温州商人不仅敢于进行沿海冒险运输，还在敌占区内开展商业活动。当时内地大批客商来温办货，温州各业商号批发业务急剧上升。为了满足紧缺物资的需求和批发业务迅速增长的需要，不少温州商人前往敌占区采购，开拓货源。如中药业的葆大、元昌参号，派专人长驻上海，搜购敌占区出产之药材，业务迅速扩大。颜料业的益华丰，也因在敌占区做生意，获利甚巨。此外，商人们还通过陆路，采用单帮肩挑，以富阳、宁海等所谓阴阳界（边缘区）作为交流点，与杭州、宁波等敌占区进行贸易。

空前的繁荣

伴随大量船舶的涌入，温州港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详见下表）。1938年，温州港的进出口货物值共达5623643元，不仅是抗战期间最繁荣

的一年，也是 1949 年以前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比 1937 年增加 3.56 倍；港口吞吐量约 70 万吨，比抗战前历史上最高的 1930 年的 30 万吨增加 1 倍多。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年份	进出口货物总值	物价指数	按1938年不变价格计算	相对1938 (%)
1938	56203643	100	56203643	100
1939	65908740	221	129822959	53.1
1940	96344265	641	15030307	26.7
1941	120129187	1473	1366544	0.2

再加上浙北沦陷，省政府南迁至金华、丽水等地，大大增强了温州港经济腹地的政治向心力和人口的聚集，突显温州港在特殊历史时期发挥的巨大作用。

正如 1938 年上海《孤岛》周刊发表的《国防前线的温州》一文中提到的：“温州，这是一个幽静的古城，在浙省瓯江的南岸，东临大海，西有重山，气候的温和，山水的优美，物产的丰富，古色古香，真不愧为东方的瑞士。自全面抗战发动后，它站在国防最前线，地处水陆要冲，肩负了非常重大的使命。”

抗战爆发以来，由于战火蔓延、交通阻塞，内地各省正常的商品流通渠道被切断。温州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后，轮汽船可较为安全地往返上海等口岸，于是闽、赣、湘、鄂、川、滇、黔等省大批物资便纷纷通过浙赣铁路和金（华）一丽（水）一青（田）公路、瓯江水路，集中到温州出口。而所需大批工业品等物资则从温州进口。温州迅即成为大后方沟通沦陷区的重要口岸，成为内地各省物资的集散和转运中心，因此有了“小上海”之称。

除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等民用物资外，大量军需物资也通过温州港运输。



日军侵占温州城

1937年，温州港进口洋货中，大宗商品以煤油、柴油、白糖、石蜡为主；1938年，温州港“进口洋货，除少数外，余均激增，尤以糖平为最，计由15701公担增为20439公担。石蜡次之，由9512公担升为12248公担。烤皮亦自500公担进至11127公担。余如硫酸铵、火麻、氯酸钾、金属制品、人造靛、燕窝、巴拿马草等，上年毫无输入，本年则均为主要舶来品也”。这里的柴油、煤油、硫酸铵、氯化钾以及金属制品都是在军事方面有大量需求的。

1938年7月，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在县前头成立。采购处经过温州转运上海等地采购来的大量军需物资，以及南洋爱国华侨资助、捐赠的医药用品、军械等，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和华中根据地。同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以上海红十字总会的名义，在温州采购办事处内附设办事机构。他们与中共浙江省委领导的温州、平阳、丽水等地新四军办事机构互相配合，将首批抵温的700多名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以“难民开荒”的名义送赴皖南参加新四军；当时，中共中央曾来电表扬：“能在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成功的壮举！”这中间有温州采购办事处的一份成绩。

到了1939年，温州港由于受到了日军军事行动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在军需物资的运送方面却逆势而上。“就进口洋货而言，铅块上年毫无输入，本年跃居首席……次为石蜡……余如运货汽车及其构件，上年统计中毫无所有，本年列入重要舶来品之林。润物油进口数量亦激增倍蓰”。这些也都是重要的军需物资。

进入1940年之后，温州港“主要进口货物，为橡皮制品、帽缏、马达货车及铅块等”。虽然此时的温州港已遭日军封锁，仍有一小部分商船在战火纷飞中携带军用物资来往于温州港。可见抗战爆发之后温州港的军事意义。

兴盛的市场

温州港在抗战初期成为沟通沿海各港口和抗战大后方的桥头堡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这种繁荣对于温州以后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新兴行业应运而生：

1、船务行：随着海上运输发展，专营海上运输业务的“船务行”蓬勃发展。船务行向上海租用或代理外轮行驶，最盛时多达五六十家，业务较大的有华盛、戴源大、吴聚顺、王兴仁等。

2、转运行：随着疏运进口物资的需要，大批代客提货、运货、报关、纳税的“转运行”迅即出现。最盛时，仅东门和西廓码道边上就达百家以上。转运行负责报关，一般还包办温州至金华一段的汽车、民船、手推车等运输业务。还有一家专为上海茶商运输积存茶叶的机构“上海驻温洋装茶叶办事处”，有十余人驻温办事，负责转运茶商们积存在皖赣等产地的外销茶叶。

3、批发商：抗战时期，内地大批客商来温采购货物，批发业务急剧增加。各商号都纷纷把重点由零售转到批发。最盛时棉布业批发号多达30余家，有厚丰、翔丰、源康、宝大等；百货业批发号有20余家，如国货公司、

锦彰、同益、惠大等；此外，颜料、五金、煤油及中西药批发业务蓬勃兴起。



宝大商行（郑鹏摄）

4、居间行：当时在温集散的各地山货繁多，于是出现了一批代买卖双方作成交的“居间行”。按货物产地不同，分“闽货行”和“山货行”两大类。山货行（经营木材、桐油、屏纸等）仅西门一带就达40余家。



清末温州南大街

5、银行、钱庄等金融市场兴旺：大批客商涌来温州，存、放、汇款业务大大发展，银行、钱庄也随之增加。那时，温州有中国、交通、农民、中国实业、瓯海实业、温州商业等 8 家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钱庄则有 33 家。因温沪钱庄长期有挂钩，可运用本票、汇票、期票等方式便利客户，因此钱庄占了优势，业务占比大大超过银行。许多钱庄还兼做其他生意，如顺源钱庄除开设南货、油行、棉布、百货、铁行等商店外，还做金、纱、布、药、土特产等生意。



交通银行温州支行旧址

随着商旅云集，旅馆、餐馆、酒楼等服务行业也成为热门行业，市内旅馆多达百余家，餐馆、酒楼林立，影院、戏院等相继开办。

民族工业崛起

随着商业发展，温州的工业也迅速崛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温州近代工厂，大都在这段时间先后创办。如富华染织厂（1938 年改鹿城布厂扩建而成）、浙江制革厂（1940 年建）、西山瓷器厂（1941 年建）、清明化工厂（1942 年建）、大明蜡纸厂（1942 年建）、康乐药厂（1942 年建）及大路、大乐、

统纬纺织厂（均 1942 年建）等。

如西山瓷器厂就因抗战以来洋瓷供应困难，而大后方急需军用、民用陶瓷，爱国工商业者吴百亨便将所办“百亨药房”和“百好炼乳厂”中的利润一部分转作兴办瓷器厂。清明化工厂因国外进口的硬脂酸、煤油、柴油等物资来源断绝，由商人王文川出资兴办。康乐药厂也是由于外界急需药物，由“金龙大药房”老板徐定龙集资兴办。纺织工业因内地市场扩大、棉布畅销，大小棉织厂由战前 9 家迅速发展到了 33 家。

一批老厂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百好炼乳厂，产品原销于闽、浙、苏等省，此时则远销赣、鄂、湘、川、黔、滇等内地各省，年产炼乳增至 2.6 万余箱（每箱 48 大听），奶油 20 万磅，1940 年营业额达 80 余万元，纯利 12 万元。毓蒙铁机厂原来只能生产弹棉机、锯板机，此时已能生产碾米机和 50 匹马力发动机，并于 1941 年将部分机器迁往丽水大港头，发展起“丽水工具制造厂”和“铸造车间”，为战时服务。

当时的战略意义

温州港的繁荣还是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939 年 4 月 20 日，日军开始对温州进行频繁的空袭，轰炸目标集中在温州港进出的咽喉——东门码头区一带；6 月 27 日，日本海军发出警告，声称将封锁瓯江，禁止船只进港。1941 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3 日之间，温州第一次被日军占领。

从 1942 年日伪主办的《大东亚周刊》发表《浙江日军占领温州》所加的按语，可以看出温州地理环境特点，以及当时温州在军事上的战略意义：“温州为浙江东南都市，俗称永嘉，与海外交通开始极早，是为沿岸航路中心，出入船舶云集。事变（指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与宁波、海门、福州等皆为渝方（指西迁四川的国民党政府）之密输路据点。前年（指 1940 年）六月，其附近水域曾遭日海军封锁。”

此后，温州于 1942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5 日、1944 年 9 月 9 日至

1945年6月18日两次沦陷。特别是1944年9月日寇第三次侵占温州后，因为占领时间较长，使特定的环境起了变化，温州工商业经济趋向衰落。



日军轰炸后市民在灭火（邵度摄）

1945年6月20日，英国伦敦《约克郡邮报》军事评论家对我军克复温州称：“温州乃华东沿海之军事战略要点，故华军现居于威胁香港及上海之优势地位。华军向上海及长江口推进，对盟国之全盘计划有其重要性。”可见当时温州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

参考材料：

《温州近代史》 胡珠生 著

《温州近代交通史研究》 丁贤勇、常晓强 著

《抗战时期温州工商业发展的独特道路》 徐定水 著

《抗战初期温州港畸形繁荣局面探析》 方秀枫 著

《抗战时期的温州工商业》 吴杰 著

《温州在抗战期间为何三度沦陷？》 原载温州网

九柏园头事件

施菲菲

在《中共温州党史》第八章第一节，详细记录了发生在抗战时期温州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事件——九柏园头事件。

九柏园头在公园路的中段，小巷深处有一座四合院，是温州市政府于2006年3月确立的温州文物保护单位：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旧址。抗战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的主要交通站。

驻温州通讯处的建立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期，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与国民党当局商定，新四军可以在游击队原驻地和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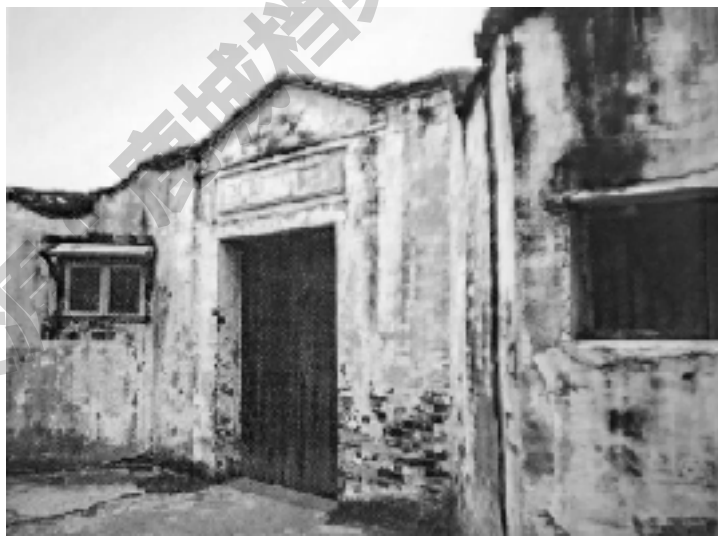
从1937年9月至1940年年底，南方各地共建立了50多个新四军的办事处、留守处、联络处、通讯处等机构。

当时的浙江省有4处这样的机构：温州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和“新四军驻浙

江丽水办事处”。新四军驻浙南的办事机构各自独立又互相配合，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九柏园头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原为1937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共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办事处，于1938年3月改名为“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周饮冰。

周饮冰（1913—1942），是平阳水头誉满乡里、家声传四方的名门“全升内举人居周氏”后裔。他从小就聪明好学，多才多艺，曾为浙南著名画家苏味朔的入室弟子，还自学刺绣。上世纪三十年代，周饮冰子承父业，在家乡教书。在中共地下党黄先河的引领下，周饮冰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担任瑞安仙降中心区区长，1937年，受中共地下党的指派，在温州城区以开绣花店作掩护，建立白区工作秘密联络点。同年12月，中共地下党在九柏园头17号周饮冰寓所，成立了中共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为吴毓，周饮冰任办事处副主任。



鹿城区公园路九柏园头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旧址

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机关迁至温州城区后，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成为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的主要交通站。刘英经常在这里办公，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谢文清、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长赖大超常驻于此。党内一些会议也在17号大院召开，公文、宣传品的油印工作也在这里进行，上下级来温工作的人员经常在此大院进进出出。

驻温州通讯处遭破坏

1938年10月10日，一群军警受温台戒严司令部第三战区代司令薛岳的密令，冲进通讯处。他们翻箱倒柜地搜查，在一个箱子里找到几份宣传抗日救国的文件，就以此为借口，认定这些文件是“非法秘密活动的证据”，查封了新四军驻温通讯处，逮捕了正在通讯处办公的六位同志：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谢文清，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常委、青年部长赖大超，省委文书郑香山，机要员徐惠泽，通讯处工作人员黄美平、王昭日。六位同志被押到温台戒严司令部。

10月11日，因事外出的通讯处主任周饮冰得知六位同志被逮捕的事件后，奉刘英的指示，前往戒严司令部提出抗议与交涉，也遭敌人扣押。

刘英得知又有一位同志被逮捕，立即密电报告新四军军部。10月16日，党组织派吴毓以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到戒严司令部交涉。吴毓还带上省委书记刘英写给7位同志的信，到看守所看望他们，指示他们要团结一致，坚持斗争，静候营救。

到了10月下旬，敌人把7位同志押送到安徽屯溪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看守所。1939年春，7位同志又随同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迁移转到江西上饶。

“九柏园头事件”引起社会各方强烈反响。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江西上饶视察，他与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温州通讯处被捕人员，还向浙江

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提出抗议。周恩来到看守所看望被捕同志，特地会见了周饮冰，要周饮冰转告大家：在狱中仍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并送给他们 100 块银元作零用，还交代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按月接济被捕的同志。

国民党省政府、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始终没有解决这件事。

关押在敌人看守所的同志与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还组织特别党支部，谢文清任书记，赖大超任副书记，周饮冰任组织委员。在特别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多次组织越狱，但都没有成功。1942 年 6 月，周饮冰被国民党杀害；郑香山、黄美平与徐惠泽被敌人残酷折磨，在狱中病死；谢文清在押送途中逃脱；赖大超被董必武营救，于 1945 年 2 月出狱。

驻温办事机构的历史功绩

新四军驻温通讯处、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三个机构，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那段时期，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新四军革命斗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首先是开展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在当时，其实新四军驻温通讯处是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的机关。通讯处建立后，一些与党组织联系不上党员找到了组织，重新参加了革命。1938 年 8 月《浙南特委关于健全支部工作加强党内教育的指示》文件下达后，在中共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健全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在各县相继展开。至 1939 年 5 月，浙南地区党支部发展到 608 个，党员从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的不到 400 人，发展到 7291 人。1939 年春，周恩来莅临浙江视察时说：“在东南战线上，浙江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各省效仿的。”

二是接待输送抗战兵员。各办事处致力于输送抗日兵员。通讯处为了向新四军和八路军输送干部和进步青年，开辟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由温州经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寿昌，通过皖浙边界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兵

站（经这条线路去皖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的就有 240 多人）；另一条是由通讯处介绍进步青年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转赴延安。这其中有从上海、江苏转来的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有通过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直接输送的。

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还动员、介绍输送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皖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1938 年，平阳临时中学的阮世炯、金冶、许布洛等 14 名青年学生，由项经川联系，经新四军闽浙边后方留守处直接介绍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

三是采购运送抗战物质。1937 年冬，温州港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是同敌占区各地经贸往来的中转口岸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物资集散地之一。新四军驻温州的办事机构便成为向新四军输送物资的重要渠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给新四军捐献的大批被服、药品、军械、医疗器械与款项，大都通过采购办事处转运到皖南新四军军部。1938 年夏，红十字会以运输医疗用具的名义，秘密从上海运来一批印刷设备到温州。1939 年初，采购办事处安全地把数百吨物资分批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

四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新四军驻温州各办事机构以合法组织身份，利用一切机会担负起抗日救亡宣传的任务，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各机构大量印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告，散发各种进步书刊报纸，还联合其他各类文化团体进行抗战宣传，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8 年 3 月，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组织一支以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员为主的新四军流动宣传队，在平阳、泰顺、瑞安城乡之间演出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并散发书刊、报纸等宣传品，扩大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力。

五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助力。各办事处致力于做好地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还与国民党平阳县县长徐用和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强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 年 5 至 6 月间，徐用到北港巡视工作，后方留守处邀请他到山门乡检阅由共产党组织起来的抗日自卫队。黄强出任北港区抗敌后援会会长，该会根据中共《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制定了《平阳县北港区抗敌救亡后援会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在当时上海《译报》上登载。

每次外地伤兵途经温州，通讯处总是发动各界人士赴码头迎接，并且帮助伤兵与各方交涉，解决有关医疗、安置等问题，取得了各界团结抗日的良好成效。

“九柏园头事件”标志着浙南乃至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破坏和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从此，浙南地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

为了弘扬红色文化，2021年6月30日，公园路九柏园头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旧址纪念馆正式开馆。



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旧址纪念馆经整修后重新开馆（沈耀进 摄）

纪念馆以文字图片、实物场景、音像展示等多种形式再现了发生在九柏园头这段鲜红的历史。展厅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主要介绍了通讯处成立的背景，包括新四军的组建、浙江国共和谈、全面抗战等；第二单元“建立机构 致力抗战”，主要介绍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办事处、新四军驻闽浙边后方留守处等新

四军办事机构的基本情况；第三单元“风云突变 严峻考验”侧重讲述了“九柏园头事件”的缘由和历史影响。

走进九柏园头新四军驻温通讯处旧址纪念馆，一幅幅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一段段震撼的投影，述说了抗战时期，英雄的瓯越儿女浴血奋战的革命经历。

“九柏园头事件”的情节在历史的长河中离我们渐行渐远，革命先辈为信仰浴血奋斗的红色事迹却走进每一位来纪念馆瞻仰的参观者心里，先烈对革命忠贞不渝的精神在宣传之中发扬光大，将成为新时期建设者巨大的革命动力。

过去的峥嵘岁月、感人的红色故事，会产生激烈的灵魂震荡，红色的烙印将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每个人的心坎里。先烈们甘洒热血写春秋，同生浙南热土，同饮瓯江碧水的瓯越儿女，我们应该用怎样的言和行来抒写新时代的宏伟篇章呢？

冯增荣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徐小南

一、冯增荣同志的革命经历

冯增荣，1925年12月19日出生于温州城区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七岁上小学，其间阅读过张天翼、高尔基、萧红、田军等名家的革命文学作品，还和思想进步的同学一起上街演讲。十三岁考取初中，在中学时参加永嘉县抗日学生联合会，十四岁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和温州城区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中学毕业后，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1941年6月，调温州城区区委工作，先后任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秘密翻印《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主编《红旗报》。1942年9月以后，受党指派打入敌人内部，隐蔽在浙西一带，写些小作品发表在《浙西日报》。1945年7月，重返浙南根据地，在永嘉县城区任区委书记、县委宣教科科长，江北中心区委书记。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兼任泽临区（藤桥区的前身）委书记。1949年4月，任青田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奉命率部队配合“二野”解放青田县城。解放初期，兼任县府秘书长、纪委书记、县团委书记等职。其间，还为《浙南日报》《解放日报》等写了许多新闻稿。1951年9月，调温州市工作，任温州市文教局副局长、局长、温州市中校长。1957年被错划“右派”，受到批斗，后又误认为他“叛变革命”，于1958年8月作

为反革命犯关入牢狱。在牢狱和劳改场所含冤苦度 22 年零 2 个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 1980 年 9 月 19 日，沉冤得到平反。平反后，他自愿要求到省文联工作，负责筹备恢复东海文艺出版社，并一度负责《江南》编辑部工作。1983 年 12 月，因病提前离休。

冯增荣同志自幼好学，兴趣广泛，思想活跃，上进心强，喜爱诗文、书画、金石等，并有造诣。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诗歌数百首和散文、小说等作品。曾在《人民日报》《温州日报》《江南》《清明》等多家报刊上发表。出版有诗集《感情的风》《风雨情缘》《真虹诗选》和散文集《生之痕》等。同时，潜心攻研书法，曾多次在省内外参与展出和获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浙江省文联老艺术家书画社副社长，浙江省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其业绩入选《当代温州人物》《当代中国名人录》《世界名人录》等辞典。

纵观冯增荣从少年到老年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位成熟老练、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他出生入死、历尽磨难，灵活地运用斗争艺术，特别是把党的群众思想运用到炉火纯青的高度。我们截取冯增荣青年时期一段革命斗争历程，来说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二、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基本信息，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前提

在红军时期，泽临山区的“三坑一田一坳一坪”（东坑、西坑、利八坑、田塘头、白脚坳、黄茅坪）等 6 个村庄遭到重创，被敌人实行“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据统计，西坑被杀 10 人、田塘头被杀 10 人、白脚坳被杀 14 人、东坑被杀 5 人，革命根据地被敌人搞得乌烟瘴气，革命一度处于低潮。没有被敌人抓捕的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一时蛰伏下来，等时机成熟东山再起。山区根据地人民和红军战士经过血的教训以后，以隐蔽、零星、分散等更加灵活的斗争形式和敌人展开斗争。1944 年，中共浙南特派老红（郑伯永）同志到“三坑一田一坳一坪”等村，寻找共产

党员和原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商讨共同建立抗日据点。1945年，程美兴、张金发、孙经邃、郑伯永、吴荣膺先后来到此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1946年2月，在中共永嘉县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要在纸山重建中共永嘉县委。同年春，中共永嘉县委派冯增荣、白正会到藤桥地区开展秘密活动。此时的永嘉县委较好地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他们走一地发动一地、巩固一地，逐渐建立起农村基层党组织，使党组织发展壮大，成为革命骨干力量。1946年7月间，冯增荣来到东坑村。当时他还是20出头的青年，别看他年轻，已有着7、8年的党龄和地下斗争的经验。他从城市出生、生活，有着城市人的生活习惯、衣着打扮、口语口音，但他彻底改变了这些习俗，把自己变成彻头彻尾的山区农村人，以方便工作。他来东坑村前，在周边村里做了调查了解，还到当地村里进行调查了解。哪家农民苦大仇深？哪家农民对国民党不满？哪家农民和原来红军有关系？哪些农民思想进步？哪些农民常走外地见多识广？谁是村里的保长、人品好不好等等。徐康建、徐康辉、徐康周是第一批被了解到的对象，徐康建是当时东坑村保长，也是当年蛰伏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员；徐康辉有杀父之仇，因为徐康辉之父也是红军游击队员，于1942年6月21日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后被秘密杀害，尸体至今未归；徐康周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极为不满早有反抗之心。冯增荣地下工作真的有一手，把革命的道理跟三人一说，一拍即合。1946年7月的一天，在徐康辉家里，经冯增荣介绍，徐康建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同年8月的一天，在徐康辉家里，经冯增荣介绍，徐康辉、徐康周俩人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具有三位党员就可以成立党支部的条件，当即作了选举，徐康建担任支部书记，徐康辉为组织委员，徐康周为宣传委员。红军时期东坑的第一个党支部被破坏后，又一个党支部诞生了。从此以后，东坑地下革命有了党组织领导，有了斗争的方向。经徐康建、徐康辉、徐康周三人的介绍，一年多时间里，有二十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

冯增荣在东坑开展地下工作、发展地下党组织这么顺利，和他能够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信息是分不开的，和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紧密团结和依靠群众，是开展地下工作的保证

东坑等村是纸山的一部分，隶属泽临区，与泽西区为邻。这里群众觉悟高，革命基础好。“三坑一田一坳一坪”和岙底乡、藤桥乡、泽西区大部分村庄，都是山水相连道路互通的。每个地方都有亲眷朋友的关系，这为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为了吸取红军时期被敌人惨遭屠杀的经验教训。此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更加注意人身的安全，为此在根据地的每个村建立起交通联络站。仅东坑村就有6个交通联络站，他们互通信息，一旦有敌情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地下党领导人手中，以便作出分析、判断、决策，然后进行战略转移，保证人员生命安全。当时的交通联络站，西坑有徐定聪，东坑有徐康辉、徐康周、徐康南，利八坑有王加茂、徐岩兴，三新有王增桑，田塘头有郑考瑞，白脚坳有徐兴弟母，江心田有陈元媤，泽西茅竹岭有裴庆生，小旦有夏宝焕，朱下有徐益茂等，组成一张安全网络，有力地保障了当时地下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

这些交通联络站，其主要任务：一是接送革命青年入伍；二是传递文件运送物资；三是掩护和运送南北部队和干部安全横渡瓯江。

四、建立血肉相连和鱼水情深的关系，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关键

据冯增荣回忆文章记载：我至今还忘不了在西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的那一幕幕庄严而热烈的情景。

西坑支部书记徐成聪，是勇敢而文静的青年，为了帮助部队加强武装装备，只身潜入温州城区，利用关系从国民党的军械库里购得一挺轻机枪，

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以后的战斗中派上了大用场。根据地群众能用自己的生命去购买武器装备，与地下党和游击队打成一体，实在是革命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到家。还有徐成桃和他妻子阿钗，她很有革命觉悟，把过往的交通员、战士和干部一律当作兄弟，奉为上宾。即使无米下锅，宁可自己忍饿，也绝不让革命同志饿肚子。县委短枪班的同志受到她招待的机会更多，感受也更深。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地下党真是鱼水情，骨肉相连。一次冯增荣在东坑党员徐康周房屋楼上印刷党的宣传品，楼下突然闯进一队国民党的军警。女房主程金翠全无惧色，从容应对，终于化险为夷。这是一种用自己生命来掩护和支持革命的无畏行动。东坑厂坳自然村只有三四座房子，这里自然环境偏僻，隐蔽条件好，加上根据地人民对地下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徐岩兴又是三十年代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当时括苍部队伤员李振华（离休前任浙江省军区后勤部政委），由医师张迈君等护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隐居于党员徐岩兴家里，得到这位党员全家地细心照料，从未走漏风声。这标志着根据地的巩固和群众的成熟。

五、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作风，是我党优良的传统

冯增荣在 22 年的蒙冤得到平反以后，1983 年提前离休。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重走当年打游击和开展地下工作的根据地，看看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1984 年 8 月的一天，冯增荣来到东坑村，得知东坑地下党员“白皮红心”徐康建和田塘头革命积极分子郑中法被怀疑为叛徒特务，于 1947 年冬遭到错杀，东坑由自己亲自创建起来的地下党支部和后由白正会创建起来的地下党支部，由于宗族矛盾原因，造成两个支部闹矛盾，互不团结。1948 年，白正会擅自宣布两个支部统统解散。东坑村的地下革命活动，由于“白皮红心”地下支部书记被错杀和两个地下支部被解散，因此销声匿迹，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冯增荣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事实的真相告知东坑

村的两委和在座的老同志（当年由冯增荣介绍入党的同志）。他像自责似的说，当时我们的工作太轻率了！犯了极左思想的错误。据说临江乡横山村有两个知识青年，向往革命投奔根据地，结果被怀疑为特务也惨遭错杀。

这次重回革命根据地了解到的情况，对冯增荣触动特大。回到温州市区以后，他马不停蹄的督促有关单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把过去的错误纠正过来。该平反的平反，该落实政策的落实政策，该抚恤的抚恤。

历史的真相终于大白。浙瓯委（85）98号，关于同意给徐康建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的批复；浙瓯委（85）65号，关于给东坑村两个地下党支部恢复名誉和十八位同志恢复党籍、三位同志更改党龄的批复；浙瓯委（85）36号，关于给徐康周、徐康辉同志恢复党籍的批复；瓯政复（85）18号，关于同意给徐康辉同志作退职处理的批复和恢复党籍；瓯政复（85）19号，关于同意给徐康周同志作退职处理的批复和恢复党籍。

由于冯增荣同志严格的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陈冤平反昭雪，还受害者一个清白，还历史一个真实面目。党的温暖重新回到群众的心里。

六、关心老区生活维护群众利益，是我党的民心工作

1984年8月，冯增荣同志重返双潮革命老区，目睹东、西坑至潮埠的道路被山洪暴发冲塌，牵挂在心。12月29日，他写了一封书信给当时双潮乡党委书记徐文杰。从书信中看出，冯增荣同志非常关心老区群众的生活和老区的基础建设。书信的内容如下：

文杰同志：

你好！

此次双潮之行，多谢你们热情接待。

通往东、西坑塌坏的道路，一直挂在我的心中。回温后，即找温强生同志商议，

温强生同志同意丹麦华侨一万元外，尽力设法帮助你们再筹一万元。

希望你亲自抽空尽快到温州来一次，直接找温强生同志具体接洽，来时请带你乡在外华侨的名册，作为研究参考。

道路修复之后，我建议在路边立碑纪念。说明这条路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修复的经过，出钱出力者的姓名，以及全乡各村群众的努力。碑文请温州师院副教授蒋文钦起草，他也是藤桥山区打过游击的老干部，此事，我已征他的同意，代你们作了请求。

立碑有两个作用：

1. 宣传当年革命事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2. 有利于筹款和调动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

碑文起草好以后，我愿意代为书写。

筹款之事，请多与温强生同志联系，他能鼎力相助，估计有可能办成。温强生同志的办公地址：温州市鹿城路 30 号温州经技总公司建筑分公司。家庭地址：水心路 41 弄 12 号。

此事我已再三拜托温强生同志。他的意见专款专用，不要移挪他用，也可以造好预算，边开工边筹款。总之，请你亲自与他多作联系和研究。

我再过几天就要回杭州去了，请原谅我不能再较多地参与其事。当然碑文我一定代为书写。

至此，祝

一切顺利！

冯增荣

十二月九日

该书信现收藏在瓯海区档案局。

冯增荣同志，14 岁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学时期成为革命家，解放后蒙冤遭 22 年牢狱之苦，平反后，更多时间从事文学诗歌创作和书法研究。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多有思考，特别是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满怀感恩之情。他是根据地人民的革命引路人；他是纠错洗白实事求是的大恩人；

烽火
岁月 /

他是关心根据地人民生活的贴心人；他是工作认真细致不会“摸堂钟”的革命人。他常讲，没有根据地人民的番薯饭、南瓜汤养育我们，哪能有革命的胜利！

冯增荣同志的革命经验，在对敌斗争中，发动群众，维护群众，保存自己，打击敌人，消灭敌人，配合全国革命力量，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艺术，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仍有借鉴意义。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不论是健在的还是牺牲了或者逝世的，他们留下的革命理想、革命路线、革命精神、革命作风、红色基因，我们要永远继承、发扬、巩固、创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写好红色文化这篇宏文巨作，使革命前辈打下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中共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岳松主编《泽临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年

9 月第 1 版

中共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编、李岳松主编《田塘头风情》中国线装书局，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 2 月第 1 版

浙瓯委（85）36 号、65 号、98 号、124 号，瓯政复（85）18 号、19 号文件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整理《党的群众路线基本观点》，

2013 年 8 月

责任编辑：褚宏健

南宋名相周必大与永嘉学人

胡健雄

南宋名相周必大（1126—1204），江西庐陵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四代老臣，为官四十五年，累官吏部尚书、右丞相、左丞相，封益国公，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两百卷存世。他是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与欧阳修、杨万里是老乡兼好友。周必大虽在学术思想上倾向于朱熹理学，但与永嘉学派的“中坚力量”有着很深的个人友谊和渊源，并因此在“庆元党禁”中被冠以“伪学”和“逆党”领袖，与永嘉学人共沉浮。

据清代《宋元学案》说法，永嘉之学源出二脉，一为“永嘉九先生”，二为汝阴学人袁道洁。

“永嘉九先生”即“元丰九先生”，因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永嘉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赵霄、张辉、戴述等九人去汴京太学学习，研究“伊洛之学”而得名。其中为首者周行己（1067—1125），字恭叔，瑞安人，曾在温州城区谢池坊筑浮沚书院招生讲学，世称“浮沚先生”，名气很大并影响后世。如南宋“永嘉四灵”翁卷《题周氏东山堂》诗中第一句就是“城隅古谢村，博士草堂存”；福

建古田前洋村建于清初的余家大厝，柱子上有一幅对联：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朝文；室有余香宝桂谢兰周氏草。其中“周氏草”，指的就是周行己建于谢池积谷山的博士草堂，亦称“东山堂”。

周行己与周必大虽在人间没有交集，但冥冥中却大有关联。周行己晚年应太学旧友、郢州知府王靓之聘入幕府，后病逝于山东郢州。王靓不但出钱出力为之料理后事，还奏请朝廷将周行己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并派人护其灵柩回瑞安湖岭，“贤愚俯仰一抔土，伊洛渊源百世师”（清林青云《谒周恭叔墓》）。周行己去世的第二年，王靓的外孙出生，名为周必大。

永嘉之学的另一脉则为程颐弟子、汝阴人袁道洁所传。永嘉学派重要人物薛季宣（1134—1173）即师从袁道洁。

薛季宣少时随伯父薛弼宦游各地，十七岁时，在岳父处读书，随袁溉（字道洁）学，并得其所学，通礼、乐、兵、农。绍兴三十年（1160），他以二伯父昌年恩荫鄂州武昌知县，后迁官大理寺主簿。

薛季宣将所学传之陈傅良，再由从学陈傅良四十年的叶适，开流纳泉集大成，倾力薛、陈之事功，吸收二程之心性，令永嘉之学发扬光大、独具特色，从而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

二

周必大对“永嘉之学”集大成者叶适，是有知遇之恩的。淳熙四年（1177），周必大以自己门客的身份，保荐叶适通过两浙东路转运司（漕司）的“发解”考试。次年叶适得以参加“高考”并高中进士第二名，历仕三朝，累官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对此，时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在淳熙六年（1179）给友人的信中道：“前年秋，偶见温州叶适者文笔高妙，即以门客牒漕司。适会有石司户识见颇高，遂置前列，省试幸在行间，廷试遂居榜眼……然叶行年三十，在乡曲木尝发荐，以此知遗才甚多。”

然而宋光宗赵惇即位才三个月，就罢了周必大的丞相职务，受周的牵连，本在朝廷“干得好好”的太常博士叶适，当月就被打发到湖北任安抚司参议官。可见，在皇帝眼里，周必大与叶适就是一伙的。叶适为王十朋的儿子王闻诗写的墓志铭称“周丞相既罢，因以去者多善士”，颇有自嘲之意。

叶适的学术思想多承自陈傅良，但他与陈傅良都对永嘉郑伯熊执弟子礼。所以如果梳理永嘉文脉的话，可以得出这么一个传承关系：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

而周必大与郑伯熊、陈傅良的关系也不错。陈傅良和叶适的老师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与弟伯英皆私淑前辈周行己学说，为洛学再传学者。由是，永嘉之学“周作于前，郑承于后”（叶适语）。至乾道、淳熙年间，“永嘉学者联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宋元学案》）。周必大对郑伯熊非常敬重，并为其诗集题跋：“郑景望学问醇正，见于履践”（《文忠集》卷186），“通经笃行，见谓儒宗”（《跋郑景望诗集》）。

周必大原与陈傅良的交情就不错，其在给永嘉人陈自修的信中说自己与“君举（即陈傅良）交游三十年，心实敬爱不少忘”。陈傅良和周必大二人都注重实务，陈傅良崇尚事功之学，提倡经世致用，周必大承北宋儒学传统，反对空虚不实之风。但后来二人因对湖南税收问题产生分歧，“公而忘私”，以致后来友谊和私交渐行渐远，令人唏嘘不已。陈傅良从弟陈谦，被公认是“周相门下士”，当周必大失势时，陈谦也由枢密院编修官出为江州通判。

三

周必大的政治命运，还因“庆元党禁”事件而与永嘉学子共沉浮。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开始，历时六年的学术大清洗，令永嘉学派的中坚

力量包括五位非温籍门生共十四人，全被列入五十九人党籍名单，永嘉学派因此一蹶不振，而周必大则被指责为“伪学”领头人。

《宋史·周必大传》：“自庆元以后，（韩）侂胄之党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而（周）必大与赵汝愚、留正实指为罪首”。宋史虽然将周必大、赵汝愚和留正三人（三位丞相）列为“伪学”的“罪首”，貌似他们都与永嘉学人关系不错，其实留正因与周必大是政敌的缘故，所以对永嘉学人并不感冒。对此，朱熹看得很清楚：“留（正）疏伪学，以上下文考之，正谓永嘉耳”。可见，庆元党禁的发酵，与留正于淳熙末年以攻击道学为名，专门攻击永嘉之学不无关系。

在庆元党禁中被边缘化的永嘉学派的“政治干部”，包括陈傅良、薛叔似、叶适、蔡幼学及宁波楼玥等，都属于周必大“战队”的。如薛叔似是薛季宣的学生，与陈傅良是儿女亲家，孝宗皇帝为挺周必大，特意将薛叔似提拔为左补阙（一种谏官的官职）。而看周必大不顺眼的光宗皇帝，一上来就把薛叔似的谏官职务给拿掉了。

而陈傅良的学生和同科进士、瑞安蔡幼学（1154—1217，郑伯英女婿）曾累官兵部尚书，永嘉学派主力军之一，在庆元党禁中，也被从秘书省正字发配为福建常平提举。

周必大去世后，宋宁宗于开禧三年（1207）命楼玥为周必大撰墓碑铭。可见，周必大与永嘉学派、永嘉学人还真有点“生死缘”。宁波人楼玥和郑伯英同年，累官吏部尚书、资政殿学士，在庆元党禁中被贬知婺州。楼师从薛季宣，与陈傅良“义兼师友”，自称“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与止斋游，前后三十年”，并为撰《陈傅良神道碑》：“中兴以来，言理性之学者宗永嘉。”楼玥曾任温州教授、乐清知县及温州知州，是推动温州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功之臣。

明代张璁是何许人也？

林绿緦

张璁是明代一位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温州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是温州淳朴民风和历史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和张居正同是明代被皇帝谥号“文忠”的先贤，也是中国官员呕心沥血“一心为公”的代表。

张璁是一位具有政治抱负的人，他13岁时，便有共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在《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

他入仕之途坎坷，七次进京赶考铩羽而归，直至正德十六年（1521）47岁时第八次赶考才中二甲进士，观政礼部，进入仕途。张璁一生政治命运的转折点也正是他初中进士开始的，巧合的是张璁中进士这一天正是明世宗嘉靖继位第24天；嘉靖提出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被群臣反对的第18天。他坚持“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的思想改写了明代历史，帮助嘉靖在明朝中期强势压制了当时异常强大的文官政治，使皇权免遭君主立宪的危机。

正德十六年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无嗣，由朱厚熜继位。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弟，同祖不同父。他想尊称亲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并在继位

第六天便向朝廷提出“尊皇考”的议礼之事，而当时有拥立新皇帝之功权倾朝野的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旧臣，强烈要求他认朱厚照的父亲朱祐堂（也就是朱厚熜的伯伯）作“皇考”，改认亲生父亲叫“皇叔”，亲生母亲兴献王妃叫“皇叔母”，他的母亲也得改口叫他“皇侄”。于是嘉靖坚决不接受。在议礼过程中廷臣们门户之见猖獗，屡屡想方设法反对嘉靖。在其母妃兴献王妃从湖广安陆抵达通州的时候，便对“考孝宗”的事情愤愤不平地说“安得我子为他人子！”朱厚熜本欲登上皇位之后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等进行一番尊礼，结果次次受文官势力反对无法实施，再见母亲也被气得不行，使其产生放弃王位的想法。此时，张璁刚中进士不久，正在礼部观政。他自小就胸怀大志，好打抱不平，且博学多才，在7次赶考未中进士期间曾在家乡温州创办罗峰书院（后被嘉靖赐名改为“贞义书院”）专门讲授“礼”学，平日熟谙史事，精于《三礼》之学。“议礼”则正是他平生学术的强项。再加上张璁出生在父母早亡的高龄家庭，刚出生即被弃养，他在寄养的环境中备受呵护，受到了温州民间最淳朴的民风熏陶，真挚善良！当时已有很多人因支持嘉靖被反对派围攻和打压，并且在杨廷和授意“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的恶劣形式下，张璁冒着生命危险于正德十六年七月三日上疏力主尊兴献王为“皇考”的《正典礼第一疏》。

《张文忠公集·奏疏》有《正典礼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疏》，其第一疏云：

“臣窃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伏维皇上应天顺人，嗣登大宝，乃即敕议追尊天兴献王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此诚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兹者朝议谓皇上入嗣大宗，宜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者，然不过拘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伏承圣谕，以此礼事体

重大，令博求典故，务合至当之论，臣有以仰见皇上纯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谓朝议为当，巩未免胶柱鼓瑟而不适于时，党同伐异而不当于理，臣固未敢以为然也。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指天子）哉！臣立清朝，发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其事。《记》曰：‘修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夫汉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之子，当时，成帝、仁宗无子，皆预立为皇嗣，而养之于宫中，是尝为人后者也。故师丹、司马光之论，施于彼一时犹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七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岂非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臣伏读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夫孝宗，兴献王兄也，兴献王孝宗亲弟也，皇上，兴献王长子也。今武宗无嗣，以次属及，则皇上之有天下，真犹高皇帝相授受者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之者，其公私实较然不同矣。或以孝宗德泽在人，不可无后。夫孝宗诚不可忘也。假使兴献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无后兄之义。夫兴献王往矣，称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无疑也。今圣母之迎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况兴献王惟皇上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父母之义。故在皇上谓继统武宗而得尊崇其亲则可，谓嗣孝宗以自绝其亲则不可。或以大统不可绝为说者，则将继孝宗乎？继武宗乎？夫统与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尝

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或以魏诏谓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殊不知曹壑是时尚未有嗣，其诏盖预为外藩援立者坊，此有为之私非经常之典也。可概论乎？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臣窃敢谓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夫人必各本于父母而无二，议礼者亦惟体之于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礼之大经，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祖宗之明训，而率曹魏之旧章，此臣之所不解者也。臣窃谓，此礼乃天经地义，万代瞻仰，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故大臣平章，小臣献纳，皆分之宜了。臣愚，岂敢误导谏君上以自误于不忠，又岂敢于自献以误君于不孝。惟圣明体察而裁决焉。

（《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

该奏疏正合嘉靖朱厚熜的心意，他看了奏疏大喜，说道：“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全矣！”

接着，张璁上疏第二篇疏奏《正典礼第二疏》后附的《大礼议或问》以一问一答的方式编写。这篇是张璁体会到15岁的嘉靖苦于没有知识储备频频被文官们围攻，特此量身为其准备的用于和廷臣辩驳的议礼相关知识，略云：

“廷臣乃固执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台谏不能开陈，文章击臣，目为谄谀，诋为希进，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无复敢献，遂使万世公议，阻于上闻。夫礼以非礼为非，而非礼亦以礼为非，臣不能自己于言。唐陆：‘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臣愚，虽未之学，其不敢负天子之心，

天地鬼神实临之也。且窃谓非天子不议礼，愿皇上奋然裁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决不可称，则大伦正而大礼定矣。谨录与或人问答之词以闻。”

（《明世宗实录》卷八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癸）

于是嘉靖用张璁的理论连驳礼官。大礼议从表面上看，是一场皇帝与廷臣意见分歧的争论，似乎看来是以杨廷和与毛澄为代表的旧臣们好意劝告朱厚熜，而身为皇帝的朱厚熜不领情，反被刚中进士的张璁钻了空子迎合了皇帝的心意，而导致这些旧臣被打压的悲惨遭遇。而事实恰巧相反，明代以道德衡量来治国没有明确的法制，文官们代表着道德的至高境界，且文官势力意见极难统一，门户之见猖獗，官员拉帮结派组团围攻其它意见屡见不鲜。而嘉靖继位之初，杨廷和等旧臣在朝廷中势力强大，甚至朱厚熜都是杨廷和挑选迎立的，可见嘉靖刚当上皇帝那会是没有发言权的。纵观明朝皇帝们忌惮文官言论避而不朝的比比皆是，朱厚熜如果内心不够强大，是极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放弃皇位的。如果没有张璁的《正典礼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疏》《大礼仪或问》作为理论依据，当时已有想法的朱厚熜是否放弃皇位就不得而知了，从这个事件时间节点上看，张璁在关键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帮了嘉靖的大忙！

嘉靖和张璁议礼的成功，还与朱元璋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制度有关。在中国古代权倾朝野的宰相狭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件屡见不鲜，杨廷和当时就有这个资本。而事实上，杨廷和虽身为内阁首辅权倾朝野，正是因为朱元璋设立的内阁制度，权利极大程度上被限制了，他没有实权，实权被分给了吏、户、礼、刑、兵、工部。除六部以外，明朝还设置了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但权力比监察部大得多，负责官员的纪检和监察工作。都察院的官员被称作御史，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言官”。这个“言官”权力很大，可以“风闻议事”，就是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也可以上奏章弹劾官员，在皇帝同意的前提下就可以直接带队抓人。另一个部门是大

大理寺，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大理寺平常比较闲，只有在三法司会审的时候，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共同审理某项重大案件的时候，大理寺才有活干。所以史书上记载“议大礼”的时候最早正是因为杨廷和极力以“继统必继嗣”的理论煽动群臣欲说服嘉靖听从他的想法，接着只见杨廷和雷声很大，后面就变成小雨点了，仅仅3年不到就顶不住嘉靖的坚持在“大礼仪”中主动退出。

嘉靖坚持尊已故的生身之父兴献王朱祐杬为皇考，母蒋氏为皇太后的称谓问题，也是嘉靖要捍卫自身君主的绝对权力；而杨廷和的坚持则是当时内心过分膨胀，其选择远离豹房远在湖广安陆藩邸出生的15岁嘉靖，便是他综合各方面因素为了提高和巩固阁权特意选择的，当时嘉靖提出尊亲生父母的议礼要求，杨廷和便刻意避开圣贤之说欲搪塞过关。随着嘉靖皇权意识的觉醒，逐渐发觉杨廷和等人不但和他对着干还在忽悠他。就这样，从嘉靖刚当上皇帝到嘉靖三年（1524）经过几场议大礼的“学术辩论”之后，终于演变成了以杨廷和之子杨慎为首的一场政治流血事件“伏门之狱”。嘉靖皇帝开始了“文攻武卫”的血腥战略。

在这场政治论战的背后，是皇权与阁权的激烈较量。历史可以借鉴的故事很多，一旦撇开以人为本的思想欲转化成权术效应的武器，必将造成一场政治灾难。世宗嘉靖一手拿着张璁大礼议的理论依据，一手拿着至高皇权，开始与文官势力进行着一场步步为营守株待兔式的抗争。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因抗争议大礼数年里上疏过30多篇疏奏仍未见嘉靖改变想法，便沉不住气屡屡以辞官相质难，最后被允许辞官。接着张璁等被召回京城，群臣侧目，私底下说：“倘上（皇帝）亦云是即扑杀之。”《明鉴纲目》记载“二人比至京，众汹汹欲效先朝马顺故事（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后事）毙之于廷。”接着，嘉靖为了保护张璁，把他和同行的桂萼立即提拔为韩林学士，导致廷臣意见群起。

同年七月十五日，杨廷和之子杨慎撸起袖子在下朝时煽动官员：“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接着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把群

臣拦截于金水桥南并威胁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明通鉴》记载超过 231 人，在京城左顺门举行声势浩大的伏跪企图逼宫，嘉靖命令司礼中官传谕叫廷臣们退下，他们却联合起来说：“必得俞旨乃敢退。”于是秦金、赵鉴、赵璜、贾谱泳、丰熙、张壁等（共二百三十一人，名不俱举）俱赴左顺门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闹事的金献民说：“辅臣尤宜力争。”朱希周托人叫上毛纪，接着两位内阁重臣毛纪和石瑄也相约特意赶到左顺门参与。嘉靖一再派遣司礼监谕退，群臣犹跪伏不起。一再劝退不散直至激怒了嘉靖，派遣锦衣卫先逮捕为首者，命司礼监记录下闹事者姓名，关押为首的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等八人入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和王元正见状仍不罢休，带头扶着门大哭，且煽动一帮群臣几百人跟着哭一起，哭声震动阙廷。事件进一步升级，嘉靖更加愤怒，命令关押四品以下议礼诸臣等 143 人和何孟春、洪伊等 85 人下锦衣卫狱。“命拷讯丰熙等八人充戎。其余四品以上姑于午门前宣谕停俸，五品以下杖之（凡杖一百八十余人）当场廷杖打死 17 人。”可见这场“伏门之狱”是由文官联合起来胁迫皇权引发的惨案，明代文官们门户之见猖獗的弊端在这场事件中被激发到极端。

这场斗争并非学术思想斗争，而是杨廷和一派欲利用在朝廷中的影响力，用“继统必继嗣”的理论强加于皇位尚未坐牢的少年嘉靖，并且以“程颐”“朱熹”的理学为汉定陶王和懿安濮王的故事加以粉饰欲盖弥彰，而张璁认为：“《礼》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一》）这正是嘉靖的想法。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嘉靖与杨廷和的斗争是王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对抗缺乏事实依据，况且张璁在参与议大礼的时候，王阳明正被朝廷打压贬官禁言之中，“……臣之不敢爵，非以辞荣也。求避祸耳。”（《明通鉴》第五十卷）当时王阳明正值被廷臣围攻打压、为求避祸连战功都不要的时候，所以张

璠不可能请教他，而王阳明更不敢给议大礼提任何观点。反而是王阳明的第一代“心学”传承人霍韬、席书、方献夫，在张璠议大礼过程中投机参与，从而得到了嘉靖的重用。

张璠能够一再冒着生命危险死抱着“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不畏强权，以人为本，重人伦，从心出发，从人情出发，在当时封建社会的特定环境里，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通过这场“大礼议”的激烈斗争，张璠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赏识，从此步入仕途，直至任内阁首辅。

张璠少年时，以卧龙自期，入仕后以身许国，务求匡时清世，拯救黎民百姓水火之苦。“大礼议”的斗争，使张璠深受嘉靖母子的信任并得到重用，他入阁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方面的弊端与嘉靖的想法均不谋而合。

张璠历史上的主要事迹在于三点：

一、崇文爱乡

张璠一生十分重视对家乡温州的文化教育建设，培养文化人才。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经过第7次礼部会试落败之后，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建立在为家乡培养人才的事业上。他在大罗山的东麓瑶溪创办了罗峰书院，常常带着一些青年学士，到大罗山的瑶溪、茶山、仙岩等地进行游学。《建书院告山灵》一文时，描述了他创办罗峰书院的心迹：“孚敬顽钝无成，苦无肄业之地，托址溪山，建兹书院，将率学徒讲学其间。窃念武夷、白鹿之胜，固地灵而人杰也，今兹地灵矣，其人杰固有所待者。”

据记载，罗峰书院有学生数十人，都是青年学子，有族侄，也有远近慕名而来的学生。讲学内容，大抵属儒家经典、名家诗文和时务政书之类，而以礼学为主。《礼》是历代典制和人伦规范的经典著作。在张璠看来是为政的根本，为人的基础。由于张璠的悉心培育，明代的温州出现了一批文化人才，将温州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张璠之后，温州又出现

了众多佼佼者，有嘉靖年间任广东参政的项乔（1493 — 1552）、天启年间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张天麟（1586 — 1639）等。

张璫晚年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教育与文化建设，嘉靖七年（1528），特意请求为“罗峰书院”赐名，遂得嘉靖皇帝御赐“贞义书院”。他在嘉靖十年七月第一次罢官归乡时，还自费将旧时的罗峰书院扩充建设，后于书院内外更建御书楼、来青园、富春园、栏杆桥、万竹亭、留胜亭、观荷亭。当时嘉靖知道书院改建欲命朝廷拨款，张璫谢绝并说：“皇帝命令敕建书院的钱款均是出自温州地方，而这样会增加家乡百姓的负担，为臣的俸禄每年能拿到这么多，扩建书院用足够了。”

《辞免修建书院》：“伏惟皇上节用爱民，示敦朴为天下先，今以臣书院之故，费及有司，虽曰风厉斯文，恐未免为皇上俭德之累也。况臣忝窃重禄有余，足备修建，迟以岁月，自可完成者也。伏乞圣明停止前命，无费有司，如此，则皇上重臣之书院也，以仁义为丽，臣之重于书院也，以锡名为荣矣。”

《再辞》：“臣前者伏蒙钦赐书院额名，并敕建敬一亭座，恩殊今古，礼绝臣工。臣窃念皇上锡名之荣实出望外，有司劳民之念每切胸中。已尝具奏辞免修建，伏承圣谕：“这事已有旨了，况亭座系置朕之箴石，其他不过量加修葺，卿可勉承朕意，勿得再辞！”“近者灾异频仍，四方告劳，凡不急工役，相应一切停止，务在与民休息。臣忝辅导之官，尤当加省。书院亭座修建尤当停止者也。夫皇上示敦朴必自近始，近必自臣始，伏乞特赐俞允，非臣一方之幸，多方之幸也！”

张璪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大量诗文。作为布衣出身的宰相，在温州民间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在瑶溪创办书院，去过大罗山、三垟湿地、仙岩、江心屿等地，对这里的人民与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并留下许多赞美诗篇。

关于温州市的大罗山，在张璪笔下有罗峰书院（贞义书院）的风景：“卧龙潭下书院成，白鹿洞主惭齐名。松菊已变荒芜径，野壑更添吾伊声。”张璪也曾描写温州瑶溪的山居生活：“自汲龙潭水，长烹雁荡茶。客来无一物，篱豆始开花。”“自分布衣久，为园种木棉。山妻听蟋蟀，扞袖夜无眠。”（《山居二首》）

关于温州市瓯海区的茶山及三垟湿地：“我有山东一亩宅，还忆山西五美园。落日放舟循橘浦，轻霞入路是桃源。”（《游五美园》）

关于温州市瓯海区仙岩的奇美美景：“落日在招提，山深藏古洞。水落正石出，穿岩入其空。绝壁合欲倾，观天如望星。飞流泻中潭，山根似浮动。”（《仙岩洞》）

关于温州市鹿城区的江心寺：“愁见中川皆赤土，却留双塔自摩空。眼前数尽千年景，江上全消半夜风。幻化物情今日极，浮沉天地有时穷。咸阳宫殿都休问，金谷铜驼也棘中。”（《孤屿志》卷三《吊江心寺火》）

“烟波渺天际，孤屿天悠悠。浩荡疑非世，登临况属秋。霞标双塔迥，浪挟众山浮。露白蒹葭老，凌风生我愁。”（《江心寺》）

在他的诗里，使我们体会到诗人寄情山水草木，激情抒怀的美感：“寒枝自许风霜傲，细蕊惟堪晚节香。”（《观菊》）“碧桃红杏不须猜，雨露无私次第栽。玉蕊芙蓉带甘菊，也应无日不开。”（《种花》）“两山夹深谷，溪流到处闻。登高息川上，尊酒此乐群。”（《川上吟》）

在张璪的诗词里透露出诗人强烈的政治抱负与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在他 50 岁时有诗云：“一饭还三叹，黎民正阻饥。”（《元日》）“有雪未为瑞，凶年正可悲。流民几行乞，粒米不成炊。”（《对雪》）“年饥难独乐，官冗得偷闲。”（《游蒋山》）

他自小就是一个不畏强权好打抱不平的人！他在温州民间流传有这么一个故事：一次，刘提学要游雁荡。四品官员要游雁荡，当地必须要进行高规格高档次的接待，雁荡山百姓为凭空增加负担而发愁。这时尚是诸生（秀才）的张璠主动表示有办法阻止当官的进山，大家都嗤笑这个年轻人，但事实证明了张璠并非大言欺人。张璠让和尚拿着他写的诗在半路上拦住刘提学，刘提学读了张璠的诗，打消了游雁荡的念头，诗云：“海内衣冠集雁山，草茅无路得追攀。山中定扫豺狼道，天下谁当虎豹关？玉辇奚从瞻乐地，金樽未许破愁颜。江湖廊庙心相似，莫道渔樵尽日闲。”（《上刘提学游雁山》）。

当他在“大礼议”受阻时，发出长叹：“臣始为一介书生，辄犯朝怒，生死在于呼吸，身家危于旦夕，幸而免者。惟一点孤忠照临日月之下而已！”（《张文忠公集》奏疏卷4《再辞陈情》）“独怜知己少，只见直躬难。若问唐虞治，终期白首看。”（《赴南京留别诸友》）

在创办书院时寄托情怀：“苍生有望山中相，白首愿观天下平。青衿登进乐相与，日听沧浪歌水清。”

他在“大礼议”斗争获得全面胜利的“伏门之狱”第二天，欲辞官，《诗稿》卷三乙酉有《七月十六日谢恩》诗云：“旭日钟声过雨迟，趋朝真负圣明知。得观礼乐曾三召，惭遂衣冠已十辞。麋鹿山中频有梦，凤凰池上本无期。休疑野老还争席，四海嗷嗷独泪垂。”亦著有《礼成辞职》表明心迹：

“逢圣明在上，议著当代典礼。臣与桂等，其始生不同方，官不同署，窃见一时朝议，有乖万世纲常，是以见同论同，遂不嫌于犯众，理直气直，乃不觉于成仇。幸获圣明，难胜众口。伏蒙特旨，升臣以学士之官，责臣以备讲之任，彼时不辩无以明微臣之志，终辞无以答圣明之心。今明诏重颁，大礼攸定，实皆出自圣明裁断，非臣愚昧所能与也。”

昔孟軻氏千里見王，人以為干澤；三宿出昼，人以為濡滯。今固無孟軻自任之君子，亦終無尹士自責之小人。此臣等所以義在當去而不苟容者也。況學士之官，居切近之地，臣學不足以備經筵講讀，才不足以效史館編纂。原非竊祿之官，深懷素餐之耻。伏乞將臣放歸田里，免班行。又竊念今日驩兜雖雜進堯朝，魍魎終難逃禹鼎，仍乞皇上自此親君子，遠小人，以迓天庥，以臻至治，俾臣白首遂箕山之愿，彰唐虞之盛矣！”

嘉靖七年《明倫大典》修成之前，嘉靖加迂其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復賜三代誥命，荫一子為中書舍人。張璫欲辭去封爵，其《辭免恩典》云：“臣伏承皇上以《明倫大典》成，手敕吏部加迂臣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復錫臣三代誥命，荫一子為中書舍人者。至恩逾常，殊錫非分，寵光先世，庇及後人，顧臣何能輒敢當此！惶懼惶懼。臣竊謂為人君者不以崇高富貴為重，然後人君之道尊；為人臣者不以貪位慕祿為榮，然後人臣之道盡。仰惟皇上虛己宏大，疇咨眾言，真未嘗以崇高富貴為重也。臣忝輔導，位重弗充，日集懷忧畏，又豈敢以貪位慕祿為榮哉！夫天道亏盈，鬼神福謙，臣備官甫及七載，超擢已至三孤，且纂修乃供常職，敢稱勤勞？若復濫叨恩典，莫知忧畏，誠恐為天道所亏，不為鬼神所福也。況臣之家世本為農人，《管子》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昵。”任子之恩，尤不敢當。伏乞聖明俯察愚衷，收回成命，是皇上于臣也示之以道，臣于臣之子也遺之以安矣。”

張璫畢生好學，撰著頗多，存世的著作有《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杜律訓解》六卷等。

嘉靖十六年，他還獨力編纂《溫州府志》。從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張璫對文化的貢獻，也反映那個時期的一位政治家的才情、心志、學問和功業。

二、勇于改革

他是历史上三大著名改革家之一张居正的前辈，在张璁为嘉靖皇帝首席辅任内，他重点对赋役制度、科举制度等作了大胆改革，尤其是在局部地区率先实施了“一条鞭”制度，正是张居正继承了张璁的做法推行和完善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在张璁兴革基础上，范围予以了拓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军事等各方面，是比较系统的全面改革。张璁兴革对后世的高拱、张居正改革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开启了明中后期兴革政治的浪潮。

史称在明朝甚至在明代以前的元宋唐以来，只有嘉靖期间没有出现过太监弄权把持朝政的局面，这要归功于张璁。张璁维护了当时中国的国体门面，清理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范守己认为，张璁此举乃“千百年颂功为不穷（《宪章外史续编》卷2）”。何良俊认为，张璁勇于担当革除镇守中官的重任，是其他得君最专者所不能比拟的，言：张璁“取回各省镇守太监，他人虽得君最专者，亦不肯如此担当。”（《四友斋丛说》卷8）

蒋光彦在万历末年也说：张璁“归而后公相者，经济万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无貂珣之扰，默受公赐而晏如，不知今寓内始人人扼腕而思公矣（《光绪永嘉县志》卷26）”。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浮华而无实用。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会，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张璁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当今社会主流推崇的理念。经他改革的科举制度，终明世不变，到了清代仍继续奉行，一直沿用了400来年，对革除科举弊端、公正取士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朝开国勋臣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包括刘基的爵位及实权也是在张璁影响下，在嘉靖时期得以恢复的，如果没有张璁，这些人的故事及其后裔或早已掩埋在历史长河之中。《请复开国勋爵》：

“臣伏蒙圣谕：‘卿奏刘基子孙已议明袭爵，其常遇春等四家亦当查袭。’臣恭惟皇上体圣祖之心，而复报功之典，天下万世之公议也。臣伏睹《圣祖实录》，谨采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四臣传略以献，伏祈特赦该部复其世爵。皇上法祖盛心，光昭史册矣。臣无任惓惓愿望之至！又谕：李善长者，未知缘何无彼家？臣谨并录善长获罪圣祖之故。夫臣子忘君负恩，祸孽之来，皆其自作，此又天下万世之大戒也。

臣又伏思，四郊典礼，万世仪刑，规制定于圣裁，力役皆为臣职。兹承重典，实切愧心。伏乞圣明察臣愚诚，特允辞免。容臣以官职仍旧，策臣以龟勉图新。臣不胜惶惧恳切之至。”

三、反腐倡廉

官吏的贪赃枉法，是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之一，亦是君主专制社会的大患。张璁上疏奏皇帝，依律治罪贪官污吏。并且在嘉靖六年，张璁在掌管督察院时，向明世宗奏上《宪纲》（共95条），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张璁的改革与反腐损害了皇亲国戚、太监、官吏、权贵阶级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仇恨，弹章不绝。但由于他一切秉公，亦奈何他不得。张璁几次致仕离京，犹如一介寒儒。他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仗势欺人干不法事。他居朝十载，

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

张璁是一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人。他勇于改革，敢为人先。他在阁10年，任首辅6年，对“明朝中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政治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者不免招来许多阻力和非议，加上议大礼之后门户之见不绝，对张璁的诽谤一天都没有停过。廷臣对张璁的弹劾，久而久之便影响着嘉靖皇帝的判断，致使张璁宦海浮沉，在入阁辅政的七年间四起四落。嘉靖母亲蒋太后不忘旧恩，一再表达对张璁的器重，嘉靖更离不开张璁。这是张璁被嘉靖罢官复召之后官复原职，张璁惶恐欲推辞的疏奏《辞免恩命》：

“伏蒙圣恩敕吏部：‘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张孚敬，比者奉命知建造四部并各处工程等项，未加酬典，今因行取来京，著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少傅、尚书如故，照旧内阁办事，如奉行，钦此！’臣拜命无任愧惧之至。

臣伏思自古人臣，受君恩遇之至者莫有逾于臣，而积愆负罪莫能报君恩遇之至者亦莫有逾于臣。仰惟皇上敬承大统，昭事上帝，于兹一纪。而臣叨进为辅导之臣者亦既五年。然而治化未尽熙洽，人心未尽协和，贤才未尽举用，奸宄未尽消除。饥荒叠见，灾异频仍。臣窃思皇上以尧、舜之德，宜隆唐、虞之治，张而复有如此未尽至者，皆臣子未能尽职将明德意之罪。而臣位重弗充，罪尤大焉。又，臣去岁以愚昧之资，自罹罪咎。荷蒙皇上以天地之容宥臣之罪，以日月之明察臣之心，不加诛窜，特赐保全。臣省罪山中，感恩天上。未几，即承召命促臣复任。仰惟圣慈切至，天语丁宁，臣昼夜奔命，不敢自后。实欲惩创于既往，图报于将来也。所虑智小谋大，弗胜任使，方欲为辞

让之请，而复承加进之恩，臣窃惧位愈重而责愈难，思愈深而臣罪愈大也。”

张璁每次被罢官刚回温州老家，就被召回去官复原职，这“一罢一招”时间点非常有意思；总是刚历时3个月回温州，结果人刚到，嘉靖的召回命令就追到了，最长时间是6个月。其遭际在明代阁臣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难能可贵的是，每次收到嘉靖急命召回的通知时，张璁均二话不说便拖着年老体弱的身子星夜兼程。最后，因重病痊愈第四次返京途中遇到危险，又染上恶疾差点丢了性命，至此便再也没去京城，在温州老家直到去逝。他的逝世让嘉靖悲痛欲绝，钦命为其厚葬。如今伫立在温州市鹿城区妙果寺右侧的张璁碑亭，便是嘉靖特意为其赐建的。

作为明朝嘉靖时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关于张璁的历史评价诸多。在历史典籍中留下十分肯定的正面评价，如《明世宗实录》《国朝典故》《歧海琐谈》《昭代典则》《国史传》《编年信史》《明经世文编》《明史·张璁传》和《中国通史》等。最后，用近代编著的《中国通史》总结是：“始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明代一少有的阁臣。”

慷慨任事、清廉持重的首辅张璁

鲁 剑 谢炳礼

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温州府华盖乡三都普门（今龙湾区永中街道普门村）人。明嘉靖重臣，“大礼议”事件中代表人物。嘉靖十年（1531）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官至内阁首辅，世称“张阁老”。是我国历史上继王安石之后、张居正之前的又一重要改革家。

张璁24岁中举人，复七试不第。正德十六年（1521）中二甲进士。嘉靖四年（1525）经历“大礼议”之争，步入仕途，由翰林学士兼经筵讲官升詹事府詹事，兵部侍郎。嘉靖六年（1527）入阁，嘉靖八年（1529）任内阁首辅。嘉靖十四年（1535）春因病，屡疏致仕，护送回乡。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五岁，赠太师，谥文忠。张璁府第位于郡城松台山，今有三牌坊、大士门、张府基、妆楼下之名。妙果寺侧尚存有嘉靖帝御书“孚敬”“茂恭”及张璁像，俗称张璁碑亭。张璁祖祠位于龙湾区永中街道普门村。

张璁反旧制、重人伦，从人性人情出发，通过一场“大礼议”激烈斗争，受到嘉靖皇帝赏识和信任，形成了坚固的君臣信任关系，



张璁画像

为变革集聚了能量，也为他入主内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一系列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任期间，他主张清勋戚庄田。明代时期皇宫、王府及勋戚占有大量的土地谓之庄田，部分权贵豪奴和地方恶棍，妄指民田为官田，以之进奉王府、勋戚，结交权贵而谋私利。因民田被夺，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成为流民。为改革弊政，清勋戚庄田，杨廷和曾提出过一些改革措施。张璁并不因为杨廷和是政敌而弃之，由于他的鼎力改革，初行一条鞭法，消除了明代百年积弊的勋戚庄田，制止了土地兼并的急剧上升，缓和了社会矛盾，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

他大力整顿官场风气。他上疏请严内阁禁约，规定各衙门事务议于公朝，不得谋于私室，严分厂、卫与司法机关的职权，限制了厂、卫的权力，使司法机构得以行使其职责。还主张派京官主考赴各省乡试，体现朝廷的绝对权威；倡行“三途并用”法，用荐举、贡举、科举遴选人才；用考汰生员、考核提学官的方式整肃学政。实行京官外任、科道互纠、更新宪纲，官场风气大为好转。

他还力谏罢镇守内臣。明代时宦官专权乱政是一大祸患。为了政局的稳定与社会和谐，张璁入主内阁后便一再向嘉靖皇帝陈述镇守的流毒，力谏一律撤除镇守太监。史称在明朝，只有嘉靖期间没有出现过太监弄权把持朝政的坏局。

张璁居朝十载，不进一内臣，不容一私谒，不滥荫一子侄。他有两个亲外甥，出自永嘉场英桥王氏，时人有“双凤”之喻。一者王澈，字子明，号东厓，历任至兵部郎中、左参议；一者王激，字子扬，号鹤山，历至国子监祭酒兼经筵讲官。

张璁年少失母，常年借住在二都王家姐夫处。因同两个外甥年岁相当，一起读书、玩乐，彼此亲密无间。后张璁官晋内阁大学士、首辅之职；王澈、王激也凭借自己的才学，先后出仕进京履职。但身为朝廷重臣的张璁并没有因亲带携两外甥，反而处处回避、时时警惕，生怕授人以柄、落下口实，

并多次向嘉靖申明，“微臣孚敬精忠报国，体察君威，敬畏朝纲，岂不尽心辅佐，报答圣恩？”“乃为臣之道者也！”其忠敬如此，世所罕见。

年轻时候的张璁居家永嘉场三都普门，与家住永嘉内西溪驿阳二十六都（今鹿城区山福镇驿头）的程智先生为同门良友。两人曾一起攻书，学业之余不时蹈瓯江、驾扁舟，相互拜访，观览山水之胜境，切磋理学之妙奥，痛饮联吟，高谈阔论。嘉靖十年（1531），张璁乞病告假在乡。长公子逊志中书年方二十一。程家之次女知书达礼，品貌端庄。两人正年岁相仿，性情相投。两位长辈就有意为之辍合，以成秦晋之好。

当时，张璁身为内阁大学士，很受世宗皇帝恩宠；程家也为西溪一带富家望族，乃北宋理学宗师“二程”之后裔，诗礼传家、热心公益，美誉传遍瓯江南北。

如何操办婚礼是双方家属的心头大事，也是瓯江两岸百姓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当时，程家意欲大红地毯、锦罗绸缎铺挂整个迎亲路道，敲锣打鼓风光热闹一番。但张璁认为，嘉靖皇帝当朝不满十年，国家正值大兴改肃整饬之风，自己又身居中枢，理应持身清廉、倡导文明新风，简易操持婚礼，又得不失隆重和得体，符合历来习俗。于是，他在瑶溪贞义书院一侧草构一室，作为儿子、儿媳完婚的婚房；并同程氏亲家商定由程家为朝廷捐粟一千八百斛、白银500两，以赈灾情、以疏时困，并呈奏朝廷知晓，召谕引领时风。

到了农历八月，清风送爽，金桂飘香，黄道吉日，成婚在即。两岸民众夹道欢庆，亲身领受一代贤相的盛德。温州知府、永嘉县令等一千人马也齐来祝贺，只道喜、不送礼。人人称颂这一简易而隆重的婚礼实乃千古奇闻、世代流芳。儿歌有唱：“阁老阁老，办事有道；程家有女，嫁得良婿！”

张璁有一门生蒋瑛，曾任顺天府知府。此人生性贪婪，身为朝廷命官，不思为民造福，反而鱼肉百姓，经常巧设借口榨取民财，百姓对其恨之入骨。周围同僚碍于张璁面子，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使他更加有恃无恐。

一次，蒋瑛的辖区京都三里河发生一起命案，一货郎中毒身亡。受害

人母亲状告儿媳沈氏通奸谋夫，并指证奸夫是邻居王阿狗。蒋瑛同伴作去现场验尸，确认为中毒身亡，明显由他人谋杀，根据沈氏言行举止，有重大作案嫌疑。本来这案情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拘捕嫌犯王阿狗到堂对质，真相自然大白。但蒋瑛为了敲诈原、被告的钱财，迟迟不予审理结案，致使嫌犯闻风远避。时值酷夏，死者尸体腐烂发臭，逼得原告无奈，暗下送了50两银子给蒋瑛，要求赶快惩凶结案，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那沈氏做贼心虚，深怕知府蒋瑛收了婆婆银子，定会认真追查，自己恶行必将败露。于是她也暗中托人送了500两银子，要求蒋知府尽快摆平这事，好让她蒙混过关。这样蒋瑛得了原告被告双方好处后，才升堂审案，说因王阿狗在逃未能到堂对质，故沈氏通奸谋夫证据不足，暂且放沈氏回家待唤，下令死者尸体即时入葬，一切等抓到奸夫王阿狗后再行判决。企图将这桩谋夫大命案搁置下来，使其不了了之。

此案被朝中一位微服出访的陈姓御史察觉。他暗中调查了案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到顺天府衙要求蒋瑛复查重审此案，严惩凶手。哪知蒋瑛不但不予以理睬，还搬出张璁的牌头相威胁。陈御史见他不识好歹，就把此事直接禀呈张璁，随同附上的还有许多百姓检举蒋瑛贪赃枉法的状纸。张璁越看越气，即命人叫来蒋瑛，厉声痛斥，不容蒋瑛苦苦求情，即与其断绝师生关系，将他撵出师门，等候处置。次日早朝，张璁即把蒋瑛贪赃枉法的罪行如实参奏，要求严惩，并请求嘉靖皇帝治自己失察之罪。嘉靖闻奏，即降旨将蒋瑛削职为民，并抄没了蒋瑛全部家产充公，狠狠惩治了这官场败类。张璁这种大义灭亲、不徇私情的做法，更赢得了嘉靖皇帝的信任和同僚们的敬佩。

张璁奉公廉洁，严于律己，持身特廉。而且，主张“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他在位时，一再告诫家乡族人不要因他在朝做高官，便倚势凌人干不法事。《明史》说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持身特廉，痛恶脏吏。”明人姜准在《岐海琐谈》评价他，“刚明峻洁，一心为公，慷慨纪事，不避嫌怨。”今人蔡美彪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称赞张璁“始

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明代一少有的阁臣”。

张璪一生十分重视家乡的文化教育建设。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七应礼部试、铨羽而归之后，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建立在为家乡培养人才的事业上。他在大罗山的东麓瑶溪创办了罗峰书院（后世宗皇帝赐名为贞义书院）聚徒讲学。据记载，罗峰书院有学生数十人，都是青年学子，有族侄，也有远近慕名而来的学生。讲学内容，多属儒家经典、名家诗文和时务政书之类，而以礼学为主。由于张璪的悉心培育，明代的永嘉场出现了一批文化人才，将永嘉场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张璪之后，永嘉场又涌现了众多佼佼者，有嘉靖年间任广东参政的项乔、天启年间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天麟等。

张璪一生著述丰厚，著有《礼记章句》八卷、《周礼注疏》十二卷、《仪礼注疏》五卷、《杜律训解》六卷，以及《大礼集议》《大礼要略》《明伦大典》《罗山奏疏》《罗山文集》《正先师孔子祀典集议》《金滕辨疑》《敕谕录》《谕对录》《钦明大狱录》《嘉靖温州府志》等。

八百米古街“五马—蝉街”见证千年历史

鲁之哲 陈建勇

鲜为人知的是，五马街加蝉街短短不到 800 米的老街，竟然包含着如此厚重的千年文化底蕴——

五马街是一座有故事的千年古街。千年之前，书圣王羲之任温州郡守时，乘坐五马齐驱的马车往返于这条街。北宋绍圣年间（1094—1098），温州知州杨蟠《咏五马坊》诗云：“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而在五马街边，千年古谯楼与这座五马奔腾的雕塑遥遥相望，更鼓声声，护卫着这座温州古城。

千年蝉街则是因唐代高僧永嘉大师而得名，后人以“禅街”来命名这条当年闻名前来拜谒大师的僧人集聚的街巷。后因谐音，逐渐被人们叫成蝉街。今温八中前的《重修试院古碑记》与南宋时期的浮沚书院、“稚新塾”旧址，见证着这座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千年古城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历史。

千年净光塔与永嘉大师

当代经学大师、温州乡贤南怀瑾曾说：“温州的文化在唐以前，没有出什么很大的人物，只有一位，那就是佛家的永嘉玄觉禅师。”



松台山下永嘉大师塑像

五马街区蝉街尽头处的松台山巅，屹立着一座始建于唐代、有着千年历史的七级宝塔——净光塔；净光塔东侧松台山麓，永嘉大师——玄觉塑像振锡而立，昂视前方。

从蝉街抬眼望去，净光塔恰在蝉街西首的现代建筑国光大厦正中间，庄严而有灵性。它是为了纪念唐代高僧玄觉大师，也就是后人尊称的永嘉大师而建的。松台山也因此有了“宿觉名山”的美称。

相传净光塔建于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永嘉刺史杜贲在松台山巅建“宿觉禅师真身舍利塔”，公元873年，唐僖宗赐名“净光”，迄今已逾千年。

永嘉大师出生的年代，正是产生过玄奘大师、鉴真大师等高僧的盛唐时期。据《高僧传》记载，永嘉大师（665—714）俗家姓戴，字明道，出生于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温州市鹿城区。永嘉大师生平留下两部著作——《永嘉禅宗集》和《永嘉证道歌》，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是中国大乘禅法的重要典籍。尤其是《永嘉证道歌》，影响极其深远，是修学大乘禅法必学的宝典之一。

永嘉大师最后圆寂在鹿城。中国人历来讲究避讳为敬，所以都不直接称呼永嘉大师玄觉的名号，而尊称他为永嘉大师。永嘉大师融合了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的学说，创立天台禅宗融合之说，是中国历史上成就非常高的一位高僧，在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永嘉大师开悟以后，到福建曹溪谒见六祖慧能大师，遂得到六祖印证和传法，六祖特留永嘉大师在曹溪过了一宿，所以永嘉大师又被尊称为“一宿觉”“宿觉”。

大师归来后，名重东南，道扬方外，温州一时成为浙江的禅学中心，各地学僧聚集座下，三吴（江苏、浙江）学者齐集问道，各方高人乃至日本、朝鲜等地的高僧也来参学，温州松台山脚一带因此出现很多外地来拜谒永嘉大师的僧人，这条街也因此得名“禅街”。后因谐音，逐渐被人们叫做蝉街。这也是今天称蝉街的说法之一。

千年古谯楼与宋高宗

早年，五马街一度指的是五马横街与五马直街。五马直街就是如今的公安路，千年古谯楼就屹立在这条路上，处于温州古城格局最为中心的位置。古谯楼至今保存完好，千年来，默默护卫着温州古城。



位于今公安路与鼓楼街交叉口的谯楼（老照片）

五代十国时期，公元 907 年四月，吴越王钱缪令其子钱元瓘攻占温州，任温州刺史。温州从此并入吴越王版图，成为南部重镇。吴越钱氏为加强防卫，保境安民，一面加固修缮晋代温州修筑的外城（又称郡城），一面增筑内城（又称子城）。

子城为当时州府的所在地，在郡城的正中部分，规制方整，略呈正方形，周长三里十五步，面积约 1.85 平方公里。子城四处城门上各筑一座城楼，东为华盖楼，南为谯楼，西为西楼，北为临圃楼。

千年古谯楼在南宋时期，还曾有过被当做朝门的经历。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蹕温州，从江心屿向温州城内移蹕，就是通过这座南边的谯楼，到达州治驻蹕的。宋高宗驻蹕州治内后，改州治衙门为行宫，州治住宅为宫禁，谯楼为朝门。高宗驻蹕温州 55 天后离去，其间百官朝参，悉按六天一朝的旧仪进行，温州地方官员亦随班起居。

南宋乐清状元、著名政治家、学者王十朋，19 岁那年在五马街口亲睹高宗来温盛况，写诗赞叹：“北斗城池增王气，东瓯山水发清辉”。诗中的“清辉”二字，就是指宋高宗在江心屿留下的“清辉”“浴光”院额之一，如今，“清辉”依然保存在江心屿。

元灭宋后，因担心汉人据险对抗叛乱，下令拆除全国所有的城池，温州内外城也无法幸免。元至正十三年（1353），子城的四面城墙和东、西、北三处城楼被拆毁，仅存南门谯楼。

明清时期，谯楼经历了多次修缮。除了军事需要之外，谯楼还有击鼓报时的功能，因此俗称鼓楼，它所在的街巷也被命名为鼓楼街。早年，温州的谯楼上设有报时的铜壶刻漏，下设鼓更点。平时每逢晨夕，按时击鼓报时，内外赖以作息。在战时，谯楼用来瞭望敌阵，并负有保护城池、抵御外侮的使命。“谯楼鼓角晓连营”，形象反映了谯楼在历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

1981 年，这座千年古谯楼被列为温州市文保单位。上世纪 90 年代，谯楼再次修缮，修复后的谯楼高逾 10 米，城门为砖石结构，保持初建原貌。

城上四周平台宽敞，外围花岗岩雕花护栏。正中两层楼房仿清复原，飞檐雕梁，青瓦红柱。温州自古商贾云集，素有“东瓯名镇”之称，四字匾额高悬楼南。整个建筑古朴壮丽，雄姿不减当年。

千年五马街与王羲之

五马街最为标志性的一处景观，莫过于立在五马街中段的“五马奔腾”铜雕，围绕它身上讲述的故事，见证着五马街的千年历史。



“五马奔腾”铜雕

公元 323 年温州设郡，称永嘉郡。东晋著名学者、堪輿学鼻祖郭璞客寓温州，“为卜郡城”。公元 347 年，书圣王羲之来到温州当太守。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其初为秘书郎，历任宁远将军、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

在温州任上，王羲之每次出行，常乘坐五马齐驱的马车，往返于这条街，因而被称为“五马街”。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

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

唐代温州刺史张又新有《百里坊》“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一诗，可见书法家太守在温州颇有政声。除“五马巡街”，王右军“登舟游塘河赏荷花”“墨池挥毫洗砚”等都是温州百姓津津乐道的典故，并留下“五马”“墨池”等名沿袭至今。

北宋杨蟠任温州知州时，把温州城内划分为三十六坊，其中就有“五马坊”，可见“五马坊”为太守王羲之而命名在北宋已见之于文字记载。杨蟠《咏五马坊》诗云：“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蹰。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

在另一种说法中，五马街被安在了公元422年当过永嘉太守的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身上，“谢灵运为永嘉太守，以五马自承，立五马坊”。事实上，除了王羲之、谢灵运之外，温州古代有过众多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化郡守，可谓是“名士云集”，如东晋名士玄言诗人孙绰、与谢灵运号称“颜谢”的颜延之、注释《三国志》的历史学家裴松之、写下“草长莺飞”名句的南朝文学家丘迟、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韩彦直、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父亲文林等，都任过永嘉太守或温州知府（知州），想必他们也曾出入过这条自古繁华的五马街吧。



五马街西入口“温州古城图”地雕

至明代，将坊改为街巷，五马坊才改称五马街。当时的五马街分称五马直街和五马横街。五马直街即指鼓楼前南北纵向的一段街道；五马横街东起大街（今解放街），西接蝉街，全长424米。旧时这里商贾云集，绸布庄、百货店、铜锡器皿行、中西药店、钱庄等鳞次栉比。

2002年国庆节，五马街矗立起一座五匹骏马拉着车帷的“五马奔腾”铜雕，就是来源于这一传说，如今已成为五马街的地标。

千年浮沚书院、稚新塾与永嘉学派

在蝉街改造中，国光大厦前的雁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千年之前，在小雁池畔创建浮沚书院的永嘉学派先驱者周行己和他的学生们，一定也曾经欣赏过“星月雁池”的美景。



“星月雁池”效果图，该建筑现位于国光大厦前

周行己创设的“浮沚书院”与永嘉学派开山鼻祖薛季宣创设的“稚新塾”，见证了禅街温八中一带曾是宋代永嘉学派的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地点。

周行己（1067—1125），世称浮沚先生，“元丰九先生”之一。他17岁入太学，以文行著，北宋元祐六年辛未（1091）等进士第，官至太学

博士，著有《礼记讲义》《浮沚文集》等。北宋大观三年（1109），周行己因曾师事程颐而遭弹劾，罢职回温，在松台山麓小雁池畔，创建浮沚书院收徒授业，传习洛、关之学，此后，“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在温州历史上影响深远。

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永嘉事功学派开山鼻祖薛季宣，于温州郡城南雅俗坊（今蝉街温八中址）立私学稚新塾。永嘉学派创始人物陈傅良年少时也曾在此问学授业，曾自述“傅良丙戌、丁亥岁，受徒城南，公间来过，教督之”。后来，陈傅良和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等人，也曾先后在此讲学传道，弘扬求实精神，提倡事功之学。

永嘉事功学派，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是我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永嘉学派针对当时盛行的重义轻利、重本轻末的思想，重视实用，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农商一体、富国强兵，提出“道在物中”等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观点，主张发展商业，务实创新。

两宋时期，温州文风鼎盛，文运繁昌，“科甲簪缨，殊贯蝉联”，书院盛极一时，多数为当地知府、县令、名儒、士绅倡导或捐资创办。仅今温州城区就有宋代王开祖创办的“东山书院”、浙西提刑王致远创办的“永嘉书院”，明代的鹿城书院、芙蓉书院、鸡鸣书院、龙渠书院等。明弘治年间（1488—1505），礼部左侍郎王瓚在《温州府志》中写道“自谢康乐招学士讲经而郡之有学旧矣，堂斋庖舍莫盛于宋，而学业随之……吾瓯自宋以来，有书院，有义塾，学业炽盛，正藉于此。”



蝉街老照片

明嘉靖《温州府志》载：（温州）隋唐

阐海隅之化，而江浙尽为衣冠大中，天祐间郡人已有登科跻显仕者，如鲁公之后亦慕风土之美，举家徙居之。”大意就是书院的增多，促使了拜学、游学、讲学活动的繁盛，形成了良好的城市文化氛围，使温州成为当时文化人士向往的居留之地。

两宋以来，温州科举兴盛，这和当时温州兴办书院蔚然成风，士子勤奋好学不无关系。

“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如今高挂在蝉街温八中门口、由一代大儒孙诒让之父孙衣言撰写的楹联，讲述着温州深厚的千年文脉学风。

千年科举的温州试院与《重修试院古碑记》

今年4月，蝉街改造工程现场发现了一块清嘉庆23年（1818）《重修试院古碑记》石碑，进一步证实温八中附近是温州古考试院址。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蝉街温八中门口，不妨细细观摩一下这块见证千年科举试院文化的石碑。



今蝉街温八中门口《重修试院古碑记》石碑

碑文由时任分巡温处兵备道朱文翰撰文，内容记载，1817年在各方努力下，“糜白金五千五百九十两有奇”，修建试院。根据石碑的印证，结合相关的史料记录与明代地图显示，蝉街一带就是温州古代的科举考试中心，千百年来，三年一次的乡试，不知曾吸引多少温州士子往来于这里。

于隋大业元年(605)开始创立之后，延续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至今仍然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自经历了永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宋室南渡后，大批中原人士开始南下，其中不乏名流学者。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富有创造力的基因，使得温州孕育了1976名科场进士。尤其是在宋代，温州进士登科人数仅次于福州，位列全国第二，成为中国科举的重镇东瓯名镇。宋明时期温州不仅进士多，而且高科进士多，出了八位状元、十数省元，故有“温多士，为东南最”之称。

两宋时期，温州以科举跻身仕途，蔚然成风。从北宋徐奭(泰顺)成为温州第一位状元开始，到了南宋，温州状元频出，甚至一度出现“状元窝”现象：绍兴二十六年(1156)状元张九成出任温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乐清)高中状元，后官至龙图阁学士；1163年，木待问(永嘉)状元及第，后官至礼部尚书；还有传说张九成的得意门生、史上最年轻状元18岁高中的汪应辰或许是受老师的影响，晚年迁居永嘉屿北……在不长的时间内，4位状元在温州留下一段佳话。

在南宋淳佑元年(1241)，文状元徐俨夫(苍南)、武状元赵国华(平阳)同年登科出仕。王十朋《梅溪集》称：“永嘉自元佑以来士风浸盛，渊源自得之学……至建炎、绍兴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

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气运渐次衰败，有识之士寄希望于教育救国，科技强族，以图民族复兴。至此科举走向没落，直至1905年彻底停废，温州试院结束了科举使命。

当时，温州涌现了一批在全国颇具影响的知识群体，包括孙衣言、孙

锵鸣、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陈黼宸、宋恕、徐定超、吕渭英等，他们亲历了晚清的一系列变局，切身感受到了时政的弊端，主张变法维新，兴办新学，积极推动近代温州在思想、学术、教育等方面的发展。

以孙诒让为代表的温州先贤率先尝试创办新式学堂，以开启民智，兴学强国。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温州试院改为温处学务分处，任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兼温处学务分处总理的孙诒让，在此创办“温州师范学堂”（1908年改为“温州师范学校”，1911年又改名为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堂），晚清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通州（今南通）张謇题写了“温州师范学堂”“温州师范学校”校名。孙诒让还推动新式学校大规模创设，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温州、丽水两地先后诞生 300 余所各级各类学校。



温八中门口张謇题写的“温州师范学堂”校名（卢春雨 摄）

民国十二年（1923）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并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33年改为浙江省立温州中学（1954年改为温州第一中学，1985年改为温州中学）。以黄溯初、项骧、刘绍宽、林大同、刘景晨、刘廷芳、林损、金嵘轩、姜立夫、姜琦、郑振铎、夏承焘、梅冷生、伍献文、夏鼐、伍叔傥、苏步青、杨忠道、谷超豪为代表的大批学界精英崛起，温州成为中国最早步入近现代文化的地区之一。

责任编辑：朱凌云

摄影金奖背后的故事

——记我心目中著名艺术摄影家王曙和他的学生周芬

王邦志

闲暇时在书房浏览，从书架上随手抽出装帧精美的《温州市艺术摄影学会年鉴》（1998—2004），饶有兴致地欣赏那一幅幅艺术摄影精品佳作，《追溯》《逐浪》《网韵》《仙境》……

忽地，一幅引人注目的作品映入眼帘，那画面情景我再熟悉不过：训练场上，英姿勃发的青年民兵，身着迷彩服，站立在高射炮位前，正中的几位一个个脸色凝重，一位男民兵双手叉胸口，双目圆睁，转头傲气地瞟向远处；一位女民兵手托腮帮子，杏眼紧皱，侧身不甘地瞅着前头；还有一位女民兵，则是一脸的茫然和失望……那活灵活现的神情所传递的画外音便是，那边厢对手们正欢庆着夺冠，瞧着人家获胜的喜悦，心头好生不是滋味……这幅摄影作品的题目叫《屈居第二》，作者周芬。

思绪不由把我拉回到三十多年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所辖部队和人武系统举行“军心向党”为主题内容的摄影大赛活动，温州军分区政治部要求各人武部积极组织参与，以丰富国防教育活动，并力争取得好成绩。

其时，我刚被任命人武部副政委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响应上级号召，也为了力争参赛获奖，来个“开门红”，我寻思，仅凭鹿城人武系统的摄影水平和实力，想在如此规模的摄影大赛中获奖，难乎其难，

得请摄影高手来助力才行。我想到了温州摄影名家王曙。

这是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军分区政治部工作时，也喜欢上摄影。那时，我所在的群联科有台 120 照相机，有个冲洗照片的暗房，我经常在暗房冲洗放大照片，每每一搞一通宵，还曾经把我所拍摄的分区大部队助力温州建设莲花山电视发射塔盘山公路工程系列照片放大制作后，在机关大院搞了个专题展览。但我的摄影之路并未一直走下去，只是一般爱好，后来忙于工作便无疾而终。群联科还订了一份《中国摄影杂志》，我正是借助该杂志而与王曙结缘。

1981 年初，我在《大众摄影》杂志上看到一幅全国摄影大赛金奖《我的手最干净》之佳作，让我眼睛一亮：作品取景别出心裁，摄影画面新颖别致，画中有趣，画外有音，极具视觉冲击力。一看作者叫王曙，单位温州医学院，我便牢牢记住了他——这位次年便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为国际艺术家摄影学会（洛杉矶）副会长、中国华侨摄影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摄影学理事、全国民俗摄影协会博学会士、温州市艺术摄影学会会长，现为温州城市大学客座教授的著名摄影家。

于是，我就想，这次“军心向党”摄影大赛活动，若能请王曙出阵创作参赛，一定有戏。我欣然前往温州医学院拜访王曙。

性格豪爽的王曙，一听来意，满口应承。同是王氏本家，同都当过兵，同为搞政工，加之王曙热情奔放的个性，俩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可谓相见恨晚，从此成为好友。后来我的夫人和女儿先后都去了医学院系统工作，双方交往更甚。此后，王曙早年人民路边的老房，后来横河新村的寓所，现今龙泉巷的排屋，都是我曾经常拜访之地，尤其横河新村的寓所，是我当年单身汉时偶尔会去蹭饭的好去处。而我的书橱里，则陈列着王曙众多的摄影理论、摄影作品集。我在岗上班时，王曙但凡有摄影盛事或摄影培训结业典礼，总会叫上我，让我去凑个热闹。在这样的场合，我会不时碰上爱好摄影的鹿城区老区长王超俊，他常常是王曙的特邀嘉宾。我退休时，王曙送了我他的摄影成名作品——全国摄影大赛金奖《我的手最干净》，

挂在我千岛湖畔的寓所。

也因此，便有了上述的这幅画面生动的《屈居第二》之摄影佳作。当时，我和王曙合计了一下关于鹿城人武系统参与《军心向党》摄影大赛创作题材的选向，确定把鹿城人武部组织民兵高炮训练场景作为拍摄重点。王曙带了他的学生们，在高炮训练场上，身挂摄影包，长枪短炮，跑前跑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幅幅画面，一个个瞬间，定格在他们了然于心的光圈快门。

在王曙的这些优秀学生中，有位新加入的弟子叫周芬。这位周芬，可是非同一般，不但人长得美，还特有才华，温州市少艺校毕业后不久，被特招为文艺兵进了空政文工团，曾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同台演出话剧。刚转业不久的周芬，不走寻常路，不端铁饭碗，选择自谋职业，一时间迷恋上了摄影。艺术是相通的，王曙很快发现，当过文艺兵的周芬，浑身充满艺术细胞，既有美好的形象，更有良好的悟性，不但成为王曙艺术摄影的绝佳模特，也很快成了王曙学生中进步神速的摄影好手。

高炮训练场上，有许多训练比赛的热闹场面，也有众多表情各异的民兵神态，尤其民兵操炮射击动作对抗赛时高潮迭起，获胜方欢呼雀跃，庆贺胜利，落败方神情黯然，心情沮丧。充满灵性的周芬，没去关注获胜热闹的场面，而是慧眼发现那落败沉闷的情景，虽然无声，却是有戏，她迅速抢拍了这一自然真实的画面。这幅《屈居第二》摄影佳作，以其生动的



《屈居第二》摄影作品

题材效果，获得《军心向党》摄影大赛的大奖，其后又夺得全国妇女摄影大赛金奖。学生作品得奖，老师更为高兴，同时也为鹿城区人武部、温州军分区争了光。王曙和学生们创作的其他有关作品也获得奖项，鹿城区人武部也因此得了组织奖。

《屈居第二》连获大奖，让周芬扬了名，周芬由此在摄影界脱颖而出。我曾写了周芬的人物通讯，在《浙江日报》刊载。

可惜，周芬这位摄影后起之秀，却在迈进摄影艺术殿堂之后不幸患上绝症。周芬怀揣摄影梦想，与病魔顽强抗争，意志坚强，表现不凡，其精神事迹曾被央视《东方时空》专栏等众多新闻媒体专访报道。

有了孩子后，周芬在带病追逐摄影梦想的同时，把主要精神倾注在培养孩子中，每每我去她信河街边老屋看望她时，她会兴奋地揣出一摞摞的笔记和相册，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因病导致）吃力地说着，一边比划着让我看她那浸满母爱的作品：她几乎每天给儿子写的爱语日记和记录宝贝成长的爱心照片，是她留给孩子最珍贵的财富。

作为温州资深摄影家，王曙有众多学生，周芬应是他得意门生之一。周芬得病后，王曙为继续培养辅导周芬，力助周芬带病坚持探索摄影艺术，倾情相助，师德高尚。外出采风时，病弱的周芬走不了远路，上不了山坡，王曙和同行们便扶着、背着、抬着周芬。有一年，周芬心爱的价值数万元的照相机被偷，无奈的周芬心痛而又一筹莫展，王曙便在一场摄影理论研讨会上发起募捐赞助，帮周芬买来新的相机。

老师的力捧，同行的力助，自身的力行，促使周芬义无反顾地在艺术摄影的天地里艰难地前行着……她出版了个人摄影作品专辑《苦雨芬芳》，被选为温州市艺术摄影学会副会长。

用红颜薄命来形容周芬或许不妥，可是，周芬的命运确实如此。可叹这位富有才华的美女摄影新星，最终未能避过鬼门关，青春靓丽风华正茂时，却香消玉殒，令人扼腕叹息。

有时不免感慨，当年因着《我的手最干净》这幅摄影金奖作品而结缘

王曙，使得王曙有缘带着学生又凭《屈居第二》夺得摄影金奖。于我而言，籍此结识王曙，结识他的学生周芬，结识王曙摄影圈子的许多朋友，是我莫大的收获，我为此而庆幸。

在我心目中，全国妇女摄影大赛金奖获得者周芬，永远是美丽的化身。她留给这个世界的形象，她留在摄影园地的作品，她留下面对生活的心灵，都是美丽的。

而在我心目中，全国摄影大赛金奖获得者王曙，始终是火热的影子。王曙老朋友性格火热，充满活力，他热爱生活的激情与乐观，令人敬慕，他投身摄影艺术的执着与不懈，令人赞叹！

王曙不但活跃于摄影界，还是新闻界、教育界的嘉宾常客，每每受访电视专栏侃侃而谈，频频登上讲坛论坛滔滔不绝……

王曙追逐摄影艺术的脚步从不曾停歇。难以想象，年过七旬的王曙仍然自驾轿车，数千里奔波，至今已三十多次到西藏、新疆、大西北采风，在光与影的世界里追寻美、捕捉美、展示美……

除了已经出版众多摄影理论著作、摄影作品集外，如今的王曙，还在不断探索创新一种摄影艺术形式——摄影散文，每次突出一个主题，撰写一篇美文，选取一组美图，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令人赏心悦目。截至目前，这类精品佳作已经陆续推出 900 多篇（组），散文立意之精，摄影画面之美，涉猎题材之广，创作数目之众，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老朋友，王曙每期的摄影散文，都会发送给我。作为欣赏者，我经常被那美文美图所震撼而会写下留言。

我相信，王曙摄影散文的创作，定然是朝着破千篇（组）的目标而努力的，期待他的成功。

永嘉先生徐定超的温州革命亲友圈

徐逸龙

因海上交通开辟，晚近温州士子到杭州、上海等地游学逐渐增多。被称作“永嘉先生”的徐定超，担任京官兼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医学馆提调总教习、旅京浙江公学监督（校长），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温州军政分府都督等职，创办南苑农场八百亩，携带大批族戚子弟到北京、杭州、上海等地深造，其中不少走上革命之路。如胡卜熊、胡惠民、胡公冕、郑恻尘、谢文锦、金省真、胡识因、谢雪轩、金希真、徐挽澜等人，成为中共浙南党团组织 and 红十三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是浙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本文试以徐定超为中心点、以其亲友圈为半径，梳理与徐定超相关的温州革命群英谱。

一、徐定超表姐夫兼同门师兄

谢文波外孙女胡识因及郑恻尘

永嘉县蓬溪村，有一座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的“近云山舍”，是“知棋善画，尤精音律，精通医理”、超逸有致的谢文波到苏州遍访名第大宅测绘建筑样式后建造的。

谢文波，即谢思泽（1836—1909），字邦崇，号文波，又号听香居士，

蓬溪邑庠生（清时在县学考取的叫“邑庠生”），据说是谢灵运五十一世孙，与徐定超为同门师兄弟。他弱冠考取副贡，又娶妻徐定超表姐陈氏，因此谢、徐两家关系密切。谢文波潜心著书，曾参编《光绪永嘉县志》，现存著作有《因音求字》《四声正误》《反切法》《重编因音求字》等。



徐定超

谢文波外孙女胡识因（1893—1974），原名世英，化名吴式、郑耐冬，永嘉五尺人。

1904年因外婆徐氏（徐定超族亲）介绍进入艺文女学读书；1907年转入大同女学（校长胡德淑）。1909年到杭州王氏女塾补习国文、算术。1911年冬她自上海女子体操学校毕业，与徐定超的表侄郑恻尘结为夫妇。

郑恻尘（1888—1927），字振中，幼名日起，谱名朝寮，字彩臣，永嘉表山人，擅长绘画。其父郑清济，与徐定超是同学，其堂兄郑朝教（象联）则娶了徐定超的侄女。



胡识因（右）与儿女



郑恻尘

1903年，郑恻尘入温州府学堂（今温州中学）读书，1907年肄业，进入旅京浙江公学求学，受到该校枫林籍教授徐春波（徐定超舅表姐金氏

之子)器重,两年后又转到杭州王氏工艺讲习所学习。1910年,他回温在广化高等小学教理科,学生有谢文锦、戴宝椿等人。辛亥革命成功后,郑恻尘赴湖北投入革命军,后又回乡创办中一花席厂并任总技师、担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浙江省党部商民部长。

1920年,为解决中一花席厂职工子女入学问题,胡识因在温州城区侯衙巷创办私立新民小学。1924年12月,由谢文锦介绍,胡识因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新民小学成立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简称温独支),被指定为书记,直属党中央领导。1930年5月,胡识因任红十三军驻沪联络员。

二、徐定超家族

1. 内侄胡公冕、胡卜熊、胡惠民

胡公冕:红十三军军长

胡公冕少年时,在徐定超的关心提携下,从在北京当炊事兵的少年,成长为红十三军军长;徐定超的内侄胡卜熊,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胡惠民肄业于旅京浙江公学,表侄谢文锦,外甥金省真,姻亲戴宝椿、金守仁等分别在杭州、上海深造。他们后来均成为浙南革命的骨干力量。

胡公冕(1887—1979),原名世周,字昭从,永嘉五尺人,小时候在枫林私塾读书,后到温州城区上学。十六岁(1902)那年,母亲卢氏去世后,他到北京徐定超办的南苑农场生活,后经徐定超介绍在清兵营当炊事兵,再转到杭州梅东高桥随营学校当学兵。1909夏,胡公冕回乡,在岩头广化小学一边教体育,一边在高年级听文化课,与谢文锦等是同学。后他到湖州管带陶昌权处当教练,不久即回温,在枫林小学教体育,校长是徐定超的儿子徐象严。



胡公冕

1911年春，他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体育教员。

辛亥革命期间，徐定超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由教务长经亨颐主持校务和学生军，并任职改名后的浙江一师校长。胡公冕参加了辛亥革命军，在一师教导团里当排长。1912年春，南北议和，部队解散，胡公冕又经徐定超介绍，到浙江吕公望师部当服务员，后在童保暄师部当营长。进入杭州体育专门学校任教不久，胡公冕与徐定超侄女徐美如（胡识因小学同学）结婚。1913年秋，他转到浙江一师当体育教员，与校长经亨颐共事十年之久。

1921年10月，胡公冕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陈独秀派遣，赴苏参加军事训练。回国后他在中共中央担任军事训练工作。1924年，胡公冕参加孙中山先生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会议，并参与筹建黄埔军校，曾担任黄埔军校教官，奉命招收第一期学员。其中徐文龙（1902—1933，祖籍枫林，出生在温州城区荷花里，红十三军军部教导处负责人）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后留校任二期教官；徐挽澜（枫林人，红十三军军部组织处）也就读黄埔军校三期，并成为第六期教官。

1927年1月，胡公冕任北伐东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瑞安朱国风、丁一柱，永嘉城区马孟容、马公愚、夏承焘和楠溪金守仁、陈叔平、金贯真、金永贞、金省真、胡世培、胡还如、胡向泽、王兴龙、汪文龙皆在部属工作，为创建浙南红十三军奠定人才基础和社会网络。当时，旅沪温州同乡会的方介堪，还接待过胡公冕、胡识因、胡世培等人。

1930年5月9日，胡公冕奉中央军委之命，并得到亲友多方支持，在枫林镇惠日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并任军长。方介堪篆书、林希骞（孙孟昭丈夫）刻红十三军木头印章一方。1932年10月6日，上海《申报》第11版《与朱毛齐名之两共党首领》说：“共党伪（红）十三军军长胡公冕，兼任浙省红军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总理全浙红军政治事宜，其头衔固与朱德、毛泽东、林彪、孔荷宠相伯仲也。”

胡惠民：温独支首批党员之一

胡惠民（1887—1968），原名世璘，字玉文，永嘉五尺人，是胡公

冕的堂兄。他跟从姑父徐定超到北京浙江公学求学。辛亥革命成功，徐定超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以惠民为人谨厚而委任为机要秘书。1914年夏，徐任温州护商警察局局长，委任胡为玉环派出所所长。1924年12月，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建立，胡惠民为首批五名党员之一。1930年5月，胡公冕在楠溪组织红十三军，国民党当局发兵到五尺抓捕百多人，胡惠民挺身营救，化险为夷，有功于地方。

胡卜熊：与地下党领导人感情深厚



胡卜熊工作证

2. 表侄谢文锦：建立“温独支”

谢文锦（1894—1927）是徐定超的表侄，名用绣，字褰霞，永嘉潘坑人。1911年冬，谢文锦高小毕业，随后考入温州省立十中，因在课堂辩驳教师言论而发生冲突，被学校开除。避居枫林徐定超住宅时，他与小学老师胡卜熊、郑恻尘等人商量，后得到徐定超、胡公冕的帮助，进入一师继续求学。

1920年8月，谢文锦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5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谢文锦

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回乡筹建温州党团组织，他首先发展了郑恻尘和胡识因为党员。其后，他又陆续发展城区和楠溪亲友多名党员。这年的12月，谢文锦在温州城区新民小学成立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简称“温独支”，是浙南最早的共产党组织。1926年7月，谢文锦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第二年被捕杀害。

3. 外甥金省真：参加新四军工作

金省真（1899—1945？），谱名信峨，字顺峨，永嘉花坦东郭屿人，毕业于徐定超捐资创建的楠溪高等小学，敏捷过人，两手能书。1922年7月温州省立十师毕业。1925年1月，经谢文锦介绍他加入温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改革现社会的意见强烈，做事肯负责”，在上海国立东吴大学求学期间，他开始从事地下党组织工作。1927年秋，金省真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后转入航空大学受业三年。在苏联结婚成家，生有一子二女。1940年秋，金省真受党中央派遣回国，在新四军工作。



金省真

4. 姻亲戴宝椿：红十三军奠基人之一

戴宝椿（1892—1958），字萱庭，永嘉县溪口村人。曾先后毕业于永嘉县高等小学堂、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回温后担任多所学校的音乐教师。他还是温州早期的革命者，对温州早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军队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1924年12月，在谢文锦介绍下，戴宝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年初，在任弼时指定下，戴宝椿暂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温



戴宝椿

州支部书记，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温州救国会的中坚人物，为红十三军奠基人之一。

5. 姻亲金守仁：筹划发展革命根据地

徐定超推荐姻亲金守仁（即金祖声、金手辰）入浙江讲武堂读书。金毕业后任楠溪警备营中尉哨官，与楠溪高等小学体育教员兼营部教官胡公冕是同事。金守仁与胡公冕结交后，一起参与黄埔军校工作并东征和北伐战争等工作。



卓珠英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金守仁回乡建立西岸长龙山、陡门赤岩山革命据点。1928年春夏间，金守仁、胡公冕等四人再次经过猛虎岩山，越岭步羊肠小道，到西岸长垄山察看地理形势，筹划发展革命根据地。他以垦荒造林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10月9日（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凌晨，金守仁在家被本村恶势力谋害身亡，时年四十五岁。其遗孀卓珠英（1903—1994）从1929年起长期从事地下联络工作。她受组织派遣建立秘密交通站，后转移到温州城区蒲鞋市、县城隍殿巷、西公廨等处。她曾将“围剿山区红军据点”的密信缝在夹袄暗袋里，跋涉二昼夜到达潘坑地方，红军才能及时转移，使敌军围剿行动落空。

而金守仁的儿子金育东和内侄卓力文也参加了革命，为红十三军交通员。其女婿（枫林人）徐来清、徐定超的学生徐烈侯之子徐启秀、徐启秀内侄叶芳等，将革命活动基地延伸到陡门潘垟，直到金守仁的内侄卓力文追随叶芳、夏雷起义，和平解放温州城。胡、金两人历时四十余年的亲情友情，影响深远。

三、徐定超与其族亲徐清来

与徐定超叔侄关系的族亲徐清来，在清光绪元年（1875）乡试中举，

列第一百十名。第二年，徐定超也乡试中举，为第三十九名。

徐清来曾任江西龙南县、长宁县知县，他有位表侄叫周之庠（1888—1951），名熊，字之庠，永嘉东皋村人，居住城区县学前花园巷7号。周之庠早年在温州师范学堂求学，毕业后进入杭州统计学校读书。在杭读书期间，他与胡公冕、金守仁、陈叔平、郑恻尘、谢文锦等



周之庠

十人结拜为金兰兄弟，后回乡担任温州织锦学校监学。温州织锦学堂是温州最早的职业学校，一度因经费困难面临困境，后在徐定超资助下，才得以继续办学。

1930年，周之庠任永嘉八区（枫林）、九区（岩头）、十区（碧莲）三区土地陈报特派员，驻枫林办公，配合胡公冕策划攻打枫林成立红十三军之事。1931年7月和1932年8月，胡公冕两次策划温州兵运活动，周之庠提供保护场所、资助经费。

在周之庠担任温州织锦学校监学时，有位学生名叫雷高升（1901—1932），也就是后来的浙南红十三军第一团（第一独立团）团长。第一独立团的中队长周启佑，也是该校学生，与周之庠均有师生之谊。



雷高升

雷高升是瑞安人，原名施德彰，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同学周启佑亲友，在山村发展各地红军游击队。雷高升曾担任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支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团（师）长等职，是红十三军后期斗争的主要领导人，1932年5月遇害。

四、留学苏联十三人

在与徐定超相关的革命群体里，有十多人赴苏联学习军事、政治等。谢文锦是在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他写有《列宁与农民》等作品。此后，从1926年11月起，中共中央派李得钊、金贯真、胡识因、李立敬、谢文侯（谢文锦弟弟）、金省真、金希真、金演周、徐时惠、李立敬、郑育才和郑昨非，以及台州林炯等人先后远赴到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或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航空大学学习。学成后归国，他们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各地开展农民运动。



“留苏三真”：（左）金希真（中）金贯真（右）金省真

其中如李得钊（1905—1936，永嘉岩头人）、金贯真（1902—1930）均为谢文锦学生，两人属同乡、同学关系。后李得钊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是军委书记周恩来得力助手。金贯真则成长为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原名家济，在温州省立十中读书时，校长金嵘轩为他改名“贯真”，鼓励他为真理而奋斗。

金省真是徐定超的外甥，于1927年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在苏联结婚成家，回国后参加新四军工作。谢文锦的弟弟谢文侯，也曾到苏

联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军事和政治等，回国后随胡公冕组建红军并担任职位。但在红十三军失败后，他投靠国民党，后被我 21 军所俘，送交温州市公安局，1951 年被处死刑。

与金贯真、金省真并称“楠溪三真”的金希真(1901—1929)，原名学清，又名石声，永嘉县枫林镇外垞村人。在温州市立第十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与“二真”共同接受进步思想。1924 年，金希真考入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回温州市立第十师范任教。其间，他积极参与“温独支”领导的革命活动，并由胡识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金希真与金贯真、胡识因、金省真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军事班、炮兵学校学习。两年后回国，受中共中央指派担任红四军某团参谋长。1929 年 5 月，在福建龙岩的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

温州学者胡珠生和徐顺平曾专题研究过“以徐定超和胡公冕为代表的浙南革命渊源问题”，其中徐顺平先生还在 1965 年 8 月 7 日拜访过胡公冕，就徐定超与浙南革命群体的关系作了长谈。纵观浙南革命人才的梯队结构，可以说没有徐定超，就没有胡公冕，没有胡公冕就没有谢文锦，也没有后来的李得钊、金贯真，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革命思想传承关系。

参考资料：

《浙南红十三军传》 编著 刘定卿

《枫林古镇研究》《徐定超与浙南革命群体》 徐逸龙

《早期革命者音乐教师戴宝椿》 郑全

怀念国画大师刘旦宅

黄兴龙

清影风前乡谊重，中天明月正当时。
毫端物外幽兰茂，成竹在胸神笔驰。

此乃笔者撰写之《题刘旦宅先生馈赠兰竹图》一首小诗。



刘先生在上述墨宝上的落款是：“清影风前月下，幽香口角豪端。兴龙乡兄正。甲子夏，旦宅作。”甲子年即1984年。每次面对刘先生馈赠之《兰

竹图》，都会使我思绪万千。每次到他家拜访，刘旦宅、刘师母对我都很客气，而且从不收礼物。他们说，书画作品在社会交往中应当按润格收取，但对自己喜爱的亲友则可免费赠送。

我与刘旦宅先生首次见面是在1984年。那年正值国务院批准温州成为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温州市政府为全面向国内外介绍温州的各方面成就，决定出版一本题为《温州风貌》的纪念册，里面就有温州籍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专题。

当时我经常在《温州日报》、温州人民广播电台、《园柳》等新闻媒体和文艺刊物上，发表许多有关温州风光及曾耕西、张鹏翼、陈铁生、蔡心谷、金作镐、林晓丹、王卉、马允伦、金江等书法家、画家、作家的报道。于是市政府就派一位同志和我赴上海登门征集刘旦宅、方去疾、李成勋、黄达聪、谢博文（谢磊明儿子）等书画名家作品，并先后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

笔者从小喜欢书画，刘旦宅又是我们的同乡，因此我与刘先生夫妇有许多共同语言。此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温州市邮电局亟需引进程控电话，遂决定派相关人员分批去日本进行技术培训。我曾受命承担赴“日本驻沪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等事宜。当时，温州到上海的人员大都是乘轮船，船票很难买，乘船时间需要24小时。乘汽车更不方便，温州至金华段路况差，又经常塌方，有时在车内的时间竟长达30多小时。在上海办签证一般要10来天，为减少旅途颠簸，我们都住在上海邮电招待所。空闲时间，大都花在继续拜访刘旦宅等名人了。



1987年，刘旦宅先生与笔者合影留念（摄于上海）

刘旦宅(1931—2011)，别名海云生，温州人。自幼喜好绘画，1941年，他曾在温举办“十龄童刘小粟画展”，有“神童”之誉。1951年到上海，为私营大中国图画出版社书籍插图、教学挂图等，亦作连环画。后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职。历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主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1979年10月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大型美术作品展览及在多种专业报刊上发表，并被各地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收藏。

采访期间，我曾向刘先生提出2个问题。其一、假如您年轻时没来上海工作，至今仍在温州奋斗的话，会不会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他笑着说，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广阔天地，书画家才能大展身手。其二、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书读得太少，只有多读经典著作，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富有书卷气。在互相交流中，他还向我提及1981年其所绘的《红楼梦十二金钗》邮票，曾获全国邮票最佳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聊斋百图》《雪曹芹生平》《琵琶行》《洛神赋》《长恨歌》《九歌图》《太白观瀑》《东坡舞月》《虎溪三笑》《换鹅》《春消息》等。创作之前，他对原著都进行过深入反复之研究。我对刘先生最佩服的地方，除了天赋与笔墨功夫，他不但虚怀若谷，而且能及时吸收新鲜事物。如挂在他书房里的一幅花鸟画，其中一只小鸟翅膀的画法，就采取摄影中虚化技巧，令人有一种振翅欲飞的动感。当然，在沪期间我也曾向刘旦宅先生征求过其对温州书画名家作品的分析。

艺苑奇观，精英荟萃，风流高士三千客；画坛绚丽，风姿婀娜，窈窕红楼十二钗。这联是笔者对刘旦宅先生众多精品力作的中肯评价。

我初次见到刘旦宅墨宝，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时吴思雷老师和沈惠国（与刘旦宅是两姨夫，仍在龙泉县新闻报道组工作）共同发起，刘青松、刘天安、刘天文、黄兴龙等相关人员予以鼎力配合，在温州蝉街的一幢民宅中举办刘旦宅先生在故乡的第二次画展。人物、山水、花鸟、



《红楼梦》邮票小型张 刘旦宅 / 设计

书法，可谓门类齐全，精采纷呈。观众好评如潮。《浙南日报》、温州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记者，都亲临现场进行采访。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温州首次举办的海派名家个人书画展。

1998年6月13日至18日，刘旦宅先生第三次在温州举办的书画展，在温州中山公园旁新落成的温州市图书馆新馆（现温州市少儿图书馆）隆重展出。该次书画展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温州文化局、温州大学、温州电视台承办。开幕式由副市长陈莲莲主持，钱兴中市代表市政府致辞，刘旦宅致答谢辞。市领导钱兴中、连正德、陈艾华、蒋云峰和刘旦宅先生，一起为书画展剪彩。当年刘旦宅先生正好68虚岁，他从数百件作品中，精心挑选出自己最满意的68件作品，并说中国人有个习惯都喜欢讲虚岁。68岁68件作品，既讨彩又吉利。6月18日，刘先生为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特地从书画展中选出自己最满意的《观沧海》图轴，赠送给温州博物馆。这次展览先后接待近五千名观众，影响深远。对于该次书画展的成功举办，笔者感动之余，特地撰写楹联以示庆贺：擅人物，工花鸟，直逼汉唐，清新雅健传神笔；谙百家，善诗词，精通经典，傲骨柔情旷世才。

瓯菜老厨师王成山

朱凌云

王成山，温州瓯菜老厨师的代表人物，省一级厨师。他博采众家之长，集瓯菜之大成，特别是一手刀工绝技，当时温州厨界公认无出其右者。他是重新开业后的华大利餐馆的首任经理，先后当了二十多年的国营餐馆经理。

王成山，1939年10月出生，温州市区康乐坊人。家里兄弟姐妹7个，他排行老大。他没读过书，14岁开始到东门的江崇球面馆打工。该面馆由福建的一对夫妇开设。老板包吃，给他每月3元左右的报酬。干了一年多，转到涨桥头的一家叫陈长春的小餐馆上班。该餐馆的阿益老师，小有名气，教了他一些烹饪方面的知识。

1956年初，在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温州市资本主义工业185户、从业人员5457人全部实现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包括小商贩）8992户、从业人员11389人，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3月，王成山和郑志钦几乎同时到县前头公私合营的县前食堂上班，做杂工，干些杀鸡杀鸭和洗洗刷刷的活。空闲时，

跟张阿宝学习厨艺。

1956年10月1日，坐落于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正式对外营业，经理为郑林珍。该酒家有3层，工作人员40余人，是温州在新中国成立后办的第一家国有饮食企业，也是那时温州最高档的酒店。温州解放后的第一代瓯菜名厨，如南永坤、徐岩池、熊岳年、陈金姆、林宝姆、吴岩林、阮福明、郑林珍、陈锦树、朱良贵、吴正道等，先后都栖身于此。王成山属于第一批到酒家上班的人员之一，开始做服务员，和云弟、松弟、范崇歧等师兄弟一起。服务员老师有阿银、刘毅、定云等。那时的服务员没有女性，都是青一色男性。不久，王成山改任厨工，从厨房的一些杂活做起，慢慢熟练后，拜陈锦树名厨为师。陈锦树厨艺精湛，刀工、炉工俱佳，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温州酒家老照片

1957年左右，温州饮食公司在城西教堂召开饮食业大会，并进行师徒签字拜师仪式。王成山和陈锦树拿到了师徒签约证书。

王成山一年难得有几天回家，吃住睡都在酒家里。他脾气犟，个性好强，

学什么东西都有力争第一的劲头。精力充沛的他，每天起早摸黑，做完本职工作之后，还跟各位名厨学习烹饪技术。在不断地学习和积累中，厨艺大进。

二

1960年2月，温州区召开以机械化、半机械化及春耕工具改革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经验交流大会。这股风也吹到了温州酒家。酒家陈旧的厨房设备，在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下，显得效率不高，计划实行技术革新。这时候，工作表现优异的王成山，已被选为厨房小组长。酒家派了黄步坤和王成山两人，坐火车到北京寻访新型厨房设备。半个多月的北京之行，虽然没买到设备，却让王成山开了眼界。此后，他又多次被酒家派出去寻访购买新型设备，完成温州酒家厨房的技术革新任务。

1960年左右，全国第一次党支部标兵会议在乐清雁荡山灵峰招待所召开。由于厨房人手不够，登选坊交际处的范老厨师和厨艺已经非常出色的王成山两人被选中，去做了几天的厨师。1961年底，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一行到洞头视察海防工作，并看望女子连。温州酒家奉命指派了丁炳玉和王成山去洞头客串当厨师。王成山记得那时天气特别冷，他和丁炳玉负责小灶（当时按级别分大小灶），专门做菜给首长吃。

温州酒家的厨师分炉工、刀工和包点师傅等。厨师的工资分几个档次，大致为24.5元、44.5元、51元。后来，加了最高的一档59元，不过拿到的人很少。奖金方面，拿多少需要评定等级，服务员和厨师分开两组，每月开会评出。奖金分三级，表现最好的一级每月5元，二级每月4元，三级每月3元，评不上的就没有奖金。王成山每月的工资为24.5元。他因为工作积极，拿的基本是一级的奖金。

1963年，王成山和同在酒家工作的服务员李秀英结婚。他摆了八桌酒，在那时算是规模比较大了。他请了徐岩池、南永坤、陈锦树等名厨来掌勺。

温州酒家生意兴隆，每天都要消耗2至3头猪，10多只火腿，海鲜无数。酒家推出八大名菜，如炸溜黄鱼、马铃黄鱼、红煨猪排、蟹粉绣球、鸡茸溜黄菜、炸八块等，顾客点的较多。温州丰富的水产资源，形成了鱼贱肉贵的局面，有钱人吃蹄膀红烧肉，穷人吃黄鱼、海蜇，都是几分钱一斤。

那时候，黄鱼遍地。其起因是在1956年夏天，两位福建惠安县的渔民将敲罟作业带入平阳县石砰乡（现属苍南县）。因连获高产，当地渔民纷纷效仿，有关方面还发出了通知加以“推广”。1957年春节期间，全市掀起了敲罟热，参与敲罟作业的大小渔船超过4000艘，捕鱼量提升了20余倍。一时间鱼多价贱，大黄鱼从每斤两三角跌至五六分钱，不少大黄鱼因为来不及出售或加工，堆在滩头任其腐烂。这种“竭泽而渔”式的作业法，直到70年代中期才被政府明令禁止，造成了后来海洋资源的持续衰竭。



1979年，在杭州举行省厨师技术等级考试，来自全省的九个评委合影留念。其中温州评委两人，分别为陈锦树（左后3）和何阳春（右2）

当时因为黄鱼多又便宜，温州人家家家户户都变着法儿弄黄鱼吃，有把黄鱼做成鱼饼、鱼丸的，有把黄鱼做成敲鱼的，甚至有人把黄鱼炒成了黄鱼松。温州酒家的厨师，能把黄鱼弄出七八十种吃法。那时候，温州人还不习惯吃鱼头，两三斤重的黄鱼头，都少人吃。王成山每天晚上下班后，

都溜回家一趟，带三个大黄鱼鱼头给家里人当菜吃。

温州酒家后来经过不断翻修，面积达到 1400 多平方米。酒家一楼供应快餐、包子以及各类瓯式花色面点、熟食卤味；二、三楼供应和菜、经济小吃及承办婚礼寿宴之类的酒席。王成山前前后后在酒家工作了八九年的时间。在这里，他跟过酒家的几乎所有名厨，在不断地取长补短中，终于融会贯通，厨艺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他的刀工精细，腰峯火腿能切出 80 多薄片，一个荸荠白能切 50 多片，令人拍案叫绝。

1964 年 5 月，在郭沫若到温州视察并游玩江心屿之前，王成山被温州市饮食公司调到江心屿浩然楼，跟早先调到这里的师傅陈锦树一起工作。他调出温州酒家不久，时年 20 岁初出茅庐的金次凡进了酒家。

三

王成山在浩然楼工作了半年，被调到广场路道前桥的城西餐馆，当上了经理。该餐馆两层，100 多平方米，有工作人员 20 多人。他在这里工作多年，拿的工资是 44.5 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一度从经理的位置被换下来。“文化大革命”后期，城西餐馆扩建，王成山负责筹建工作。他记得前后连材料共花了 28 万元，历经几年的功夫，终于建起了新餐馆。为了给餐馆取名字，他们开了好几次会，着实动了一番脑筋。最后，餐馆的名字敲定为华大利餐馆，让该名号起死回生。全新的华大利餐馆于 1979 年正式开业，有三层半，1000 多平方米，工作人员达 40 多人。王成山为首任经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是 1967 年“温联总”（浙江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和“工总司”（温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肆武斗之后，百业萧条，餐馆生意一落千丈。

虽说社会动荡，但是群众家里大大小小的红白喜事，还是要办的。赋闲的厨师们，找到了出路。他们纷纷自带厨刀和盘碗，到群众家里掌勺拈

外快。这种现象解放前也一直存在，厨师界称之为做“撑儿”。王成山自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他一边在餐馆工作，一边做“撑儿”赚钱。由于名声在外，请他的人特别多。

“文化大革命”后期，餐馆生意逐渐恢复。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温州人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原先婚宴都在家中摆的，都转移到了各大酒楼、饭店。温州餐饮业以温州酒家为领头羊，引领诸如华大利餐馆、山外楼、东风餐馆、百味厅等一些国有或集体所有制的酒家餐馆，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当时，在温州酒家、华大利餐馆订喜宴的都要提早排队，甚至要走关系开后门。

1979年，在杭州市举行浙江省首届厨师技术等级考试，全省有来自杭州、绍兴、宁波等市九个评委，其中温州两位，分别是陈锦树和何阳春。温州派出了李阿丰、王圣光、王成山、金次凡参加考试。结果，四人全部通过，李阿丰、王成山获得省一级厨师职称，王圣光、金次凡因为表现优异，直接获得了省特二级厨师职称。四人不仅在考试中一举成名，还为温州烹饪界赢得了荣誉。

1982年，王成山调到国营温州海天楼大酒店当经理。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左右，金次凡卸任山外楼餐馆经理之职，王成山调任该餐馆经理。此时，温州民营餐饮企业慢慢崛起。他们起点高，无论规模和档次，都是老一批酒家、餐馆望尘莫及的。山外楼餐馆，在竞争中风雨飘摇亏损严重，没多久便停业装修整顿。1985年，餐馆重新开业时，改名为浙南酒楼。

四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温州。为了迎合外地人的口味，湘、川、粤等主流菜系大行其道，温州各大酒店、餐馆纷纷效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的口味逐渐被外来菜系同化。从此，温州酒家、华大利餐

馆等传统瓯菜酒店慢慢走上了下坡路。

1987年12月，《温州市深化国营商业改革的若干规定》颁布。管理体制落后的国营餐馆、酒店纷纷转向承包经营。不久，浙南酒楼也搞起了承包。王成山虽赋闲在家，工资照拿不误。

1990年前后，王成山在温州雪山路开了个20多平方米的饭摊。因为饭菜可口，价廉物美，吸引了对面皮鞋厂的很多工人过来吃饭，两夫妻忙得不亦说乎。一直干到1997年，他才收摊休息。

1999年，王成山和郑志钦厨师同时退休。从此，他告别了烹饪一线，过上安稳的退休生活。

2003年，王成山的儿子王凡在上陡门开起面积100多平方米的阿凡佬饭摊，他帮忙去照看生意，偶尔也指点一下厨房事务。

王成山是个硬性人，脾气犟，有时显得不合群。但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每年的正月初一，他都按时去师傅陈锦树家拜年。师傅离世后，他继续每年给师母拜年，20年来从未间断。



2014年10月15日，瓯菜厨师在周师傅瓯菜馆合影

潘顺发与他的互助组

林正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永嘉县藤桥乡（今属鹿城区藤桥镇）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欢庆翻身做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获得迅速的发展。

一九五一年，中共永嘉县委在新桥搞互助组试点，陈加兴同志带头组织起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当时年华正茂的寺前村潘顺发，带头组织农民成立藤桥帮工组（也叫扮工组），后来叫做互助组（又有临时互助组），发展成为常年互助组。

他走东家串西家，先后多次召集潘阿国、潘陈姆、李日洪、潘陈发、潘良兴等人商议，讨论互助组的有关问题。起先人们还有种种顾虑，那些劳力好、有耕牛农具的怕吃亏，不愿入组。经过耐心说服，这些人都申请加入了。

互助组比单干优越的事实，很快被证明，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一九五三年三月，组员潘显中的妻子患肠道梗阻，无钱医治，互助组设法帮他借钱。当时藤桥到温州还没有公路，互助组派了四个人组成担架队，把他妻子送到温州医院治疗。妻子康复返家后，顺利分娩一个儿子。他经常对人提起，他妻子的第二次生命是互助组给的。

潘岩旺、潘克进、潘克法等人因缺乏生产资金和农具，生产出现困难，

他们看到互助组能帮助成员解决困难，也先后加入了潘顺发的互助组。

潘顺发领导的互助组户数越来越多，生产发展了，产量提高了，组员收入也增加了。潘顺发互助组在藤桥一带起了积极的带头模范作用。一九五三年，潘顺发被评为互助组劳动模范，同时被选为永嘉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他出席省青年代表大会，上级发给潘顺发互助组双层打稻机和收音机等奖品，他个人也获得了一枚劳动奖章。

潘顺发互助组有一套生产管理与分配办法。这套办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首先是对组员土地按照土质好坏、远近不同分等级定出产量标准、所需工数和各种肥料多少，实行定额管理，对劳力实行按件计分，多劳多得。年终分配的办法是：先提取当年全部产量的50%作为地租。地租包括投入土地的报酬与应纳的田粮在内。另外50%除留足种子外，作为组员口粮和饲料粮，再提出少量作为奖励与预备粮。预备粮预存入国家仓库，作为歉平年之需。

组员的口粮也以每人年平均480斤稻谷计算，再考虑劳力强弱和年龄大小分配供应。此外，组员还按工分、肥料、牲畜及奖励等计定粮食，所以组员的粮食大都是略有积余。

藤桥寺前村潘顺发组织和领导的互助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以一颗闪耀的星辰载入农业合作化的史册。

责任编辑：戴爱华

解密 1600 年前的温州

——一代大儒孙诒让复原浙南第一部地方志

汤琰琰

王羲之在温州留下哪些踪迹？

乐清古称应该是“乐成”，还是“乐城”？

雁荡风光早在六朝前就已经闻名于世，而不是沈括所说的北宋祥符年间；

魏晋时期温州养蚕技术就很发达，蚕一年可以八熟，“八辈蚕”是世界上低温催青法最早的文字记载……

距离东晋太宁元年（323）建永嘉郡不到百年，南朝刘宋时人郑缉之，撰写了一本名为《永嘉郡记》的志书，被清代大儒孙诒让赞叹“吾乡图牒，斯其权舆”。正是这本“宝书”留下的温州“密码”，使得今天的人们得以知道 1600 年前温州的真实面貌。

孙诒让赞叹“温州的地方志里最原始”的《永嘉郡记》，也是浙南地区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

千年前的温州“密码”

《永嘉郡记》，是南朝刘宋时郑缉之撰写的一部志书。著书时间距离

东晋太宁元年（323）析临海郡温峤岭以南置永嘉郡以来，不到百年。

温州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悠久。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之，为《三国志》作注的大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丘迟等文化名人，都担任过永嘉太守。郑缉之与这些文化郡守生活的年代相隔不远，他笔下温州的名人轶事，以及当时的风土人情，特别是他对东瓯王城、王羲之踪迹的记载，更有可信度。

郑缉之的著作很多，但名气却不大，从一些史料中大致可以得知，他在南朝宋曾担任过“员外郎”的官职。除了《永嘉郡志》外，他还撰写过《东阳记》，或许曾在温州或东阳作官，也或许籍贯就在这两地，但因年代久远无从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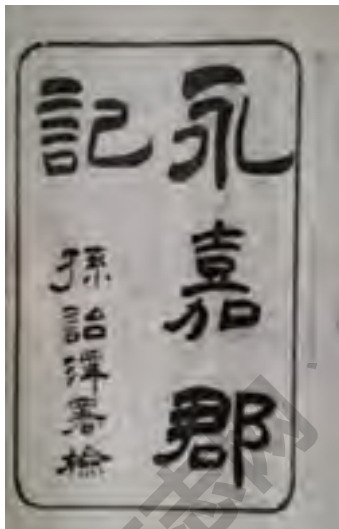
《永嘉郡记》在南北朝时传播很广，如刘峻笺注《世说新语》，在《轻诋篇》注中引过《永嘉记》所载琅邪王和王羲之的家世。贾思勰《齐民要术》，在《种竹门》援引《永嘉记》，提及箭竹笋和掘土取笋，查考古事，辨明名物，都曾找它作证。

大儒孙诒让“大海捞针”

可惜的是，自宋代以后这本书已经失传。

所幸的是，此书在唐宋等时期，曾引起许多史书、类书编纂者的重视，纷纷加以摘引。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书之外，《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唐书·地理志》《宋书·地理志》等都曾征引《永嘉郡记》的内容，才部分保存下来一些内容。

到了清末，一位博览群书的温州大儒，如大海捞针般，将许多书中摘



录的《永嘉郡记》引文，重新加以校对、考证，汇集成书，终于部分解码了这个温州宝藏的“密码”。

清同治八年（1865），当时才22岁的孙诒让辑校郑缉之的佚著《永嘉郡记》，将50多条佚文汇集成册，并撰写了《书〈校集郑缉之永嘉郡记〉后》。十年后，经过反复推敲，他再写下两篇文章，对校集本又作了补充和说明后才付印。孙诒让被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正是因为他的严谨、博学，才让仅剩“碎璧零玦”的《永嘉郡记》复原成如今的面貌。



孙诒让

弥足珍贵的《永嘉郡记》

孙诒让所说的“仅此碎璧零玦，弥足珍贵”的《永嘉郡记》，到底珍贵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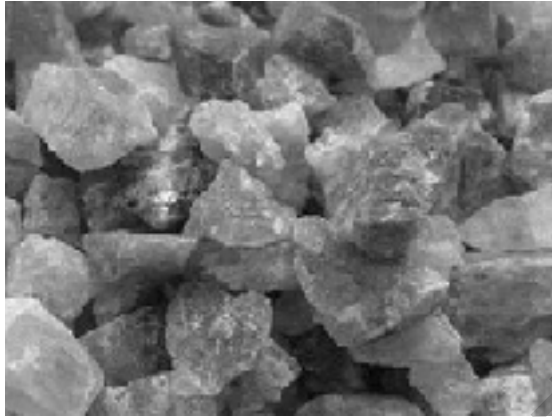
经过他整理的该书佚文仅51条，叙述的内容涉及山、水、物产、乡亭、人物传闻等。

根据书中记载，当时温州的蚕桑已很发达，产有“八辈蚕”（蚕一年可以八熟），物产如襄瓜、竹笋、甘蔗和药材中的紫石英、黄精、细辛等也都很出名。特别是乐清的新溪产“蛎”，味道很好。

书中关于罗浮山、泉山、帆游山的记载，不仅让今人知道这些地名出处由来，也见证了“沧海桑田”变换，如说帆游山“地昔为海，多过舟，故山以帆名”。

孙诒让曾说到，温州古代文献留存不多，宋、元时期的旧方志都已亡佚，魏晋齐、梁以前的历史尤其渺茫，这本书让后人能找到在此之前更确切的

有关温州的史料，自然非常珍贵。



紫石英



20世纪50年代的大罗山天河水库(邵度摄)

王羲之的温州踪迹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出身贵族，为东晋大臣王导侄，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是我



王羲之

国著名书法家，史书载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被尊为“书圣”。

关于王羲之是否曾经当过永嘉太守，史学界还有争议；但对于王羲之来过温州，却因为《永嘉郡记》的记载得到认同。

这本书中，共有三处提及王羲之的温州踪迹，“昔王右军游永嘉，经于恶道。右军书南边大石，今犹见墨迹，而字不甚了了。”“王右军游恶道，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濼于石。”书中还提到王羲之前往乐成（今乐清）造访隐居在竹林中的张荐，被拒失望而归。

根据《晋书·王羲之传》，“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他的足迹曾至永嘉（今温州），与《永嘉郡记》互相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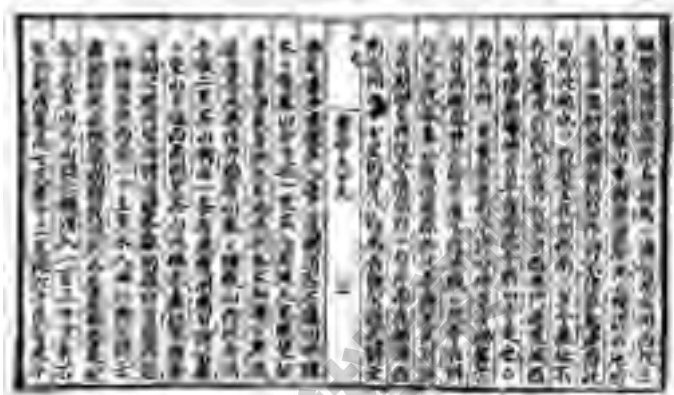
乐成和乐城，都是乐清的古称

乐成设县开始于晋代。但是古书中，有写乐成的，也有乐城的，后人莫衷一是。

如《旧唐书·地理志》别写为“城”字，而李吉甫、乐史等所著的

地书，韩愈撰写的《温州刺史路应神道碑》，孟浩然吟咏永嘉之行的诗篇，都一致地写成“成”字。

但这本《郡记》八条佚文中，只有两条写成“乐成”，有六条写成“乐城”，可见“成”“城”互通，不应该固执一说。宁康年间乐清设县的州郡册籍尽管已看不到，但后梁开平二年“复改乐成曰乐清”的诏令毕竟有史可据，可以断定是不会错的。“孤文幸未蚀灭净尽，足可用以雠校旧史”，孙诒让认为这是该书的一大优点。



注明“瓯水”的源头和流向

东瓯是历史悠久的城邑，因水得名，商代称“沔”，周代称“欧”。

但桑钦《水经》、酈道元《水经注》等古籍，都未曾提及瓯江。民间以讹传讹，竟以括溪的支流混淆瓯江的专名。

《郡记》所说：“瓯水出于永宁山，行三十多里，在郡城五里入江。”源头清楚，流向分明，纠正了俗说的错误，孙诒让认为它的贡献是很大的。

除了“瓯水”之外，郑缉之还记载，这里“昔有东瓯王都城，有亭，积石为道，今犹在也。”可见东瓯王都城在南朝刘宋时代还留有遗迹。



据《史记·东越列传》所述，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驹摇为东海王，都东甌，世俗称为东甌王。一般学界认可温州建城时间，从东甌王都城算起，至少有2200多年。但东甌王都城的遗址在何处，到现在还是个谜。

清光绪《永嘉县志》称其“在今温州西山北甌浦，其地即东甌王故城，岭有二亭，旁侧有东甌王墓、祠”。孙诒让在《永嘉郡记校集》中说：“永宁山在今永嘉县，绵亘贤宰、仙桂、永宁、清通四乡。”他认为甌水即今楠溪，入江即谓入永宁江（瓯



江）。《温州市志》则认可孙诒让的意见，认为似在瓯江北岸，楠溪江下游一带（今永嘉县境内）。如果后人能通过郑缉之的记载最终找到都城遗址，意义重大。

康乐已窥，雁荡早在六朝前就已闻名

雁荡风景奇秀，举世闻名。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提到雁荡山直到“（大中祥符间）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后人纷纷附和。即使有所怀疑，也得不到可靠资料比较对照。

其实从谢灵运《斤竹涧越岭溪行》诗，可见当时这位“山水诗鼻祖”早已到过雁荡山。而这本《郡记》所载：“乐城县三京亭，是祖送行人之所。”三京亭就是现在雁荡山的照胆溪，它是路祭所出的地方，跟九达的通衢毫无区别。可见雁荡的雄秀风光早在六朝以前已经彰著于世，沈括的疏误是不言自明的。

参考材料：

《永嘉郡记》 郑缉之撰、孙诒让校集、宋维远点注

《校集郑缉之〈永嘉郡记〉》 序 孙诒让 / 文 胡珠生 / 译 原载《温州日报》

《那些用方志 留住历史的温州人》 张声和

《王羲之与温州》 徐定水

《东甌王都城遗址今何在》 柯永乐 程爱兴

元代温州画家林一清生平考述

余 辉

一、林一清生平考释

1、三处文字记载

林一清其人其事未被载入画史，但在目前零星文献里有三处记载，虽籍贯有些不同，但活动时间不矛盾。综合来看应是同一人。

其一为《观世音菩萨画像赞》：

……永嘉林一清，为上原尹，治政之余，稽首参礼，用清净毫画东大瀛海，水势喷涌，傍有磐石，菩萨见天人相，翘其一足，坐彼石上，护法大神身被宝铠，骈立于左，善财童子垂莲叶舟，合爪遥礼，自右而至其上，日轮正照，云气杳漫其下，龙女持珠仰首而献品……观一清运笔皆有所表现，非徒为虚饰而已。中绘菩萨现大悲相表慈悯众生……

其二为《建宁府志·闽中书画录》：

林一清，字源洁，瓯宁人，善绘事，笔法苍古，年八十有余，信手挥染，无不妙绝。

其三为元惠宗朝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许有壬《至正集》卷八载《送界画林一清赴台州并序》：

予幼读书江南，舍书无所嗜，买书苦无资，故于画不能有，况能别乎！入京，游道广，时时见有，鉴论品第，咻之积久，因知古人以是名家，亦岂易哉！我朝杰出者盖可历数，十门诸品，各见于世，独宫室台阁名者罕闻焉。宣和秘藏所见，不过唐尹继昭、五代胡翼、卫贤、宋郭忠恕而已，则知此艺世殆未易精也。皇庆间，王震（振）朋者，名一时。今得永嘉林一清，予所知二人尔。天地事未有无法者，画虽一艺，囿于绳矩，而不为窘束，乃可语其至。奋笔作气，挥霍涂抹，有足以耸动人者，语其豪宕则可，而未足语乎法也。若夫千门万户，正斜曲折，广狭高下，毫厘之间，不悖绳矩，寓算家乘除之法，此画之有合于学而有用于世也。故界画有可据以缔构者，有但观美而施用缪悠者。释者谓之，可以拆架，乃为得法，此真知画者哉！一清多艺而攻于此，所谓囿于绳矩，而不为窘束，可以拆架者也。昔以岐黄术业供侍文宗，青宫出官监沧州税，改台州监仓副使。其行士大夫钱之诗，余序其首，且为之诗曰：

天地万物有规矩，大匠胸中具楼阁；
有人悟此谢斧斤，笔锋乃有公输学；
千门密可数椽闾，万间细不遗榱桷；
勾心斗角蠹蜂房，各抱地势分垠堞；
横斜平直自垂除，高下蔽亏相脉络；
按图考制如指掌，拆架不许毫厘末；
林君又得高古趣，守法不受绳墨缚；
乃至做事贵有益，舍是但可资谈谑；
有言赠子试静听，阿房迷楼勿轻作；
后来贤者识寓戒，淫昏适足媒其恶；
子归好究土皆图，圣治方将复淳朴。

许有壬（1287—1364），汤阴（今属河南）人氏，字可用。他是延

祐年间（1314—1320）进士（元代基本取消科举制度，仅仁宗朝有所恢复）。他入朝四十余年，系七朝（仁宗至惠宗）元老，历任吏部主事、监察御史、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中书左丞，至至翰林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兼太子左谕德，秩从一品，至正十七年（1357）致仕。因此，许有壬在宫中与王振朋、林一清完全有交往的机会和条件。许有壬对林一清的态度，可折射林一清在朝廷的地位。

2、元文宗、许有壬与林一清

综上所述并加以细读，结合元文宗部分史略，林一清生平尚可考。

林一清（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元末明初），字源洁，永嘉人氏，与王振鹏画风相近，应受过其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人生历程也与王振鹏十分相近。林一清起步于元怀王图帖睦尔在集庆（今江苏南京）的潜邸。

图帖睦尔是元代皇帝中少有的能画者。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云：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命臣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其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今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

图帖睦尔广交江南才子，对书画家尤为专宠，声闻涌溢吴越。在此处效命的画家有仙居（今属浙江）柯九思、吴兴（今浙江湖州）唐棣等。致和元年（1328），远在浙江黄岩任知州的李士行也来投奔，但不幸死于路上。林一清在怀王府时，与他们应有所交集。许有壬说林一清是以医道侍奉尚在潜邸的图帖睦尔，其实还应该加上其绘画特别是界画才能。

林一清及这批江南才子的入宫与图帖睦尔有关，图帖睦尔在政治上的决绝，对他们多少也有负面影响。

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封图帖睦尔为怀王，赐皇家黄金印。次年，命怀王出大都到建康（南京），建康成为怀王府所在地。致和元年，图帖

睦尔受到猜忌，被贬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同年泰定帝驾崩，图帖睦尔登基，是为元文宗。他两度登基，第一次为1328年10月至1329年2月，第二次是1329年9月到1332年9月，当皇帝的时间共计四年，是元代宫廷政治最黑暗的一幕。

据《元史·明宗纪》载，武宗海山死后，其弟爱育里八力八达继位，是为仁宗。他背叛誓约，把皇太子位授与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而武宗留下的两个同父异母儿子，长子和世璠（时为周王）远在西域，次子图帖睦尔为怀王，从集庆贬到江陵。和世璠在西域金山一带流亡十二年，被察合台汗国收容。1328年，元幼主亡，图帖睦尔即位，他宣布不久将让出帝位与其兄长和世璠。和世璠到大漠北旧都和林后宣布继位，即元明宗。1329年，图帖睦尔从大都出发，北行“迎接”兄长明宗。八月四日，文宗与明宗兄弟在今河北省张北县北重聚，似乎弥漫着欢乐气氛。但四天之后，登基仅八个月的明宗突然死亡，年仅三十岁。知情者明宗皇后八不沙，不久被宦官烧死，一说是赐死，年仅二十八岁。后人看明宗皇后肖像，则是满脸冤屈和无辜，这是宫中知情画家给予的无言同情。

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病死，终年二十九岁，死前自悔害兄僭位，立下遗诏由明宗之子继位。至元六年（1340），明宗子妥欢帖睦尔（即顺帝）为报复叔叔图帖睦尔，下令将其牌位从太庙撤去。

林一清在大都的时间应与元文宗相当，约为四年。他相当低调，今找不到他在宫里的活动记录，只知道他还有过外差，曾“为上原尹，治政之余，稽首参礼”。这或是元文宗所赐职官，相当于县官。上原即今河北元氏县西，他在那里参禅礼佛，画过《观世音菩萨画像》。

林一清出宫外任之前，许有壬出面搞了一次雅集为其送行，许多人都写了送别诗，最后还出了诗集。许有壬也写了长诗并为之作序。按理说，林一清也是会写诗的，否则就不会有这样一个雅聚了，他有《乌石观丹泉马迹》传世：

仙人煮药留遗迹，道士开基结石坛。
玉练横空沧海曙，金虬啸月翠虚寒。
解经欲挂三华树，鍊质须成九转丹。
巢鹤不归松未老，坐听清磬出林端。

元文宗在宫的四年时间里，竭尽招数汇集笼络了一大批名儒。天历二年（1329）三月，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收藏、鉴识历代先贤书画，他常在奎章阁学士院与诸文人学士雅集，“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时授经郎揭傒斯亦在列。”文宗还组织修撰《经世大典》，大大推进蒙古贵族的汉化进程。

林一清在宫里或在大都，是有一些绘画活动的，但不知任何职，不然许有壬对林一清的界画评价不会如此真切、细腻：“若夫千门万户，正斜曲折，广狭高下，毫厘之间，不悖绳矩，寓算家乘除之法，此画之有合于学而有益于世也。故界画有可据以缔构者，有但观美而施用缪悠者。释者谓之，可以拆架，乃为得法，此真知画者哉！”

所谓“拆架”，是指可以拆解林一清界画里的建筑结构，且毫厘不差。许有壬给林一清的界画艺术做了一个论定：“皇庆间，王震（振）朋者，名一时。今得永嘉林一清。予所知二人尔。”可知，在王振朋之后，取代他的宫廷界画家是林一清，元代界画家辈出，获此誉者，唯林氏一人，是事实上的王振朋后第一人。

3、南返外任

林一清何时离开元内府，这要看与他从图帖睦尔潜邸同来的同行了。

文宗在宫中虽文治有成，但喋血遭报，牵累左右。他死后，柯九思早就受嫉妒，被弹劾束装南归，流寓松江。估计林一清差不多也会在1332年文宗死后不久离开内府。从许有壬给予林一清的礼遇，可见林一清在宫

里与部分文官相处甚为友善，也没得罪朝廷，他走得相当体面，应该是升官了。

林一清的外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先是官监沧州税，后改派台州任监仓副使（六品）。因至元二十八年（1291），中书省制定“自己地面休作官”的制度，林一清是不能到原籍任职的。而按元代“官员老病致仕”“七十致仕”的规矩，说明林一清此时尚年轻。

林一清到台州赴任，虽是肥差，但后来因海盗原因，朝廷海事活动有些紧张。监仓副使是协助管理台州海运仓储的要职，他必须要保障仓储物品不受方国珍劫掠，其官职虽不高，但比柯九思无职而归好得多。对林一清来说，也算是得意之时。

二、元末入闽考

《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引用《建宁府志》中林一清的史料，将他作为明人，籍贯为瓯宁（今福建建安）。笔者以为，这与永嘉林一清可能系同一人。

林一清入职台州监仓副使后，风险渐现：方国珍起事，攻占台州一带，屡降屡叛，与朱元璋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在元末战乱复杂的浙东南局势，林一清难以履职，唯有逃之夭夭。而闽浙地理相近、经济相长等原因，江南籍画家入闽并非鲜见，如元代山水画家张舜咨曾宦游莆田、明代金陵女画家朱玉耶嫁给莆田诗人郭天中，等等。

在元明绘画史籍中，出现了多位画家有“双重”籍贯的现象。如元代画家黄公望系常熟（今属江苏）人，因晚年曾隐居富春山中，被误作当地富阳（今属浙江）人。这些有“双重”籍贯的画家，很可能与其晚年隐居地有关。又如明代边文进的两个籍贯差之万里，一作陇西（今属甘肃西部）人，一作沙县（今属福建）人；明代倪端一作杭州人，一作楚江（今属四川）人，或皆因这种原因造成。

因此，永嘉林一清是否在元朝灭亡前后，隐居距故里不太远的瓯宁？

福建的建安版画被称之为“建本”，是宋元明时期福建建安佛经、文学和科技等书籍插图版画绘、刻、印中心之一，产品行销江南。擅长界画和佛像人物画的林一清，在这里是能找到他生存空间的。元亡前后，林一清已过半世人生，他避开战乱，在瓯宁一带过着隐居生活。改朝换代到明初后，他在建宁一带继续其低调的艺术活动，“笔法苍古，年八十余，信手挥染，无不妙绝。”他平静、低调地在这里度过余生，以至于后人将隐居地作为其籍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以常理来论，像林一清这样曾享誉元内府的宫廷画家，明清台州、永嘉等地府志应有其记载，但恰恰相反的是毫无踪影，反而在邻省府志里有所记述，这不能不说是林一清晚年艺术和生活的缺憾。

林一清作为元朝遗民，在闽北生活必须低调。其一，他曾为前朝官员，在政治上是明初政权要清除的对象；其二，他擅长绘画，是明初要搜寻的才艺之人。而明初朱元璋还迫害了一些不遂他意的画家，因此林一清在政治、生活与艺术道路上选择隐逸，是完全符合当时现实的。

哪个朝代温州开始迈入百万人口大都市

孤舟独钓

近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温州总人口达到 957.29 万人，占全省总数的 14.83%。

作为浙江省的人口大都市，历史上温州什么时候开始人口大量聚集？各个朝代温州的人口又经历过什么变化？

谢灵运当郡守的南朝刘宋时期，永嘉郡才 3 万多人口；隋朝温州地区人口户数首次突破 1 万户大关；南宋时期，温州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连宋孝宗都称赞这里是一片“乐土”；清嘉庆年间，温州人口逼近 200 万大关……

西汉：两次大迁徙，东瓯地遂虚

虽然古代温州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对温州人口的文字记载很少，统计也很粗糙，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史料的只字片语中窥见一二。

温州，古称“东瓯”。早在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晚期，这块土地上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夏、商、周时期，称瓯地，属越族诸侯国。

《史记》中记载，2000 多年前的汉武帝时期，东瓯经历过两次内迁，原生态的东瓯土著几乎都被迁走：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前 138）东瓯王广

武侯驹望率其众四万余人，迁至江淮之间；二十几年后，东越王余善抗汉被杀后，汉武帝下诏将其民内徙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因此，温州是一座移民城市，温州人的祖先除了极少数遗留下来的古东瓯人，大量是历代因避乱与谋生陆续迁入温州的北方移民与邻近的福建移民，他们构成了温州人口的主体。

东汉：地广千里，户不满万

温州古代人口的记载始于东汉时期。

汉永和三年（138），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县治设在瓯江北岸的贤宰乡（今永嘉瓯北），隶属扬州会稽郡，这是温州历史上单独建县的开始。

《太平御览》引《吴地志》记载，当时的永宁县辖地相当于今天的温州、台州两个地区，“地广千里，户不满万”，是个小县，因此只设了“永宁长”来管理。

可见，距离东瓯内迁近300年时间后，东汉时期温州的人口还远不及东瓯国时期。

东晋：合三郡，户不满二万

经历三国两晋，温州地区人口才有了稍大的增长。

特别是晋怀帝永嘉年间衣冠南渡，中原战乱，北方士族大规模举族南迁，一部分涌入温州，促成了温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开发。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分临海立永嘉郡。永嘉郡刚设立时地广人稀，南宋学者戴栩在《江山胜概楼记》中写到，“晋之永嘉属临海，合三郡，户不满二万……计其当时，荒凉寂寞，翳为草莽之区”。

随着永嘉郡的设立，特别是南下的士族加入大力开发，温州地区人口

逐渐开始繁衍，经济发展迅速，地方府志中称“晋立郡城，生齿日繁”。

东晋南朝时士族云集永嘉郡，据《括州志》记载，来此担任郡守的士族多达 37 人，如孙绰、王羲之、谢灵运、裴松之、颜延之、檀道鸾、丘迟、毛喜等，还有的客寓永嘉的名人，如郭璞、郗愔、陶弘景等。

南下的士族带着大批宗族、乡里、宾客、部曲，投入永嘉郡的开发。如高平大族郗愔带领数百家开发乐成县的木榴屿。出任永嘉内史的一代名臣毛喜，离任后将子孙留在永嘉，城区的丰和坊曾名遗爱坊，就是以毛喜后人居此而得名。

在这段时期，温州地区相继出现了四个县级行政机构：永宁、安固、横阳、乐成，“县”的增加，也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密切相关。

到了南朝刘宋时期，《宋书·州郡志》载，永嘉郡下辖永宁、安固、松阳、乐成、横阳五县，有户 6250、口 36680。而相邻的临海郡虽然同样下辖五个县，仅有 3961 户、24226 口，永嘉郡显然繁盛得多。

在南下士族和百姓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东晋、南朝二百多年的开发，永嘉郡终于成为丘迟笔下的“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是东南沿海的新兴都市。当时永嘉郡出产的瓯瓷以及八辈蚕的养殖技术，都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

隋唐：见尽江城数百家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统一，南北经济都有重大发展。

《隋书》中记载，永嘉郡下辖括苍、永嘉、松阳、临海四县，有 10542 户。

唐代，温州人口规模第一次出现突破性增长，鼎盛时期在唐开元和天宝年间。《旧唐书》记载，天宝元年（742）温州已有 4.28 万余户，人口超过 24 万，比南朝刘宋年间的 3.6 万人增长了近 5 倍。

史料记载，唐开元（713—741）年间，定天下州府，按照户数分为上、中、下州。温州与杭州、苏州、福州、明州（宁波）等富裕州县同列“上州”，

所辖的永嘉、安固、横阳、乐成四县也都是“上县”。

唐代宗宝历年间，温州刺史张又新在《华盖山》一诗中写到：“愁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数百家”。站在城区华盖山上一眼望去，瓯江畔的温州城里稠密的民居尽收眼底。

温州当时是个生活条件不错，人均占有资源丰富之地。《太平广记》中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位名叫豆卢荣的温州别驾，他的岳母金河公主随女儿女婿在温州居住。豆卢荣在任上去世后，金河公主母女还是留在温州。宝应初年（762），临海的袁晁起义攻下台州，女儿多次梦到父亲和丈夫托梦称温州也将遭受战乱之苦。但因为当时江东粮食价格很贵，唯有温州米价很低，公主还令人购置了数千匹吴绫，舍不得离开温州。

宋：十万人家城里住

温州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期在两宋。

北宋时期，温州人口开始有大幅度增长，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到元丰六年（1083），百年间温州的人口户数从4074户增长到了121916户，增长到近3倍。

而真正让温州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是在南宋时期。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蹕温州，大批文武百官及其家属与流民跟随而来。宋室南渡后，“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迁入温州的人口也骤然增加。因为温州气候温和、物产丰富，连宋孝宗都称赞“永嘉故乐土”。

据史载，北宋末年徽宗崇宁年间，温州的人口数是119640户，462710口；而至南宋中期孝宗淳熙年间，则增加至170035户，910657口。七、八十年间，人口增加了5万多户、近45万人口。至南宋末期，温州人口已接近百万。

随着南宋温州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区连内河城边都修建起了房屋，房价竟暴涨了十倍，“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南宋诗人、永嘉四灵之一的

徐照在诗中描绘“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门山”，反映了当时温州城市的繁华景象和人口规模。

从南宋大儒叶适的《东嘉开河记》文中，我们也能想象当时温州古城中大街小巷人口拥挤，人们甚至在堤岸上造屋的景象。

“承国家生养之盛，市里充满，至于桥水堤岸而为屋，其故河亦狭矣……”

温州城区范围开始拓展，州城周围兴起了望京、城南、集云、广化四厢。温州成为浙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赞为“其货纤靡，其人多贾”。

但是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温州百姓生活开始受到资源制约。到了南宋后期，除了腹地山区尚未完全开发之外，嘉熙四年（1240）温州知州吴泳称，“海滨广斥，其耕泽泽，无不耕之地”。宋时期的温州，逐渐成为一个缺粮地区，即便遇到小灾害也会缺米。温州知州楼钥曾说，“臣试郡永嘉……去岁晚禾未登，偶缺秋雨，未至甚害也，而流散不已”，即使是在平常的年景也需要从外地进口粮食。

因为人口密度大、基础设施不完善，一旦发生天灾，动辄死伤惨重。南宋乾道二年（1166），温州发生大水灾，造成“并海死者数万人”。

元明：浙左以温为上郡

元代温州人口数据传世较少，《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有187403户、497848口。元代温州下属的两县瑞安、平阳，都于元贞元年（1295）升为州，平阳的户数超过5万户。元时人称温州，“百货所萃，麇氓贾竖，咸附趋之”。

明初温州人口逐渐回升，史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温州府有约17.86万户、近60万人。

不过由于倭患和“海禁”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破坏，温州遭受巨大人口损失、增长一度停滞。因此时人记载“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地，

稻多寂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于台，闽福齿繁，常取于温”。也因此有了明清之际持续三百多年的福建移民入温高潮。

不太拥挤的人口，富裕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明时温州仍然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明朝宣德（1426—1435）年间，明朝内阁初创时期重臣、温州人黄淮称“国朝经理天下，分建布政司为十四道，而以浙江为雄藩。浙江统郡十有一，而浙左以温为上郡。”

明万历年间（1573—1620），汤日昭写道：“瓯虽僻在一隅，实当东南要害。且也林木与粟鱼鳖之饶，牢盘之利，甲于他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温州的社会风貌。

清：人均耕地仅有 1.5 亩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朝代，温州也是如此。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温州地区的人口数约 19 万户；而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大清一统志》中记载，温州地区的人口数已接近 37 万户、超过 193 万人，逼近 200 万人大关。



清乾隆温州府志地图

以平阳县丁口数为例，仅从清康熙九年（1670）到康熙六十年（1721），就从 44079 人暴增到 248123 人，50 年间增长了 5 倍之多。

由于清朝税赋政策的变动，尤其是高产作物的引进大大拓展了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温州地区与全国一样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人口膨胀。清中后期之后，温州也与全国一样，遭遇了“人口危机”。

清代温州地区的粮食消费出现了自给不足的现象，需要通过外地输入。学者统计，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温州地区人均只有 1.5 亩左右的土地，低于当时全国的人均耕地面积 2.66 亩。而据史学家罗尔纲计算的“温饱常数”指标，晚清南方需要人均耕地 3 亩左右方可维持一家五口的最低生活。可见当时温州地区的人口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承载力，百姓生活水平已经处于“饥寒界限”以下。

因为人多地少、人口过剩，粮食自给不足，导致温州大量人口溢出。最迟在雍正年间，就已经有较多的温州人外出种山，租地搭棚，成为浩大“棚民”队伍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嘉庆及之后更为剧烈，主要来自平阳（含今苍南）、瑞安의百姓，纷纷前往浙北的天目山区、龙游、平湖等地，以及安徽南部的徽州寻找土地耕种。清同治年间（1862—1874），温州府同知郭钟岳在《瓯江小记》中叙述：“平、瑞之民每岁赴湖州等处种山者以千记”。

责任编辑：王剑峰

池塘春草年年绿，山水诗话“第一楼”

章方松

晋刘宋山水诗人谢灵运于422年秋到永嘉（今温州）任郡守，在温州写下许多诗歌，成就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地位。在永嘉郡守任上的第二年春天，他写下《登池上楼》诗，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为人所激赏。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历代诗人与官员络绎不绝，来到温州这个山水诗圣地，感怀池上楼等名胜并留诗，池上楼也因此成为中国山水诗绕不去的“第一楼”。

春草池塘千古句

当时的谢灵运正官场失意、疾病缠身，在温州面对萧瑟空林、瓯江涛声和眼前的池塘春草，以及柳枝上的鸟鸣，感应着春天的勃发生机，激奋精神写下这首《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幽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池上楼

据南朝钟嵘《谢氏家录》云：康乐（谢灵运袭爵康乐公）每对惠连（谢惠连，灵运之从弟），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诗品》卷中）。

唐代诗人李白非常敬慕谢灵运，他虽然没来过温州，但咏及谢灵运于温州的山水诗约二十三首。如“谢公池塘上，青草飒已生（《游谢氏山亭》）”“楚臣伤江枫，谢客挂海月（《同友人舟行》）”；慕其游赏的有“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梦游天姥

吟留别》) ” “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李白《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 ”；欣赏谢灵运诗境的有“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阶登楼诗（《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一）”等。

宋代叶梦得（1077—1148）有语论谢灵运诗境：“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人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尔。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备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艰者，往往不悟（《石林诗话》）。而宋代理学家朱熹的一位学生，名叫曹彦约（1157—1228），一天坐在屋里，忽然觉得“新春盛寒中闻禽声有春意”，遂写成一篇诗话《池塘生春草说》，悟出“草犹旧态，禽已新声……诗意感怀，因植物之未变，知动物之先时”的一番理趣。

宋金对峙时期，那位“问世间情为何物”的金国著名诗人元好问，虽无缘跨境“签到”永嘉，却用“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极度赞美谢灵运的诗歌艺术。

清代何焯有语评说：谢灵运《登池上楼》，只似自写怀抱，然刊置别处不得，循讽再四，乃觉巧不可阶。“池塘”一联，惊心节物，乃尔清绮，惟病起即目，故千载常新（《义门读书记》）。

谢客岩边春草吟

池上楼因谢灵运诗句名闻天下，文人墨客仰慕纷来。早期的如唐代诗人张又新（今河北深县人），唐宝历年间（825—827）任职温州刺史。他曾写下许多赞美温州风光的诗篇，在《谢池》和《春草池》两诗里写道：

谢池

郡郭东南积谷山，谢公曾是此跻攀。
今来惟有灵池月，犹是婵娟一水间。

春草池

谢公梦草一差微，谪宦当时道不机。

且谓飞霞游赏地，池塘烟柳亦依依。

这两首都是缅怀和追忆谢公灵运的诗，除表达对谢灵运命运周折和政道所阻、被贬谪东海一隅任职太守的同情和共鸣，以及对谢灵运能写出“池塘生春草”诗句的钦佩外，也表达了时空相隔不能相聚的遗憾。特别是“今来惟有灵池月，犹是婵娟一水间”与“且谓飞霞游赏地，池塘烟柳亦依依”句，借用“月亮”“烟柳”来表述生命、时空已逝，唯有拟物寄情，以表缅怀和思念。



谢客岩旧照

在城区积谷山飞霞洞口，有“谢客岩”三字摩崖石刻。《乾隆·温州府志》卷二载：谢客岩，旧志：在积谷山飞霞洞口。谢灵运尝书《白云曲》《春

草吟》于崖上。（今）多湮没，惟“谢客岩”三字尚存。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谢泌，歙州歙县人，也曾到过谢客岩，有缅怀诗人的感情见诸笔端，颇为动人：

谢客岩

旧刻岩前文字在，登临尽日动悲辛。
子孙千载知多少，只我今来嗣后尘。

宋代仁宗景祐元年（1064）进士赵抃，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他在谢公岩前写下《抵永嘉题谢公岩》：

岭路与岩垆，池楼古郡城。
千年温俗意，四榜谢公名。
寄傲留佳句，遗思出至诚。
滔滔慎江水，东注等休声。

宋绍圣二年（1095），杨蟠任温州知州，也在池上楼春草池畔，看着郁郁葱葱的春草，写下《春草池》：

寂寂绿岩畔，相期无数人。
不知康乐后，池草几回春。

宋代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温州人刘安上，对池上楼的春草，也有一番深切感受，且读《登谢公楼分韵得“心”字》：

高峙危楼压翠岑，登临遥想昔贤心。
人随岁月有兴废，名逐江山无古今。

残月汀边生晚思，断云帘外卷晴阴。
清风凜凜今何在，芳草池塘恨独深。

诗人这里指的谢公楼，在郡城拱辰门上，为北门城楼。谢灵运任郡守时建，《永嘉县志》曾载谢公“恒游憩于此”。诗人登城楼，看山看水，由此，想到谢公在温州留下的诗文和山水游踪。但日月轮回，多少风流人物已消逝在历史风雨中。江边残月激起无限情思：谢公当年那种疏狂高节何处可觅？或许还遗留在池塘边那片碧绿芳草里吧？

此外，南宋温州本土诗人、“四灵”之一的徐玠，也在初夏的一天在谢公岩前表达对谢康乐的思念：

初夏游谢公岩

欲取纱衣换，天晴起细风。
清阴花落后，长日鸟啼中。
水国乘舟乐，岩扉有径通。
州人多到此，犹自忆髯公。

好山满眼谢家诗

到了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1629—1709）三十四岁时避祸来温，亦步亦趋，重走谢公行踪所到处，集成《永嘉杂诗》，其中有：

谢客岩

朝看白云飞，暮看白云宿。
闻有山阿人，曾歌白云曲。



怀谢楼

春草池

谢公去已久，空余池上楼。
春风园柳色，朝夕使人愁。

朱彝尊朝暮观赏谢客岩，由白云而感思谢灵运当年在永嘉的情怀。又由池上楼追怀谢灵运当年池上楼春草意境，同时也表达自己怅惘的心情。到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袁枚（1716—1798）也在六十七岁时一路行吟至温州，他有诗《过谢客岩有怀康乐公》：

一梦传千古，诗人重友于。
池塘应在此，春草绿如初。
水色芙蓉嫩，苔痕屐齿疏。
相传崖上篆，犹是谢公书。

如今的池上楼，位于积谷山麓，原楼址相传有二：一在旧郡治丰暇堂北（今东公廡），已毁；一在今积谷山下。据说该址亦为谢氏曾寓居处，后人建楼以纪念。原楼为清代民居式木构建筑，重檐歇山顶，面阔三间，四面回廊，东临春草池。清代学人梁章钜（1775—1849）曾有“面壁拓幽居，一角永嘉好山水；筑楼存古意，千秋康乐旧池塘”一联描写此处风景。这样，积谷山麓的池上楼，也成为诗人向往之地，多有诗文表思古之情。

清代文人厉志（1804—1861，定海人），在月夜游览谢池后，写下《谢池月夜》一诗：

雨霁云色净，天旷月华清。
老树列池岸，修栏无人凭。
坐拂苔间石，移时微风生。
初虫润余渍，暗抱岩草鸣。
阴律竹未调，细涩无齐声。
感我千载念，穆然来中情。
胜赏昔所企，高怀今与并。
阒寂了心悟，茫然尘世轻。

诗歌描述了夜游池上楼时的所见：雨后放晴、皓月清华，池塘岸边老树，静立，欣赏着谢池月夜，从中感悟谢公当年神游山水的情绪，以及最后落得广州斩首弃市，临刑时还发出“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的千古憾叹，从而悟到功名利禄，不过淡薄如过眼烟云罢了！

有意思的是，以“谢邻”自称的一代词宗夏承焘，与池上楼也有着深厚因缘。青年时代，温籍台湾作家琦君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拜夏承焘为师。夏承焘在《希真生日嘱为诗》里写道：

我年十九客瞿溪，正是希真学语时。
浮世几回华屋感，好山满眼谢家诗。

从诗中亦可见夏承焘对谢灵运的崇敬之意。夏承焘人生暮年，思念远在台湾的学生琦君，托香港友人给她寄词《减字木兰花》云：

因风寄语，舌底翻澜偏羨汝。
往事如烟，湖水湖船四十年。
吟筇南北，头白京门来卜宅。
池草飞霞，梦路应同绕永嘉。

夏承焘寄词追忆了他们一起在杭州西湖和温州池上楼的往事，并表示“梦路应同绕永嘉”，这也正是琦君所有乡愁文学的归结地——温州。池上楼成为夏承焘和琦君思念故乡的人文地图。



夏承焘

诗人一至，遗响千秋。明年，谢灵运到永嘉任郡守正好一千六百周年。如今，池上楼已成为温州纪念这位诗人的重要文化地标，凡来温州的文化人，大都喜欢慕名登楼缅怀吟诵康乐当年所写的《登池上楼》那悠远的池塘春草、园柳鸣禽。

走笔三章

郑锦春

一、东瓯故地 大美藤桥

元旦清晨，与老同事相约前往藤桥。车从温州北上绕城高速，忽然想起唐人孟浩然《田家元日》诗“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犹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大概 20 来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藤桥出口。下了高速，一幅“东瓯故地、大美藤桥”的文化墙十分夺人眼球，也激发了我们一窥藤桥建设发展现状的热情。

藤桥镇地处鹿城区西部，瓯江南岸，东接仰义、双屿街道，西邻丽水市青田县，南接瓯海区泽雅镇，北与永嘉县桥头、桥下镇隔瓯江相望。藤桥，因“连藤成桥”的道义担当与凄美爱情故事而得名，是特色工贸与休闲产业综合发展的生态型宜居新市镇。2019 年 10 月，入选了“2019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在藤桥朋友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了镇农旅馆。

在这里观看藤桥农旅产业布局规划的宣传片，对藤桥打造“四大产业功能片、三大核心休闲板块”有了总体感受，也对藤桥农旅产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藤桥熏鸡”是藤桥响当当的农业品牌，但绝不是藤桥的唯一品牌。现在的藤桥正以农业为主，以休闲旅游为辅，着力打造“藤耘佳物”

的区域公共品牌，对特色农产品进行整体包装，“田间直播”“线上云购”“网红带货”等活动，探索拓宽销售新渠道、提升产品附加值、盘活产业链资源，助力带动农业企业和农户发展，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道路。在参观农旅馆后，我们又驱车来到“曹湾山遗址”。

曹湾山或许不为人所知，但提起“老鼠山”名气会更大些。老鼠山遗址确立了“好川文化”的命名，是继“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后，以瓯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一支史前文化。在老鼠山遗址发现了“好川文化”连片的石柱基建筑遗迹，清理“好川文化”墓35座，唐代竖穴土坑墓6座，并获得各类文物1000多件以及大量的陶片标本。为浙南地区先秦文化发展序列和考古编年提供了“标尺性”的地层学依据，是温州不可多得的历史财富。为了挖掘和保护这一文化资源，藤桥镇正在加快推进曹湾山遗址公园建设，打造集科普、展示、游玩于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重现一个瓯地先民的家园，十分值得期待。

在“历史”中出来后，我们又向着“民俗”进发。一场年味浓厚的民俗文化节正在藤桥岙底村拉开帷幕。岙底村是温州传统农业村落典型代表，近年来经过环境综合整治，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文化气息。走入村口，首先看到的是岙底文化礼堂，这里展示了许多传统的民间技艺和风俗，是村民精神文化活动的家园。民俗馆向村内步行约200米，一个颇具规模的广场占据了有利地形，长廊上有销售特色农产品的摊儿，有编制竹篓、箬笠、米筛的大妈在展示手工技艺，还有为村民书写春联祝福的民间书法家，“试题春贴纪新年，靄靄青云起砚田”。更有留住乡愁的温州老城摄影展。穿过广场，沿山坡拾级而上，几座经过改造的老屋，把传统和时尚兼容，焕发出新的生命，开有“无料书铺”和“农家酒庄”，游人如织。小朋友在玩着水池里遇寒潮而结成的冰，年轻人在寻找着不同的角度玩街拍，中年人品尝着“红娘酒”“番薯枣”等农产品，还有许多人围着欣赏“捣年糕”“打炮嘍”“熏鸡”“杀猪”等年节民俗活动，新年的喜庆气息十分浓厚，让人久久不舍离去。

一路走下来，亲眼目睹了轻工园区环境改观之大，戍浦江畔景观打造之美，村容村貌整治效果之好，甚是欣喜。深深感受到藤桥镇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文化产业，这将进一步促进藤桥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奏响藤桥“美丽田园”创建新乐章，令人振奋。

二、七都岛的嬗变

闲居在家，随手翻阅《唐宋诗词选》。扉页上写着“1982年购于五马街口新华书店。”书面陈旧，书页泛黄。圈点手迹，有些模糊。宋人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则特别清晰映入眼帘。“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今天是农历三月十九，也属暮春，我们七都岛，正可谓“眉眼盈盈处”。于是决定下午走七都岛“赶上春”。

我们过七都大桥不远处，向左拐，到了上沙村。漫步百年一遇的景观大堤，景色秀逸，滩脚草长，山色葱郁，江水东流。内心似瓯江之水，泛起涟漪。首先想到的是温州历史上文化太守之一丘迟（464—508）。他于梁天监三年（504）出任温州“市长”，天监七年（508）卒于任所，年仅44岁。他在任上提倡农桑，重视教化，崇尚俭约富民。他在《永嘉郡教》一文中写道：“贵郡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天监四年（505），临川王萧容伐魏，时陈伯之率军抗梁。丘迟以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与陈伯之书》，令其动容，“乃于寿阳拥兵八十千归降”。在这一篇文章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描写的正是温州江南景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七都岛，系瓯江下游泥沙冲积，自1300年前，开始冲积而不断扩大，至上世纪初叶，形成了椭圆形格局。先民们在岛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渔而食。台风大水，风口浪尖。灾难频发，听天由命。因此清顺治十八年（1644）年“迁弃”。康熙九年（1670）属膺符乡第七都。

岛上居民面对“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开始探索飘洋过海“谋生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七都加速走上“发展路”。1984年，通自来水；1992年，通程控电话；1996年，20年一遇标准堤塘闭合；1998年，温州大桥通车。

2001年8月，七都在区划调整中，划归鹿城区管辖。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冯志礼莅临七都察看堤塘时说，随着区划调整，必须加大力度推进七都城市化进程，首先要建设好50年一遇的“生命线”。2002年，50年一遇的标准堤塘建成。随着七都大桥及北汉桥的相继建成通车，岛内市政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特别是脚下堤塘，百年一遇，固若金汤。七都的发展历程昭示着：习惯走老路，很难有出路；立志创新路，通向成功路。不过，凡是路走起来总需要一些力气，但是创新发展之路，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才气、勇气、正气。

吟州村，作为省级AAA级景区村，现成为七都岛农家乐、主题民宿集聚区。村容村貌，富有特色。小河静静地流淌，倒影着蓝天白云。树木轻轻地摇曳，散发着浓郁清香。吟州古称任川。据说因王姓始祖王巩罢官归隐于此，吟诗种竹，务农垦荒，繁衍生息。后人为缅怀王巩清明厚德，遂改名为吟洲（州）。我没有考证这位王巩身世，而“罢官”与“吟诗”，让我联想起北宋著名诗人王巩。他以正直的品格和豪气真情，活跃在北宋中后期政坛，为时人所敬重。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由于王巩与苏交谊甚笃，受牵连被罢。此王巩与彼王巩，到底是一人与否，期待七都同志予以考证。几年前，曾建议七都主要领导，在大建设大发展中，重视地名文化建设。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我们的历史。如果能把七都历史名人、革命英烈、村落地名，融入现代七都格局之中，将有助于传承历史，更好地留住乡愁。

晚餐安排在樟里村7号“私享·瓯菜”，樟里村口立有一块醒目的宣传牌，“樟里——全国文明村”。于是顺着村间小路，快速走进。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随即在眼前展开。青砖路面，整齐洁净。香花绽放，枇

杷满树。中西建筑，错落有致。墙体绘画，述说历史。庭院深深，古韵悠扬。族氏家训，昭告众人。现摘录几则，与大家共飨：黄氏家训，“善待家人，笑对人生”；徐氏家训，“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金氏家训，“处世以谦让为贵，为人以诚信为本”。樟里，不愧为令人称道的文明景观村。

七都岛，在沐浴春风中华丽嬗变，更愿以稳健步履阔步前行！

三、走近“砬糠桥”

今天晨练，走近“砬糠桥”。它扩建在原龙方桥旧址上，是市区双龙路横跨南塘河的一条市政观光桥梁。主体工程业已竣工，红色耀眼的拱形钢构，托起桥身。两条紧紧依偎主桥左右的辅桥，可拾级而上，可驻足欣赏塘河风光与夜间景色。四台观光电梯矗立在主引桥之间，较好地解决了无障碍通行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南塘街行人快速到达主桥人行道。站在桥下的南塘街望去，拱形支撑酷似泰顺廊桥的叠梁，仿佛传递着古今相融，继往开来的时代意涵。

相传，一位文化人认为“砬糠显得轻飘”，故改名为龙方桥。不过，像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仍口口相传“砬糠桥”及其记忆。在温州的历史上，流传着不少太守治水的动人故事。史料载，沈枢，浙江德清人，宋绍兴十五年（1148）进士，淳熙十二年（1185）知温州。翌年，倾政府财力，发动群众整治疏浚温州到瑞安的塘河，修缮东岸石堤，铺设石板，辟为南塘驿路，并在河里种植莲藕，南塘因此有“旧时驿路，百里荷花”的美誉。这条有温州大运河、母亲河之谓的温瑞水上交通大动脉，便有了“水行御舫，陆行蹶踵”的繁荣景象。作为驿路与南塘河的起点，人气渐旺，遂成街肆。明末清初，南塘豆腐、油坊、米店等手工作坊与店铺已闻名遐迩。

南塘街座东面西临塘河，有“门连市井，时闻桨声”一说。大船小船靠岸方便，远近百姓运稻谷至这里，碾米加工。然后将大米或贩运远处，或设铺销售。而加工脱壳的砬糠，又一担一担挑往豆腐坊等作燃料之用。

后来随着碾米设备的改进，有砦糠被粉碎成米糠饲料。随着温州手工作坊的兴起发展，出现了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如卖麻桥、蒲鞋市、打绳巷等。南塘街的米筛桥与砦糠桥就是以地域“业态”取名。而“村以桥名”，是温州地名的又一特点。如南郊一带的砦糠桥村、眺舟桥村、甲里桥村、牛桥底村等。

另据叶汉龙老先生《温州三次沦陷见闻》记述，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铁蹄曾三次践踏温州城乡。在1942年7月的第二次沦陷中，日本鬼子制造了“砦糠桥惨案”。砦糠桥位于南塘中段，这里原是十字形河道。日寇就在附近搭了一个七米多高的瞭望台，东看到划龙桥村，南看到梧埭街，西看到牛山，北看到南塘街。日寇站在台上，看见有人走动，或是有船划过，便说是游击队，而难逃其魔爪，单是被刺刀戮死抛进河里的就有20多人。有一天日寇在梧埭抓来18名青年，被捆绑带到砦糠桥，先放在石板上让烈日暴晒，然后放河里一浸，又拉上来暴晒，如此反复多次。18位青年，除了一名叫潘瑞明的趁浸水时泅水逃脱，其余无一生还。那时的南塘街砦糠桥一带，路无人走，屋无人住，船无人划，街心茅草遍地，真是一幅凄凉场景！

老地名是一种最朴实的历史记录，又是一种最引人遐想与追思的见证。随着老地名在城市发展中渐渐消失，古城的历史凝重感也在一点点流失，这是一种“根”的丧失，是人文之脉的流散。南塘街，现已改造成“风貌街”，古民居、老街景已荡然无存。但南塘街及米筛桥、砦糠桥的名称，仍在热闹中坚守那一份宁静，裹挟着深沉的记忆，默默地标示着地理方位，传承着城市文脉，铭记着历史追念。因此，建议并呼吁桥梁建设单位及地名主管部门，不取“新桥名”，不用“曾改名”，恢复“砦糠桥”旧名！

那时的黑白电视机

王微芳

在当今社会，电视机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电器之一，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在我童年记忆中的那台 14 吋黑白电视机却显得异常珍贵而稀有。改革开放之前，大家普遍都很穷，解决温饱问题乃头等大事，收音机之类的电器已属稀罕之物，更甭提电视机咯！1978 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收音机、录音机、电冰箱等各种电器也陆续登场，但对月工资仅有数十元、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要花数百元去买一台电视机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力有不逮，家长们唯有望洋兴叹、望而却步。可突然有一天，我的同班同学兼邻居胡星家用“华侨券”购买到一台 9 吋的日本产“东芝”牌黑白电视机，这个消息如同平地惊雷，立刻在班级和邻里之间“炸”开了，大家都怀着好奇而急切的心情欲一窥这个新奇玩意的庐山真面目。可再怎么捉急，也得等到主人的邀请和允许才能一亲她家电视机的“芳泽”呀！正焦急地期待间，爽朗大方的胡星居然已跟大家心有灵犀，并亲自动手制作了“入场券”送上门来，在这张约摸 7 厘米长、3 厘米宽的白色纸质券面上，清晰地注着观影场次和时间。难怪心灵手巧的她能被大家公推为班长，小小年纪就显示出非凡的统筹规划和精细管理能力，确实不同凡响、令人钦佩。我迫不及待地查看观影时间，是明晚七点钟。

翌日，我就一门心思地想着晚上去胡星家看电视的情景，上课时显出

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到了晚上，匆匆扒拉几口饭就兴冲冲地往近在咫尺的胡星家里冲，虽然离规定的开播时间还有一段距离，但她家仅有十平方米左右的前厅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大家宛若沙丁鱼罐头般摩肩接踵，我见此还是硬用自己的脑袋钻出一个缺口将自己的身体搬弄进去，终于获得容身之处的我欣喜若狂，急忙去探看那个令我魂牵梦萦、众里寻它千百度的电视机。只见在上面的一个木质高脚立柜上，赫然摆放着一个立体的箱体式机器，它最显眼的玻璃屏幕跟我们的书本差不多大小，右侧有两个分别控制频道和音量的旋钮，顶部高高地立着两根名唤“天线”的细长金属管子，据说它们还可以不断地向外拉伸延长呢！

就是这样一个立方形的小家伙居然要花费一家人几年省吃俭用下来的钱才能买到手？我对胡星家“土豪”般的大出手做法深不以为然，直到电视开播，我方才深受震撼并立马折服胡星家长辈们的远见卓识。它简直是小个子、大见识，果然如人们传说中那样的神乎其神，不仅包罗万象，除了能播放电影外，还能欣赏到纪录片、电视剧等节目。虽然当时的电视节目少得可怜，连于当年元旦刚刚开播的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也收不到，但我们依然看得不亦乐乎、如痴似醉，还常常为看电视废寝忘食、风雨无阻地每晚到胡星家里蹭电视。邻居家的成人和小孩也如同我一般，每晚都会不约而同地先后来到胡星家，她家里每晚都是熙熙攘攘、门庭若市，观众一直从她家的前厅“满溢”到院子里，虽然院子里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真切地看到电视屏幕，但他们依然从最费力的角度向电视机投去最深情的凝视。有些观众明白自己是徒费力气，便迅速将自己的角色调整为听众，转而陶醉于电视上发出的声音，在此过一把听书的瘾。

当时的电视由于信号不稳定老会出状况，正当我们看得入迷，电视突然出现黑屏或闪烁的雪花，发出“呜呜呜”的噪音，胡星的爷爷便出来将那两根天线的角度进行调整，屏幕也瞬间恢复到正常。但有时候，任凭她爷爷如何摆弄天线也无济于事，有人便会自告奋勇地站在天线旁边用双手扶着当“人造 WIFI”。有时实在急狠了，他们便会采取粗暴的方法，使劲

拍两下电视，画面居然也能神奇般地复原如初。为了接收信号，人们可谓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虽然花样翻新、招式迭出，有时候还是显得黔驴技穷、力不从心，大家等上半天见希望渺茫，便悻悻然回家去，翌日又会兴致勃勃地按时赶过来蹭电视，丝毫不会因昨天的事情而在脸上蒙上阴霾。后来，出状况的次数多了，胡星家的长辈们便根据“高人”指点去购买一个铝锌线，从电视天线接到屋外向上弄个U字形。电视信号从此也就不再跟人“闹脾气”，变得乖巧柔顺许多，大家欢欣鼓舞，愈加深深沉迷于这个神秘魔盒的超强魅力。电视信号若偶然闹一下别扭，便会有现场的观众不由分说冲到屋顶去捣腾室外天线，直到信号恢复正常为止。我就这样一直在胡星家蹭了几年电视，直到1982年年初，平时节俭抠门、量入为出的父亲终于花了400多元从商场抱回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为了安顿这个宝贝，父亲专门做了一只结结实实的柜子，下面四条腿，上面是个敞开的的方匣子，里面装着那架电视机，母亲还十分贴心地用白纱巾给电视机做了一个防尘“盖头”——我想：它毕竟是全家最值钱的固定资产，值得这么精心装扮、细致呵护呢！

当晚，我们姐弟喜不自禁，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简直比过年还要开心。记得我们当年看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日产的《排球女将》，我们不禁为该剧女主角小鹿纯子坚韧不拔、永不言败的毅力和精彩绝伦、出神入化的球技所着迷，随着她而欢笑、兴奋、流泪，更痴迷起那浑浑圆圆、无棱无角的白色皮球来。于是，我与姐姐一起把爸、妈每月给我们的零花钱积攒起来，渐渐看着那“铜钿笼”越积越多，我们的希望也越变越大。待到钱积满那天，我们小心翼翼地将“铜钿笼”抱到文具店，一股脑儿倒在柜台上，在过往孩子艳羡的目光下捧回了日思夜想的排球。每天放学便是我们姐妹俩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总是不知疲倦、不知酸痛地打到夜幕降临才恋恋不舍地抱着排球回家，看着满身、满脸汗水和着泥巴的我们，妈妈总是哭笑不得地嗔怪道：“看，象两个小泥人。”然后拉我们去洗澡。童年、少年便在《排球女将》的梦想与希冀中度过，这无疑也成为我日后被挑选

为校排球队队员的资本。

《排球女将》在中国大地刮起一股日剧狂潮，由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这一对贤伉俪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血凝》也趁机进军中国市场，我们也是看得孜孜不倦、日旰不食。虽然听不懂日语，但由山口百惠演唱的该剧主题曲《我衷心的感谢你》，居然也被我学得像模像样、八九不离十。继日剧之后，港剧接踵而至。虽然时隔多年，我依然能对当时播放的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剧名如数家珍般地记忆深刻——《上海滩》《霍元甲》《陈真》《再向虎山行》《射雕英雄传》等，看得我们神魂颠倒、魂牵梦萦，每天晚上都会雷打不动、坚如磐石般地守着电视机。当时的电视机一般只能接收两三个台，因此很少发生频道之争，上述电视连续剧几乎烙刻在全国人民当年的记忆之中，粤语歌曲也因此大大走俏，大家为了唱得有模有样，便报名到位于瓦市殿巷的勤奋外国语学校学习粤语，学成后自然信心倍增，愈发不分白昼黑夜地在大街小巷里引吭高歌，引得邻里乡党啧啧称道。

后来，为了提高观影的质量，我们还别出心裁地买来三色塑料片贴在黑白电视屏上，这大概就是最早的“人造彩电”了吧！到了1989年，由于彩色电视机显像管技术难关被中国攻破，由国外电视品牌独霸一方的局面被打破，“长虹”“康佳”等国产彩色电视机纷纷上市，价格大幅度下降，彩色电视机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此后，中国彩电技术突飞猛进，国产彩电几乎占据国内的整个市场，无论是哪家电器商场，彩电的销售品种大部分是“长虹”“康佳”“创维”等国产名牌。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中国又陆续开发出平板、液晶、等离子、高清4K等款式的电视机，妥妥占据全球电视销售量的头把金交椅。现在，各种传媒已深入到千家万户，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与童年的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时常的，我还会想念起拥有黑白电视机的童年时光，是它，忠实地陪我度过每个晚上，给我的童年平添那么多的欢乐和情趣！

小岙赋（并序）

褚 坚

与小岙相遇还是在十多年前，我当时还在卫生系统工作。一次计划免疫检查来到小岙村，我震撼了，小岙不正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吗！古道、老房、农田、老树，原始朴真，宁静自然，炊烟袅袅，溪流涓涓，偶尔传出几声鸡鸣……对于喜好宁静的我，心想就此住下该多好！在与村民交流后，更增添我对小岙的“好感”。在通行温州话的温州市区内，这里居然是闽南话的“孤岛”，惯讲闽南话的我，倍感亲切！2018年的春夏之交，我写了《七都赋》，藤桥镇邱副镇长读后，回微信说：何不来个《小岙赋》？也许说者随意，听着有心，一下子引发了我的兴趣。随即重游小岙，才得知小岙正在创AAA景区。除了保留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情景外，又增添几分温州民俗等文化味，也建了一些有个性的民宿，让我耳目一新。更加感觉到，小岙是个久居城市喧嚣的人们安放“心”的地方，于是奉拙作一篇，以飨读者。

小岙，地处山隈，鹿城之西，藤桥之村也。始于明朝猎户散住，清嘉庆高氏迁居，后有陈、洪二氏迁于此处。旧事造纸养殖，环境污秽；而今绿色产业，美丽宜居。应友相邀，良暇旅游。兴盛而赋：

冈峦隐隐，翠竹苍苍；群山屏列，小涧中流。天高而地势狭，人稀而境宇秀。布谷竞鸣，蝶雀争飞。涧流清辙，清气润肺。晓雾笼山际，晚霞映翠林。急濑与幽流合响，风啸与叶吟同频。老房与古道叙旧，崇阿与巨柏争阴。

文人咸集，才名远播。孟教授远道而来，建温州非遗之馆；陈律师远渡重洋，创美国律师之所。文化长廊，承延民风；闽语孤岛，脉承明清。宾客汇聚，变山野素宿为雅舍幽居；文韵华观，转纸业养殖为文化怡情。修高低村道为健身游步，引山野绿泉为悠游赅鳞。

呜呼！绰立村头兮聆听细流涓涓；信步村道兮探究温州民谣。近嗅家肴兮香香，遥望炊烟兮袅袅。驻小岙兮形轻，指山峦兮神道。近喧嚣兮独揽幽静；处幽居兮咫尺城谯。

潜居抱道，闲庭看花，弢迹匿光，远隔尘寰。金蝉引夏，爽轻风于雅舍；翠芽送春，赏民俗于老房。乡里朴居，宁静而怡神；山间素馐，平淡而体康。得志腾达，莅小岙而骄敛；失意揪心，临村庄而忼慷。

嗟乎！憩小岙兮心洁则思清；沐民风兮身正则神醒。



小岙村的温籍著名画家孟庆江教授工作室

清明饼儿

蔡勇孟

春节刚过，附近山上就有人陆陆续续开始扫墓了。扫墓俗称上坟，是人们在清明前给逝去先人坟墓清除杂草，打扫墓地，进行祭拜，表达哀思的方式。

相对于今天扫墓时给先祖墓地献上花篮的简单做法，我少时的祭拜仪式可是要隆重许多的。清明前一二个月，家家户户就要开始准备了，人们通常会买来大量的纸篷，用上几天时间打好“玖拾”（温州话对纸钱的别称，在纸篷上敲印铜钱的印痕）。买来蜡烛香、银纸，银纸是要折成元宝形状的。扫墓前一二天，又要准备好鸡鸭鱼肉，煮熟后挑到墓地祭祀祖先。当然，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有用整个猪头的。清明祭祖时还有一样食物是缺少不得的，那就是“清明饼儿”。

春节一过，春风和煦，山间田头便长出了许许多多我们唤做“清明草儿”的植物。“清明草儿”也叫棉菜，翠绿色，草茎长约五六厘米，长着细细的厚厚的白色绒毛，茎顶部绽开着黄色的小花，它是“清明饼儿”不可或缺的辅料。在春节过后至清明的那段时间里，在春阳沐浴的午后，小伙伴们便开始提着篮子，到田野里采摘棉菜了。春天的风是温柔的，轻轻的吹拂过孩子们的小脸颊，吹来了阵阵清香，身子似乎也变得轻盈起来。孩子们在田间追逐打闹，跃过麦浪，穿梭在油菜花之间，尽情享受春天的欢乐。

等玩累了，回到家里时，篮子里往往也装了不少的棉菜。母亲会将我们摘来的棉菜洗净晾干，密封在尼龙袋里，以备做清明饼儿时用。

临近清明的时候，祖母便会请人挑选吉日，准备扫墓。一家人便开始忙碌开来，祖母和母亲负责做清明饼儿。她们将棉菜捣成汁液，和糯米粉一起搅拌，揉成一个个小小的糯米团子，



每个糯米团子中包入肉末笋丝或者甜糖馅，贴在大铁锅锅壁上蒸熟。蒸清明饼儿时，要记得在铁锅底部加上少许水，并用一只倒置的瓷碗盖住清水，以免饼儿蒸焦。清明饼儿蒸熟后油绿如玉，糯韧绵软，清香扑鼻，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食物。父亲则忙着杀鸡宰鸭，准备酒席菜肴。我和妹妹也手忙脚乱的帮助父亲一起拔起鸡毛来。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清明酒还是节省不得的，甚至要和正月酒一样隆重。

扫墓的时间一般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在祖父的带领下，一家人挑着供品，扛着锄头，拿着镰刀，到横屿山山顶曾祖父的墓前进行祭拜。曾祖父出身潘桥上杭，因曾祖母家人丁不旺而入赘，说是倒插门，其实我们后辈都是跟随曾祖父姓蔡的。曾祖父一生操劳，英年早逝，在他60岁那年，带着10来岁的我父亲到蕉下山上砍柴，不慎摔下山坡。父亲至今仍常常念叨此事，说曾祖父是如何的宠爱他，说曾祖父摔下山坡时的情形，说他哭嚎着下山一路跑回家中报信……每每说起此事，父亲总是满怀深情，言语中略略带着伤感和忧思。曾祖母我倒是很熟悉的，她82岁去世时我已读初一了。曾祖母非常疼爱我和妹妹，常常将她珍藏在箱底的零食拿出来分给我兄妹吃。冬天，我和妹妹常常爬上曾祖母的床头，和她一起分享着她那只宝贝似的火箱。每当村里播放电影的晚上，我都会挎着长凳，挽着曾祖母去看露天电影。我至今仍忘不了曾祖母的小脚，忘不了她蹒跚的身影。

到了曾祖父坟前，大家各自忙碌起来。父亲和叔父先用镰刀将墓地周围的茅草割去，再用锄头挖来黄泥往坟头培土。小孩子们则拿扫把帮忙清扫墓地。杂草灰尘清理干净后，我们便在墓前摆开供品。供品的样数都为偶数，鸡、肉、清明饼儿是少不了的，另外还有鱼或者水果，当然还要有米饭和黄酒（前年，我去绍兴时带回几坛老酒，在给我祖父扫墓时，我还特地用可乐瓶装了一些，洒在祖父坟前）。在墓前两侧，各有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小洞，是用来点香烛和烧银纸和“玖拾”的。祭拜仪式结束后，父亲还会放上几个鞭炮。在大人们收拾供品的时候，我和妹妹早就眼巴巴地盯着清明饼儿了。祖父见了，便笑骂着拿起两个分给我俩，那种棉菜糯米粉里面包裹着的肉末笋丝味，至今想来仍让人垂涎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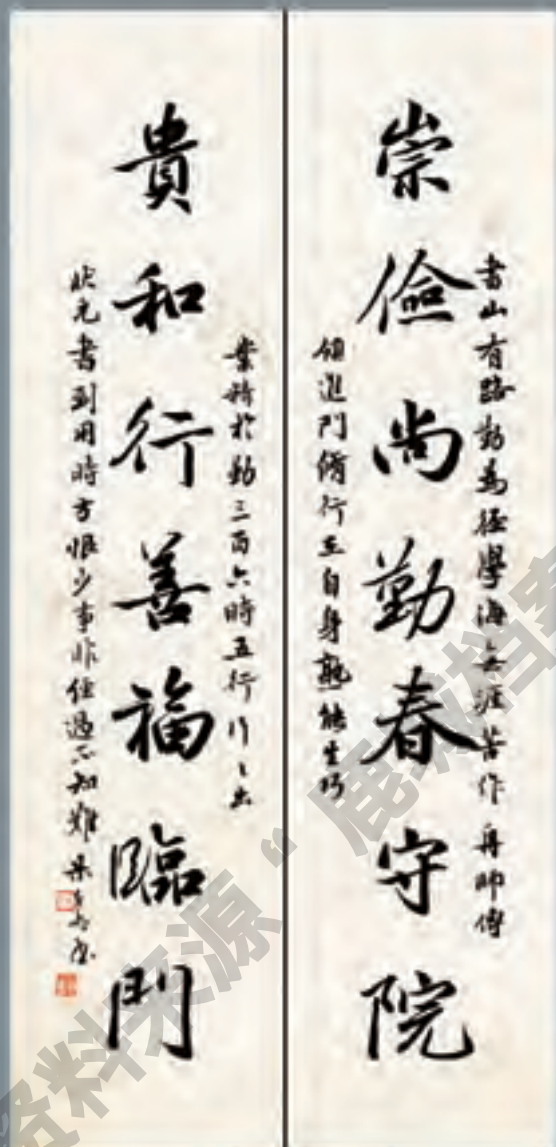
站在曾祖父墓前，啃着清明饼儿，放眼望去，满山遍野的红杜鹃迎着春风尽显优美舞姿。山下阡陌纵横，金黄色的油菜花和淡紫色的苜蓿花相互辉映，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而今，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那一片广袤无垠的水田早已消失殆尽。山河依旧，风光不再，就如同包子店里买来的棉菜清明饼儿却再也吃不出祖母和母亲做的味道来。这幅美丽的景象只怕是要永远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了。

责任编辑：孙任翔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书画精粹



崇儉貴和联



露嫣红莲



杨万里诗意

朱红军，女，出生于温州鹿城。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丹青盛世书画院副院长。书法作墨多次在全国、省或各类书画展览中参展、获奖，如：2006年获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展银特等奖，2008年入展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大展等。2012年获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年度提名奖，2014年度获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青年人才培养“新峰计划”二十家。

封面题字：朱乒乓

封面摄影：沈耀进

封底篆刻：沈洪保

装帧设计：方立庭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